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043535 7

海外述林

第一卷第三期（總第三期） 1977年3月號

THE CROSSROADS monthly

多倫多目前唯一的工人組織　華工在加國

r
C3097.1
C7
1:no.3
1977:Mar.)
ANADA_HK

Linguistic Schools of Canada Inc. PARK AVENUE ACADEMY

180 Bloor Street West
5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M5S 2V6

★日、夜班
★私人補習
★托福或密之根試補習班
★初級、中級、高級英語班

Telephone: 961-2753

★安省政府教育部和加拿大移民和人力部承認的私立中學
★一九七七年九月新學期開始接受入學申請

Telephone: 961-2636

*Application for the Fall term of 1977 begins now, please write to us for further details or call 961-2753.

歡迎函索章程詳備

協助學生申請留學護照

思雅書舍

北極風情畫（無名氏/新聞天地）	$ 2,90
塔裏的女人（無名氏/新聞天地）	$ 2.50
龍窟（無名氏/新聞天地）	$ 2.50
火燒的都門（無名氏/未名出版社）	$ 2.50
露西亞之戀（無名氏/未名出版社）	$ 2.50
無名氏生死下落（卜少夫/新聞天地）	$ 3.75
中國神話故事（河洛圖書/河洛）	$ 5,40
中國現代文學年選（詩/巨人）	$ 5.00
中國現代文學年選（短篇小說/巨人）	$ 6,25
台灣民族（ ）	$11.25
任伯年人物畫集（中華書畫社）	$25.00
任伯年花鳥畫集（中華書畫社）	$31.25
齊白石畫集（一、二集/中華書畫社）	$63.00
徐悲鴻畫集（中華書畫社）	$31.25
徐悲鴻畫馬集（中華書畫社）	$31.25
明陳洪綬畫集（中華書畫社）	$18.75
野狼嗥月（司馬中原/皇冠）	$ 2.50
闖將（司馬中原/皇冠）	$ 2.50
離城記（七等生/晨鐘）	$ 2.50
女與男（七等生/拓荒	$ 3.20
僵局（七等生/小草）	$ 2.80

戴帽的小孩
蘇里科夫作（俄國）

周恩來紀念集（七十年代出版社）	$ 4.20
周恩來（攝影畫冊/廣角鏡出版社）	$ 1.00
人民的好總理，我們熱愛你（三聯）	$ 1.50
隨周恩來副主席長征（中國青年	$ 0.75
隱遁者（七等生/遠行）	$ 2.50
削度的靈魂（七等生/遠行）	$ 2.50
沙河悲歌（七等生/遠行）	$ 2.50
三春記（王禎和/晨鐘）	$ 2.50
陳映眞選集（劉紹銘編/小草）	$ 2.75
第一件差事（陳映眞/遠景）	$ 2.60
家在永和（侯榕生/純文學）	$ 2.25
北京歸來與自我檢討（侯榕生/文藝）	$ 2.40
台北人（白先勇/晨鐘）	$ 2.75
紐約客（白先勇/文藝）	$ 1.80
想念周恩來（斯諾，謝思等著/萬源）	$ 3.50
宋歐陽修詩文手稿（書譜叢帖）	$ 4.00
唐張旭草書古詩四帖（書譜叢帖）	$ 3.40
唐歐陽詢行書千字文（書譜叢帖）	$ 5.50

思 雅 書 舍

提高閱下閱讀水平的地方

加拿大多倫多登打士西街二百零五號二樓

電話： 1-416-598-0296

海外述林目錄

馬民利	華工在加州建築鐵路的一些史實 Chinese Labour in Canada: Some Historical Facts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ailroad
無支祈	美西中國勞工運動 Labour Movement in Western U.S.A.
李懷敏	華工在加國的一些歷史片斷 Historical Fragments of Chinese Labour in Canada
本刊採訪組	多倫多目前唯一的工人組織——華人製衣業聯誼會 The Sole Chinese Workers Organization in Toronto: The Chinese Garment Workers Association
惠鷹	龍城爭霸戰？ High Noon in Dragon City
仁	多倫多華埠治安問題 The Law and Order Question in the Toronto Chinese Community
關卓中等	夜訪陳啓雄談「掛」及其它 Night Visit to Kai Chen: Chatting about Hanging and Other Things
本刊記者	加拿大經濟巡禮 A Glimpse of the Canadian Economy
何沛生	民生與經濟（長篇連載之三）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nomics Part III
方資永整理	目前中國大陸的教育 Education in China
	四度時空 Four Dimensions：
二了	老問題？ An Old Problem
紅雲	瞎子摸象 The Blind Man and the Elephant
學永	談言論自由 On Freedom of Speech
方生	現實和幻想 Reality and Fantasy
魯平・温尼泊	最後大亨（影話） The Last Tycoon
夸父	辣手神探冲天砲（影話） The Enforcer
無業游民	安省華僑史彙編之一——温沙市華人社區簡介 Chinese Canadian History in Ontario
梁啟超	北美洲華僑史（長篇轉載之三） History of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Part III
關自守	自嘲自笑集之擋板記
金山	讀者來函 Letters from Readers
小卒	土豆加牛肉？ Beef and Native Beans
華人製衣聯誼會集體	白樓劇：女工亞蘭
	編者的話 A Few Words from the Editors
	ENGLISH SECTION
	Editorial
Translated by Lee Wai-man and Frank Moy	Travels in the New Worl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Kwok B. Chan	Role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Frank Moy	History, Identity and Community
J. Cannon	Reflections
The Crossroads	Interview with Peter Rosenthal

1977年3月號
第一卷第三期
（總第三期）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華工在加州建築鐵路的一些史實

為民利

編者按： 經濟不景的時候，少數民族往往成爲社會病徵的代罪羔羊。什麼移民奪去本地人的就業機會啦，什麼移民甘願以勞力換取低廉的工資等等輿論，在北美洲的華人歷史裏屢見不鮮。事實眞相是否如此呢？

佐治・西維特先生（George F. Seward），一位曾經到過中國的宣道者，在一八八一年寫了一本名爲「從社會和經濟的角度來看華人移民」（Chinese Immigration：Its Social and Economical Aspects）的書，詳細地分析了十八世紀末期，華人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經濟貢獻。本刊根據是書首先介紹華工建築鐵路對美國西部社會的影响，並且希望以後陸續將是書翻譯成中文，俾讀者了解早期華人在北美洲的生活狀況。

楔　子

我在這裏打算把華人如何提高加利福尼亞州的物質利益介紹給大家知道。首先我引用了那些在國會委員會上作供的證人，尤其是那些在建築鐵路方面有所貢獻的人的例證。我認爲首先引用在委員會上提出有關華工在加州建築鐵路，包括那龐大的、橫跨大陸的中央太平洋鐵路幹線(Central Pacific Railroad）的事蹟是很適宜的，因爲這些鐵路幹線是加州有史以來唯一的龐大政府工程。它的完成刺激了加州的繁榮，並且顯著地發展了它的物質利益。

在問題的關鍵上，我們必需記着兩點：第一，加州在美國地理上的處於荒僻的西岸；第二，她的領地範圍和地理形勢。

加利福尼亞州位於太平洋海岸。除非繞道南美洲的遙遠航路，加州的太平洋海岸與大西洋海岸是沒有直接的海道相通的；而繞道南美洲的遠洋航線路程長遠兼凶險。由紐約海道至三藩市的路程大概相等於由紐約航行至香港所需的時間。雖然橫貫巴拿馬的鐵路早已通行，並且航行巴拿馬東西二大洋的輪船比較上迅速地和容易地把乘客運載到加利福尼亞去；祇是這條路線的旅費昂貴，向西進展的移民，由於必需花費大部份時間才可以抵達加利福尼亞州，建立聯邦政府的步驟雖然還可以繼續進行，卻因此而遷延了不少。

加利福尼亞州位於美洲大陸的西岸。人們不能夠從這句說話想像旅客在尋找這片黃金之地時遭遇着的困難。自從密蘇里州以西的一大片土地開墾了以後，我們在西部的殖民還是微不足道的。三十年前，那裏還是一片陌生之地。稍後，流浪者離開了白特（Platte）區的豐沃山谷，開始移向那片毫不留人的、凶險的洛磯山斜坡。誠如這些浪人所說的一樣，那裏的平原無垠無際，散佈着稀疏的植物，到了高原的頂部更是不毛之地；在冬季，北極風肆意橫掃。向西一點，則爲沙漠地帶。在這裏有着最令人注意的，並且一度在過去的時代被視爲最危險的，還是那山頂白雪皚皚，疲憊的冒險家們證實無法闖過的內華達州的西岸拿山脈（Sierra Nevada）。它切斷了到達肉眼所及的西部樂園的通道。

從最早的時候開始，富有企業精神的加利福尼亞人便已經期望火車能夠穿越這些崇山峻嶺，好使他們能夠儘快回到東部的老家去；同時，那些仍然在找機會到西部樂土去的人也容易早日達到目的。這些期望比人們想像中來得更快。在那區域內備受輕侮和鄙視的華人卻是成全這些期望的主要人手。

爲了加利福尼亞人的舒適和該州的發展，一條橫貫美洲大陸的鐵路便成爲必需的條件。由於該州在地理上過於孤立、遙遠和難以到埗，在缺少一條貫通東西兩岸的鐵路的條件下，它的人口是不能增加至足以應付發展的。自從加州與聯邦政府合併後，西部其它各州也紛紛效尤。部份其它的州的發展已超過加州。以該州的豐富天然資源來看，它的社會未能產生重大的發展是由於它的後天不足之故。一八八一年的統計顯示，該州的人口祇有一百萬之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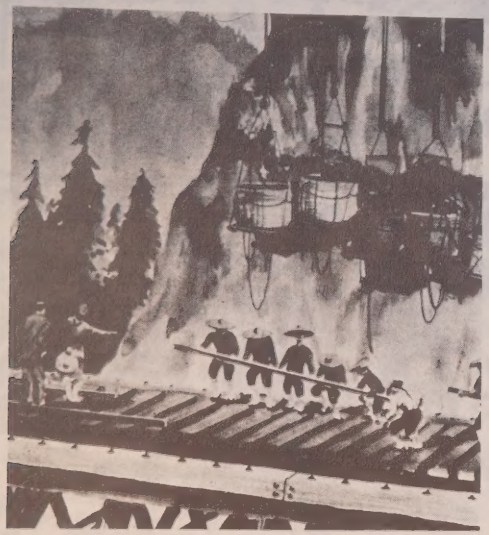
加利福尼亞州無疑是需要一條橫貫美洲大陸的鐵路作爲她的基本發展。有了越洲鐵路之後，她還得面臨建設分佈州內各地的鐵路，或是讓其它的土地荒置的抉擇。加利福尼亞州沒有水道可以作爲交通網，並且由於它的特殊的地理形勢，沒有其它交通工具會比火車更爲適合該州的交通運輸的了。（下畧）

這樣的地理形勢，富有企業精神的人自然會採用鐵路系統來解決它的交通問題。要多少時間和要迅速完成則受若干條件的限制了，而勞工的供應成爲首要的考慮。就讓在國會委員會面前作供的人告訴我們，大量有工作能力的華人如何替加利福尼亞州解決這些困難好了。

盧佛德的說話

第一個在委員會上作供的人是前國會議員、州長、並且曾到中國傳教的盧佛德（Frederick F. Low）。他是最早殖民加州的人之一，並且高度代表了該州的企業精神和智慧。在證辭的第七十五頁，他供述如下：

「我應該指出，到目前爲止，從金錢的角度來看，華工一直是有利於加州的物質繁榮的。由於我們孤立的地理環境，東部各州和歐洲來的勞工是不能夠來到這裏的；他們沒有旅途的工具，前來這裏的種種不便和費用之昂貴足以使他們裹足不前。鐵路完成之後，與及向西遷移的熱潮高漲，由這時期起，人們能夠容易地來到這裏，相信是有足夠的勞工來填補將要離開這裏的華工的職位的。」



參議員摩頓的證供

在回答委員會主席的詢問時，參議員摩頓（Morton）作了如下的供述：

問：請問州長，在建築這些鐵路時，華工作的比例是多少呢？

答：據我所知，由這裏至柯頓（Ogden）一段緩和坂度的中央太平洋鐵路工程，華工佔了八成。

問：關於州的各項工程，華工担任的又佔了若干成呢？

答：我們祇有很少的公務工程。

問：假定大部份是鐵路工程。

答：是的，大部份是鐵路工程。

問：你們是否有灌溉用的水道、渠道等工程？

答：是的，我們有這些工程。我從來沒有到過這些地盤去，是很難從耳食的傳聞來下判斷的。

問：我祇是徵詢閣下關於普遍的意見吧了。

答：在建築防洪堤、挖掘水渠等工作，我認爲大部份是由華工担任的；因爲此類勞工很有用，很多時收到任何工程進展的預算效果。

問：這些工程包括填平沼澤、爛地的事項嗎？

答：建築防洪堤的工程大部份是由華工完成的。有兩點原因。第一，較廉的勞工；第二，由於那裏瘧疾流行，工作環境的衛生條件甚差，華人的身體組合好像黑人的一樣，而與央格魯・撒克遜人的有異，是不受瘧疾侵染的。

問：假若華人不曾來到這裏，白人勞工能否準備取得完成閣下提及的工程成就呢？

答：因爲找不到勞工的緣故，工程將需要較久的時間，並且阻延完成的日期。

問：會不會因此而增加支出呢？

答：一定會作大幅度的增加。倘若不會被認爲無關重要的話，我告訴在坐各位，我曾經是太平洋鐵路在西岸拿加州這段鐵路工程的局長。在未提交上層和評估工程之前，我間或到工地去視察一番和撰寫工事報告。我還在地盤的那段時間，公司招募了華工。開首的時候，他們僱用了白種勞工，後來工事由於找不到足夠的人手而停頓下來。有一位愛爾蘭籍，名叫史托碧茲（Strobridge）的管工，人很能幹並且頗識騙策。曲架（Crocker）先生三番四次地告訴我也曾經向這位管工提議公司必需將中國人找來。他說：「我不會僱用華人，我不會給華工的築路工程負上任何責任；因爲是打過算盤後才決定僱用多少工人的，找着工人後，你便得要給工程進展負上多少責任。」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們那時給白人的工價是月薪四十五元，包食宿。每月以廿六天工作日計，即是說，日薪是多過一元五角的。事實上，工程差不多全部停止了。最後，史托碧茲允許僱用華工，讓他們負責把倒泥車填滿和握持鑿鑽，而白人則負責駕馭馬車和打鎚。他不讓猜泥慢（Chinaman）直譯即華人之謂，但被廣泛地用來侮辱華人）打鑿，認爲華工不知怎樣操作。他們是這樣開始聘用華工的。我許多時候到工地上，注意到聘用華工的進展，並且與史托碧茲討論這件事。在短短半年內，華工便差不多担任每項工事；不但把倒泥車填滿，並且駕馭拖拉的馬車。史托碧茲告訴我，華工担任了八成白人能夠做的工程。他們的月薪祇有三十一元，不包食宿，而白種工人連食宿卻有四十五元，平均每日每人的費用總共是二元。

勤墾強忍

以下是參議員撒尊（Sargent）的對白：

問：假設白種工人的月薪是五十元而非四十五元，我那時的月薪亦祇不過是六十五元罷了。

答：曲架說那時全國到處都闕勞工荒，他們找不夠人手。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五位股東之一的查理士・曲架（Mr. Charles Crocker）先生是舉國知名的，他在這裏提供了下列的例證：

問：閣下在加州有多久？

答：我在這裏已經有二十六年了。

問：閣下是做那一行生意的？

答：過去了的十五年至十六年間，我是做鐵路建築的。

問：中央太平洋鐵路開始建築的時候，閣下僱用的是白人還是華工呢？

答：開始時，我們僱用的是白人勞工。

問：這種情形持續了多久？

答：我們從來沒有停止僱用白人勞工，我們一直在召募他們。

問：我是說閣下大量召募白種工人持續了多久？

答：我們保持大量召募白種工人達年半之久。當察覺不能找到足夠的人手來儘快完成預定的工程進展的時候，我們被迫嘗試聘用華工。我認爲我們的人對華工是有偏頗的態度，曾經有過不僱用他們的傾向。

問：閣下的意思是建築鐵路的人有偏頗的態度？

答：是的，先生。特別是史托碧茲先生和我，因爲我倆是負責鐵路的工程的。我主持建築的事宜，史托碧茲則是我屬下的一名工程督察。他認爲華人不曉得回答問題。從他們吃的東西、其它事物，與及對華人的觀察，史托碧茲不認爲他們是適當的勞工人選。他沒有認爲華人可修築鐵路的想法。我們做了廣泛的宣傳，將召募白種勞工，並且許諾付出大量工資的告示分發至全州各地的郵局去。我們得到不足八百名的勞工。來來去去，我們的工作隊伍從來沒有超過八百名白種勞工的紀錄；糧期過後，人數可能減低至六百至七百名，下一次糧期前又可能回復到八百人之衆，但從不超過這數目。我們因此被迫嘗試聘用華工。我們以爲華人不宜粗重的工作，開始時祇是分配一些較輕便的工作崗位給他們。漸漸我們看出華工在這些工作範圍內表現得很好。當工作隊伍分散在各工地，並且感到工程必需急促地進行後，我們開始讓華人開鑿質地較鬆軟的地層，最後華工也能把持開鑿岩石的操作了。不論我們分配那些工作給華工，他們均有優良的表現。華工取得我們的信任。工程需要迅速地完成的時候，最佳的方法便是把華工調到這些工作崗位去。在這之前，我們總是讓白人勞工去負担的；而今天，任何龐大而短期內必需完成的工事，我一定會讓華工們去充當的。他們在艱巨的工程上有着更大的可信性和穩定的材能。

問：華工的毅力又如何？

答：他們與白人這方面最優異的沒有兩樣 。 我們在建造山頂隧道工程的時候試出華工這點優越性格。那段山脊的石質是非常堅硬的花崗岩豎坑。我們從豎坑底部分頭挖掘。由於隧道是穿越該山脈的主要工程，公司希望儘快完成它，並且要求我把最佳的康和爾開礦工人（Cornish） 找來，希望他們迅速完成鑿通隧道。我們到了維珍妮亞城，找着當地礦場裏的康和爾礦工，付出額外的薪酬，將他們送到隧道工場去。他們從豎坑的一頭開始挖鑿，而猜泥慢則從另一端開始。每星期日的早上，我們量度一週工程的進度；猜泥慢負責的那一方通常總是比康和爾礦工的一頭進展得更快，從來沒有一次是慢過對方的。換句話說，華工每星期所挖掘出來的岩石總比康和爾礦工挖的多。開鑿這條穿山的隧道是一件不斷要撞擊岩石的艱苦工事。華人能夠技巧地操縱鎚和鑽；在這項工程裏，他們證明了能夠達到康和爾礦工們享譽的最佳工作表現。他們取得別人的信賴，聰穎，並且實現允諾。

鐵路工程總監的看法

上述盧先生和曲架先生提及的史托碧茲先生作了如下的證供：

問：閣下是否負責大部份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工事？

答：我是建築工程的總監。

問：他們授與閣下監督勞工的權力？

答：對的。

問：閣下如何開始工程的？

答：開始時我們聘用白人勞工。

問：閣下有沒有改變聘用其它的工人？

答：有的。我們改爲聘用猜泥慢。我曾經廣泛地宣傳招聘數以千計的工人，可是從來沒有在同一時間內招募超過七百或八百位工人。我們最後增加到一萬人。在廣告的吸引下，不斷有人前來應徵，但是他們做得不長久，不能信賴。部份工人也許會逗留三數天，部份則

簡直不上工。其它有些工人則會做工至糧期，支了少許錢，便到酒吧狂飲，不再回工地去。最後，我們不得不找猜泥慢來。我一度極端歧視華工。我不相信用了他們之後，工程可以進展到那裏。我認爲在本國，除非我們給這些人一個機會，華人是不會在此類工程上有任何成功的表現；但是，我們確曾使它實現了，我們大量雇用了他們。雖然召募了華工之後，白人勞工的數目也隨之而增加，實質上，整條鐵路是猜泥慢完成的。最能幹的白人充當管工，拖拉車駕駛員和馬夫的職位。我相信後來白人勞工的數目增加到二千至二千五百位；那時華工的人數是一萬名。

問：閣下隨後改變了對華工的觀感？

答：改變了許多。

問：與白人勞工相比較，閣下認爲在內華達州西岸拿隧道的艱苦深入鑿石工程，華人的表現又如何呢？

答：與白人相等。

問：華工與白人相等？

答：對的。

問：我從那時的報章上看到，閣下偶把白人勞工和華工的工作進展相比較。

答：是的，確是如此。

問：通常是那一方面的人領先？

答：當他們偶然在橫坑上工作的時候，若果工作進展有差距，那一定是白人領先。最重要的却是山頂隧道的硬石工程。我們安排了最優秀的白人勞工到這部份工程去。那時候，我們認爲白人比猜泥慢優越。我們每天雖然祇是工作八小時，却無法找着足夠的白人工作。我們採用三班制，在不能夠有利地維持工事進展的時候，我們召募了一班猜泥慢。我記不清楚是那個階段了，大概是在工程進展到一半的時候，猜泥慢已經負起了全部工程的任務。至少白人發誓無論如何也不再與猜泥慢一起工作的。

問：這情形祇是發生在隧道的工事上 ， 還是全程均是如此？

答：祇是發生在隧道的工事上。其它的工程則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情形。我們總有白人工作；我們是會雇用任何一個肯工作的白人。

問：當白人勞工前來應徵職位的時候 ， 你是否會雇用他呢？

答：據我所知， 我們從來沒有拒絕過任何 前來應徵的白人。

不能如此迅速

大衛、高頓（David D. Colton）先生的證供如下：

問：閣下是否與南太平洋鐵路公司相稔？

答：是的。

問：閣下是該公司的副董事長還是董事長呢？

答：目前我是該公司的副董事長。

問：我相信閣下是雇用華工來完成鐵路的工程。

答：不全然是。

問：我指工程主要是由華工完成的，是嗎？

答：部份是對的。建築部門的主管卻全是由白人担任。

問：鐵路建築工程是否提供了許多白人就業的機會？

答：是的，先生。

問：我相信是政府資助閣下的鐵路工程，對嗎？

答：不對的，政府祇是在土地上資助我們。

問：納霍普（Lathop）的鐵路工程長多少？

答：從納霍普，說得準確一點，從高遜（Goshen），大概有四百至五百英哩的南太平洋鐵路線。

問：穿過農村地帶的是否佔了大部份？

答：佔了相當大部份。

問：鐵路是否打通了移民那大片土地上定居的途徑？

答：事實如此。

問：鐵路通車後，殖民在那區域的以那一階層的人居多？

答：定居在我們新的土地和州內的一般殖民最多。

問：白人殖民？

答：差不多全是白人，祇有少部份其它種族的人。他們大部份是來自西部各州，也有歐洲人。

問：沒有了華工，閣下能否完成建築該鐵路呢？

答：我不認爲工程能夠如此迅速地完成。沒有其它的事物足以使我們相信在相等的時間內，可以完成我們欲達到的目標。

問：閣下的工地擁有數千多工人？

答：是的，先生。

問：閣下能否全部聘用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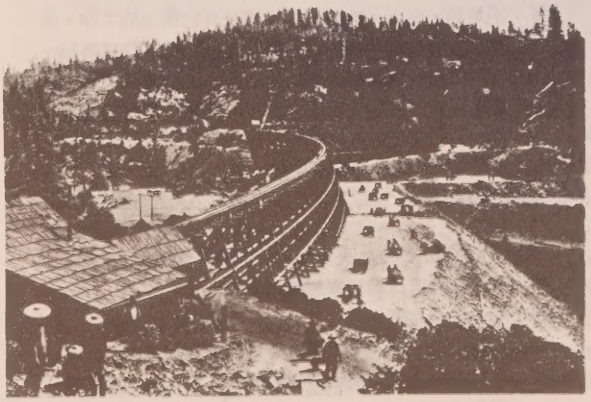
答：我認爲是沒有可能的。

問：閣下是否在建築中央和南太平洋鐵路時體驗到找不足白人勞工呢？

答：我們肯定是找不到那個人數。

問：這些鐵路工程對殖民和國家建設有什麼影响呢？

答：我認爲它們替本州和西岸做了不少工作。沒有這些鐵路，數以千畝計目前已經開墾了的土地也還得要被擱棄一段時間。



問：殖民是否隨着鐵路的通行而至？

答：是的，先生，而且還在不斷地增加。在本國，我們的鐵路建築剛好與其它地方的相反。其它的國家建築鐵路是爲了把人口輸出，而我們的鐵路却把人載到荒蕪的地方去，並且在那裏定居下來。

問：卽是說鐵路扮演了開荒的角色。

答：確是如此，先生。許多距離各殖民中心或農莊二十五至三十英哩的地方如今已經有人居住。就以今天聖祖昆（San Joaquin Valley）鐵路與三、四年前比較吧。那時一卡車便足夠應付需要上谷的人了。我曾經坐過二十五至三十英哩路程的火車而祇有二至三名同車的乘客，而今天卻需要四輛卡車才可以應付載客的需要。

問：建築鐵路支線對加州的繁榮又有那些影响呢？

答：我認爲加州的每一方面均蒙其利。對擁有鐵路的人而言，鐵路支線是無利潤可言的；但對打通了的農村卻有很大的益處。我認爲地價高漲了二百至一千倍差不多已經成爲規矩了。舉例來說，在沙連那斯谷（Salinas Valley）一帶的土地，我們買入的時候，每畝祇值二元，鐵路貫通後，市價已漲至二十五元至三十五元一畝了。

問：華人的能力又如何 ？ 他們對艱巨的工程的態度又怎樣？

答：我從沒有把華工分配到他們不能應付的工作崗位去。

問：南太平鐵路完成後 ， 閣下有沒有視察過它的工作成果？

答：有的，先生。

問：閣下知不知道是那一類人受雇在那裏呢？

答：我說過我們建築工程的隊伍裏，百份之七十五至八十是猜泥慢。我認爲是很適當地在這裏指出，據我所知，我們從來沒有拒絕過一個肯工作的白人勞工。

問：閣下支付給他們多少工資呢？是否與猜泥慢同等的工資？

答：不是的，先生。我們給他們雙倍於猜泥慢的工資，這已是不成文的規矩了。

問：閣下給他們雙倍的工資 ！ 他們是否做着雙倍的工作呢？

答：不是的，先生。他們做拖拉與及其它類別的工作。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猜泥慢能夠把拖拉的工作做得好。我們把拖拉駕駛部門分配給白人。建造橋樑或架柱橋蓋是白人的工作。除了木工外，其它一切有關的工作則由白人勞工担任。

使人滿意

韋斯・伊雲士（West Evans）先生的證供如下：

問：閣下是否廣泛地從事鐵路建築的呢？

答：可以說相當廣泛。

問：一般來說，閣下雇用那些勞工來從事建築呢？

答：我雇用白人勞工來製造鐵路枕木。在築路的時候我主要是雇用華工。

問：那一類勞工最使閣下滿意呢？

答：一般地說，猜泥慢比較令我們滿意。

問：在築路方面？

答：對的，先生，在築路方面。

問：閣下廣泛從事製造枕木到那一程度？

答：從太平洋鐵路開始修築的時候，我便一直在這行生意了。那大概是一八六三年吧。

問：供應太平洋鐵路及其它公司？

答：是的，先生。

問：業務最忙的時候，閣下雇用了多少白人呢？

答：大約四百至五百位。

問：閣下是否就是那位在一至二年前曾經在報章上刋登大量廣告召募白人勞工的韋斯・伊雲士呢？

答：閣下說的不錯，正是。

問：閣下召募了多少人呢？

答：我祇能夠找到很少的人。

問：閣下刋登廣告時希望找到多少位呢？

答：我需要一百名工人。

問：而閣下找到多少位呢？

答：我猜大概是二十至三十名吧。我把超過一百名工人送到工場去，他們抵埗後卻不願意工作。

問：是什麼原因呢？

答：他們認爲工作太辛苦。

問：閣下能夠留下多少人呢？

答：二十至三十名；可能是三十名。

問：他們是合約勞工還是預先聲明工資的呢？

答：築路的以月薪計，而造枕木的則以件計。

問：是那一條鐵路線呢？

答：是曼多仙奴（Mendocino）線。

問：閣下是否認爲加州有過多的勞工呢？

答：我沒有法子用他們。目前我是需要工人的，但他們不受雇。

問：閣下給工人的薪酬多少？

答：築路工人的月薪是四十元開始，並且包食宿。某工人值得更多報酬的話，我們是照樣付給他的。

問：閣下認爲華人是否對加州有益呢？

答：我認爲確是如此。

問：是否有很大的益處？

答：我無法可以想像沒有了華工，我們的工程怎樣可以完成。至少我已經完成了一些倘若不是雇用華工便沒法完成的工作。

問：白人一樣能夠做猜泥慢做的工作，不是嗎？

答：哦，自然！祇是，請相信我，我設法找白人來完成這件工程，而我是失敗了的。

思雅書舍

加拿大中文書籍最齊備的書店

美西中國勞工運動

無支祈

緒　言

中國勞工從神州大陸上，飄洋過海，來到有金山之稱的美洲西海岸工作，屈指一算也有一百二十多年歷史了。其間的辛酸血淚史實不足與外人道。從歷史文獻考查中，中國勞工受白種人雇主剝削、壓搾、迫害等事件多不勝數，更非三言兩語可以解說明白；同時，這種不良現象並不曾隨着時代的轉變而有所改良。本質上，勞工們仍然受資本家玩弄於掌上。爲了說明工人們不是無言的一羣，茲分中國勞工於美洲西岸的運動史爲三期（一）拓荒期（一八五零至一九零零）（二）工運發展期（一九零零至一九四零）（三）沉默期（一九四零至一九六零）。

拓荒期

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列强瓜分中國國土，賦稅日益繁重，導致農業經濟破產，出現大量無業游民；是時，北美洲發現金礦的消息傳入沿海各城市內，許多農民爲了一家生計，毅然與船務公司簽定合約，登上開赴舊金山的輪船上。在途中，不少工人抵受不住氣候——傳染病的侵襲，倒斃於船上。據估計約有五分之一工人死於途中。

抵埠後，中國勞工分別投入各行業工作。

（甲）礦工： 開礦是中國勞工的主要行業之一，許多被認爲無利可圖而廢棄的礦場，經中國礦工再度開發以後，生產量立即增加。逐漸整個行業的勞動力皆來自中國礦工上。加州政府針對此點頒佈徵收外國礦工稅(Foreign Miner's Tax）抵制中國礦工。加州政府於一八五九年至一八七零年期共收入五千八百萬美元稅金。

（乙）鐵路工人： 西岸的越洲鐵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缺乏工人，鐵路公司招請中國勞工補充勞動力的不足。中國勞工竟佔工人人數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國勞工的刻苦耐勞，日出而作，日入而歸；工作工具祇有鋤頭及火藥，但是憑着無比的毅力，克服所有技術上的困難；但是他們的月薪祇有二十六元，這與他們付出的代價實不相稱。

於一八七六年，爲數七千名中國鐵路工人曾起來罷工，抗議鐵路公司的剝削，要求公司加薪及縮短工作時間至八小時。由於缺乏輿論及工會的支持，一週之後，罷工行動就不了了之。

（丙）農工： 由於外國礦工稅的頒佈，一部份礦工轉移成爲農工，替白種人開發那些每畝祇值一塊錢的沼澤地，但是他們所得的報酬僅是每方碼一毛錢，倒不如說是壓搾中國人的血汗。

（丁）漁民： 同樣是由於外國礦工稅的頒佈，一部份礦工遂改行捕魚，加州政府並沒有因此放棄剝削的機會，這批貧苦的漁民一樣備受加州政府的諸多限制及繳納重稅。

（戊）手工業工人： 拓荒時期無論是菸草、紡織、造鞋、縫紉等行業皆依賴中國勞工；基於這條件下，中國勞工再不受雇主的擺佈，知道如果要爭取合理的權益，一定要以罷工作爲談判的武器。

一八七六年的春天，美國全面的經濟衰退連帶影响加州的經濟，令到那些認爲中國勞工奪去了他們的工作崗位的白種人找到很好的藉口。他們將經濟衰退的原因歸咎於中國勞工身上。「中國人回老家去」之聲高唱入雲，三藩市召開特別委員會，商討排擠華人的運動。一間中國勞工工作的羊毛廠竟要百多名警察保護下，才可以避免滋事份子的騷擾，安心工作。緊張的氣氛一天比一天濃厚，卒於七月二十四日，一羣暴徒於三藩市焚燒華人的製衣廠，攻擊華人，縱火焚毀太平洋郵船公司的船塢，理由是該公司載運中國勞工來美洲。亂事經過三天才告平息；但暴亂的氣氛却像傳染病般蔓延到三藩市以外的地方去，華人被殺戮，樓宇被人縱火焚燒已不再是新聞了。

一八八零年，加州參議員布符（Booth）在國會提出排華議案，得到參衆二院通過，最後却遭羅斯福總統根據蒲安臣條約（Burlingame Treaty Amendent）否決這議案。

拓荒時期，中國勞工並沒有工會組織的。唐人社區內有六大公司存在，他們是畧具代表性的華人組織，對內他們負責處理唐人社區內的事務、訴訟、工運，對外他們代表唐人社區與市政府交涉、談判。

工運發展期

二十世紀初，中國人開始建立自己的企業於唐人社區內，這股新興勢力的東主並不本着同是中國人的精神善待自己的同胞，而是一如白種人雇主般剝削自己的同胞，中國勞工爲了爭取應得的權益，組成自己的公會，採取一致行動以加强內部的組織力。中國勞工成立的工會計有車衣業的聯合公會（Union Guild)，洗衣業的世福堂 (Sai Fook Tong)，罐頭工人的工人互助聯會 (Chinese Workers Mutual Aid Association)，同時也加入當地的工業聯會(C I O）及工聯（Tuel）成爲他們的會員成員，目的是與當地工人打成一片，站在同一陣線之上。一九三七年，一百五十名中國籍的廚房工人參加酒店同業的罷工行

華工在加國歷史的片斷

—李懷敏—

根據比較可信的紀錄，華人最初抵達加拿大是以礦工的身份爲最多。公元一八五八年開始的費沙河（Fraser River）金礦熱潮吸引了大批華工從美國加尼福尼亞州廢置了的礦場湧入加拿大西岸的卑詩省。中國坑（China Bar）和中國溪（China Brook）等地方名稱散佈在加西礦區內，成爲華人在加拿大採礦工業裏的血汗紀念。華工在那些金沙稀薄，或是由於利潤不多而被拋棄的礦場裏淘金，所獲取的往往被掠奪或以低價出售。有時爲了生計，不得不轉業，開採白人礦工不屑擁有的玉石礦穴。透過堅忍耐勞和儉約，華人將積蓄在各地礦區的邊緣建立唐人街。部份華工則將自己辛勤賺來的金錢帶回祖家；留在加國的華人開始以洗衣工人、公園園丁和家僕的形式來謀生。

早期加拿大華人歷史最大的一次移民潮發生在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四年間，大約一萬五千名華工應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Company）的召募，從廣東前來加拿大西部，開始動工穿越洛磯山脈的艱苦鐵路工程。據說每一里路鐵路工程均有一名華工葬身在那裏。從十八世紀的中期開始，加拿大一直視華人爲廉價勞力供應的來源，在不同的艱巨的工程中，這些被稱爲「咕哩」（卽苦力Coolies）的華工担當最困難的任務，收入却十分低微。可是，加拿大政府並沒有讓華工可以成爲加國公民的打算。從至少兩點事實，我們可以看出加拿大政府當時的心態。第一，加拿大政府差不多全然拒絕華人婦女入境；第二，透過若干社會的律例，禁止華人與白人婦女發生任何關係。明顯地，這是加國政府特意維持在加華人扮演過渡性的開荒者，任務完成後，便得離開加國，不能在此落地生根。

十九世紀末期，除了加拿大聯邦政府對任何欲移民來加的人實施一般移民條款之外，華人受到更多額外專門對付他們的特殊規例。這些規例大部份是應卑詩省的立法議會而設的。早在一八七二年，卑詩省立法議會便曾經要求加拿大聯邦政府向每一位進入該省的華人徵收人頭稅（Head Tax）。一八八六年正式開始徵收附加於華人新移民的聯邦稅。一八九八年人頭稅的稅額是每位五十元加幣，一九〇三年則倡議增加至每位五百元的巨大數額，於次年元旦日開始徵收。（請參閱本刊第二期，節錄梁啓超的「北美洲華僑史之二」）每次人頭稅額之增加總是由卑詩省政府向渥太華聯邦政府大施壓力後的結果，不但是由於種族歧視、工運爭執等考慮因素，卑詩省政府安排取回人頭稅收入的一半稅額也是其中主要因素。單祇是人頭稅，華人在一八八六年至一九二三年間曾經付出超過二千二百萬元加幣的巨大數額。從進入加境的華工身上分潤這筆龐大的項稅，絕不是卑詩省政府能夠輕易放棄的。

一八七五年卑詩省政府取締了該省華人的選舉投票權利。十年以後，中部的沙氏革全雲省的政府頒佈了同樣的禁令，禁止華人參與任何公開投票選舉的政治活動。加拿大的最高法院還支持此種歧視的禁令。一九一四年，最高法院維持卑詩省褫奪華人公民權利（卽選舉權）的原議。一九一九年，卑詩省在加國國會的代表提出反對華人在全國大選中仍然保有投票權利的動議。加拿大政府終於在一九二〇年的多明尼安公民權議案裏（Dominion Franchise Bill）明文規定：

加拿大各省的法律規定：由於種族背景，任何沒有選舉該省立法議會會員權利的人士，在此欽成文法例下，均喪失在該省選舉的權利。

在省的選民名單上被排除後，個人的就業機會也因此而大大地受到影响。一八九九年，卑詩省政府補充了她的售酒牌照法案，規定任何在選民名單上沒有開列姓名的人士均不得申請賣酒牌照，有效地拒絕華人經營售酒生意。卑詩省的法律公會和葯劑師公會的附則規定不准華人執業律師或葯劑師，奪去華人在這兩行業內修讀和實習的機會。在其它需要執照的行業裏，華人也是直截地被拒絕參與。一八七八年，卑詩省政府通過了一條不但禁止華人在省政府支助下的工程裏受雇，並且着令每一位年齡超過十二歲的華人必需持有一張每季繳款十元的就業執照；未能遵守這條法則的將被罰款百元或被監禁，或是以監禁替代罰款的法案。一八八四年，加政府通過的華人規範法案（Chinese Regulation Act），禁止任何雇主聘用沒有就業執照的華工。一八九〇年，在安全措施的僞裝借口下，卑詩省政府透過「煤礦規則補充法案」（Coal Mines Regulation Amendment Act），阻止礦產工業聘用華工。儘管上述的三條歧視華工的成文法例最後被法庭判決否定了，它們還是施行一段時間後才被取消的。一八七八年的執照令和一八八四年的「華人規則法案」在立法議會通過後的一至二年間被法庭宣判無效。可是，「煤礦規則補充法案」在法律迴辭的狡猾掩飾下行使了一段頗長的時期，十三年後才由司法部重新與以審視：

這些規則……並非是真正關於煤礦的規則，而是用來褫奪華人在卑詩省定居的權利，實質上是禁止華人到該省居住，從而禁止他們繼續在該省居住下去。

基於上述司法部的審核，「煤礦規則補充法案」終於被否決了。

卑詩省並不是加拿大唯一通過排斥華人的歧視法案的省份。一九一二年沙氏革全雲省頒佈禁止白人婦女在華人或日本人屬下的任何行業（包括餐館和洗衣館）內工作。沙省在頒佈這些法令的時候，全省華人和日本人的合計數目是五十七人，大部份還是以務農爲生的。二年後，安大畧省政府也通過了一條類似的法案，祇是它從來沒有認眞地被執行。魁北克省的華人也未能逃過被受歧視的厄運。除了慈善機構和合作經營的洗衣館外，魁北克政府決意增加所有其它洗衣館的牌照費和督察費用。打擊最大的自然是唐人經營的洗衣館了。

儘管卑詩省在一九二五年通過的「男工最低薪金法案」（Male Minimum Wage Act）有着明顯的改良主義的傾向，該法案還是巧妙地被利用來抵制華工。該法案規定了男工的最低薪額，這數字是高出一般華工的平均收入，減少了僱主聘用廉價勞工的吸引力。這法例施行後，華人的遭遇可以在卑詩省的林木工業裏看到；木場主人開始轉移聘用白種工人，華工大量失業。一九二七年，卑詩省立法議會的「東方人在省內活動報告書」上說，東方工人（主要是華人和日本人）在木材工業的比率，已從一九一九年的百分之四十强，降至一九二五年的百份之二十的微弱數字了。

卑詩省的貿易聯會大力地支持排擠華人就業機會凡數十年之久。華工「願意」接受極度低微的工資，對標準薪酬制存着很大的威脅，從狹隘的、個人經濟利益的勞工立場上看，這是一個相當敏感的題目。不幸的是，有組織的工人不僅未能運用他們的集體力量，替不論那個種族的工人爭取更高的最低薪酬，反而視華工爲就職競爭的威脅。工會成員與其它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團體聯系在一起。這些團體包括「白色加拿大協會」（White Canada Associati on）和「排斥亞洲人同盟」（Asiatic Exclusion League）。有一點必須指出，在這悠久的、苦澀的、有時甚至是暴力的鬥爭中，卑詩省的商人從來沒有發表反對聘用華工作爲利用工具的公開言論。本世紀初期，鬥爭和利用一直是卑詩省工運的特色。

工運在家多涉及種族的憎恨主義的場合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九〇七年，溫哥華發生了暴民襲擊該市唐人社區的事件。工人和工會裏的好戰份子參加了這次暴亂，縱火和搶掠華人的財產。一九一三年當溫哥華島的礦場主人開始聘用華工担任破壞罷工的工作傳出後，工人爆發了另一次暴亂。由本世紀初至四十年代這段時間，卑詩省的工藝工會（British Columbia craft union）拒絕任何華工加入該組織。雖然這些持久不斷的排斥政策不像偶爾發生的暴力行爲般戲劇化，但以其影响之深遠，這些行動對華工造成更大的損害。

到了本世紀的三十年代，加人開始懷疑排擠東方人（主要是華人和日本人）的政策是否明智之舉。一九三八年，組織起來的工人和屬於社會黨的ＣＣＦ工人組織，支持在勃巴灣（Blubber Bay）發生的一次特別激烈的石灰工場的華工罷工運動，勇敢地面對警察的鎮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關華人移民法案的討論很多已經從工會會議的議程上取消，自然這是與工會減低反對一般移民的態度有着很大的關係。所有不同種族背境的工人受到同等的最低工資額的保障制度，使工會的工人不再將華工視爲危害他們就業的外來威脅。無庸諱言，排擠東方人的偏頗態度是加拿大歷史上最敵意的種族歧視行爲。部份敵意的行爲是由屬於大多數人的大不列顛的移民挑引起的；主要原因還是很多加拿大人害怕「不列顛」將會因爲東方人種的滲入而衰弱起來。他們認爲由於事物的本質，華人無論怎樣也不會成爲當地的一員，致使當地文化趨於不穩定，因而視華人爲生物學上的異類，在各方面都較白人低下的一個民族。CCF 黨在加拿大全國的第一位黨魁活士和夫（J. J.Woodsworth），一位曾經被稱爲加拿大政壇上的「聖人」，在一九〇八年寫道：「明顯地，由於華人不能夠同化於當地社會，加拿大拒絕彼等入境應該是無可爭論的問題。」此種反映一般白人意向的願望終於在一九二一年卑詩省立法議會通過的移民法案修改議程中表露無遺。該修改條文說：「爲了卑詩省人民的願望，即是說，本省祇是保留給歐洲人種，應該盡可能全然地禁止亞洲移民來到卑詩省。」此種歧視的意向在四份之一世紀後（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仍然在加國最上層的政治圈子內流傳着。一九四七年，加拿大總理麥金西、京（Mckenzie King）還說：「這是內政的問題……加拿大人民不希望由於大量的移民而改變自己的基本特徵。大量的東方移民將轉移加拿大人民的組合成份。」

種族偏見影响的深遠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風氣仍然普遍地存在加國社會裏，使近年間的風氣轉移更爲顯著。六十年代北美洲經濟的蓬勃，一度使華人就業的機會增加，與白種僱員間的關係表面上也相當融洽。華人子弟和新移民由於學歷的增長，漸能打進加國的所謂上層社會的行業，給華人在加國社會的地位提高了不少。踏入七十年代，一連串的經濟衰頹，普遍的失業率增加，於是老問題又再次借屍還魂。甚麼新移民搶去了職位啦，華人不能同化於當地社會啦等等輿論又再次興起。這些風聲不是自從華人在上世紀中期，踏足在加拿大的時候，便開始不斷在這塊土地上吹着的嗎？如今又一度湧起，漸滙成新的氣候。佔華人人口比率相當高的雇員身份的華人又怎樣從加國華工的早期歷史中吸取教訓，從而抵抗可能將要到來的新的壓力呢，是每一個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士值得深思的。上文述及的祇是華工早期在加拿大所遭遇到的不平等待遇的極少部份。由於缺乏詳盡的資料，我們未能報導華工如何在這些艱苦的歲月中不斷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爭取自己應得的權利和待遇。資料的缺乏並不一定說明華工祇是沉默的一羣。在必要的時候，華工是會爲爭取自己的權益而努力的！

本文參考資料：

（1）British Columbia：Legislature Assembly Report on Oriental Activities Within the Province.

（2）Canada and the Canadians by George woodco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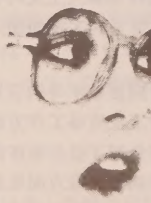
（3）The Other Canadians……Profiles of Six Minorities. by Davis, M., & Krauter, J.F.

（4）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Book IV： The 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the Other Ethnic Groups.

陳氏眼鏡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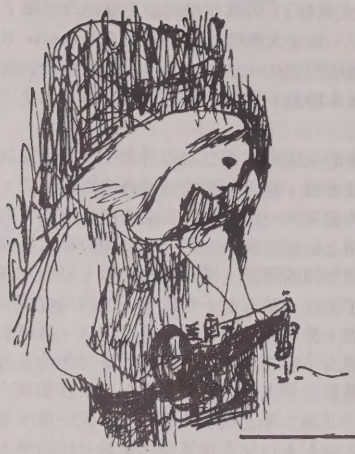
價錢最平 即配有 驗光即 隱形眼鏡

特別優待 新舊顧客 款式最多 品質高貴



Gerrard
Walton
Dundas
Bay

LUCLIFF PLACE
電話 595-1665
多倫多比街七百號地下



多倫多目前唯一的工人組織

華人製衣業聯誼會

日期：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
地點：華人製衣業聯誼會（以下簡稱衣聯會）會所
列席：張子泉先生（衣聯會主席，簡稱張）、關民楚先生（衣聯會秘書，簡稱關）
訪問、整理：海外述林編輯委員會

問：請問華人製衣聯誼會是何時成立的？

張：華人製衣聯誼會是在一九七〇年開始籌辦，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二日正式成立的。籌辦時只有二十多人，成立時正式會員有一百七十多人。

問：是什麼原因促使你們興起創辦衣聯會的念頭？

張：當我們初來到加拿大時，由於語言不通，人地生疏，欲找尋職業，又不知從何處着手；比我們更早到加拿大的父兄，多數做餐館或洗衣，製衣業方面的情況，沒有人可以給我們提供意見。到後來找到工作，對於工廠裏的待遇是否合理等問題又不過問。在這情形下，我們一批工友覺得這樣對我們工友本身的利益很不利。經過討論後，大家都認爲有成立衣聯會的必要，讓工友們有一團聚的地方，就可以互相討論，交換各自的工作經驗，例如待遇方面是否合理，工作條件如何，一旦失業怎樣到別家工廠找工作。有了一個團聚的地方，工友們便可以互相幫助，有工作的可以替失業的打聽是否有空缺。我們這一批先到埠的曾經嘗試過不懂語言、找尋工作的痛苦，我們不希望以後來的再經歷這些不方便。衣聯會成立後，新來的移民可以來衣聯會尋求幫助，正所謂人多好辦事。現在衣聯會已從成立時的一百七十多名會員發展到二百四十多名。這在一方面來說是發展快的。但多倫多製衣業的華人工友逐漸增加，接近一千人了，所以我們對目前會員的數量是不感到滿足的。衣誼會的性質，是純粹爲華人工友的利益打算，我們沒有甚麼政治目的，希望更多的工友能加入衣聯會，共同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

問：在過去多年來，衣聯會對貫徹本身的宗旨方面的成績是否感到滿意？例如說在替工友找尋工作方面？

張：過去年餘來，我們曾經介紹了很多新移民找尋製衣的工作，直接介紹或間接介紹都有，這方面是盡力的。

問：剛才張先生說現在華人製衣工友差不多有一千人，據你所知，這一千工友替外國資本家工作的多，還是替華人資本家工作的多？

張：這裏華資製衣工廠很少，好像只有三間，而且規模亦不大，這或許與華人在多倫多興辦製衣業的歷史短有關；所以華人製衣工友是絕大多數替外國資本工廠做工的。

問：在這大約一千名華人製衣工友中，是男性工友比例佔多，還是女性工友比例佔多？

張：是女性工友佔多，我相信男性工友最多只佔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是女性工友，衣聯會會員也是以女性居多，但相差不大，可能是女性工友參加團體活動的時間不多，她們要照顧家務；同時或許中國傳統觀念亦有影响，婦女不習慣參加團體活動，我希望這樣的情形會有所改變，女性工友不要把自己關在家裏，應該參加健康的團體活動。

問：現時在多倫多的製衣行業的工友，是不是大多在香港時亦是做製衣這一行的？

張：據我所知，大部份工友在香港時已是做這一行的，我相信百分之九十都是，我本人在香港便是做製衣的。

問：我想補充一點，現在開始已有越來越多新入行的工友，這是近一、兩年來的事情，因爲製衣是很容易上手的一門行業。

張：（插入）而且人力部（Manpower）亦有訓練新移民學製衣方面的技能，小部份工友是在這裏才接受訓練的。

問：你們現在是一個聯誼會，不是正式的工會，是什麼原因使你們只註冊成爲聯誼會，而不註冊成爲工會？因爲以你們替工友爭取權益的宗旨看，你們與工會的性質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張：這主要是我們對法律方面的認識不夠，恐怕與原來已經有的加拿大製衣工會有法律上的衝突。

問：你們有沒有法律顧問？

張：我們沒有正式的法律顧問，不過畢志華律師對衣聯會有很大的幫助，我們當初登記時，畢律師就義務替我們做。有次某工廠關閉，工友們追討欠薪，畢律師也幫助我們。

問：去年第六區選舉市議員時，你們是支持鄧協與史巴勞的，可否告訴我們爲什麼衣聯會選擇了鄧協與史巴勞？

關：這方面是我負責的。我們支持鄧協與史巴勞，是由於我們覺得和華彼德、連諾斯基比較，鄧協與史巴勞是更接近華人工友的利益，我們沒有理由支持開黃色架步的畢彼德與連諾斯基，況且鄧協與史巴勞並不屬於某黨，某一派，衣聯會不是政治上支持什麼黨派。

問：張先生認爲華人工友的團結性怎樣？

張：這樣說，在已參加了衣聯會的工衣來說，我們是很團結的，譬如某一工友失業，其他工友就會自動替他留意空缺，甚至直接介紹工作給他。衣聯會到今天爲止，擁有的會員只佔全部華人製衣工友的百分之二十，一方面是因爲我們的組織能力不夠，宣傳工作不夠，另方面是一部份工友們仍然不曉得參加工人團體的重要性，有些甚至根本不想參加團體活動。

問：張先生認爲華人製衣工友得到的待遇是否已相當合理？他們應有的權益是否已得到相當的保障？

張：這要分開來說，在薪金方面，華人製衣工友得到的待遇，與其他民族的工友是一樣的。我們爭取的，是工作分配方面是否合理？由於語言不通，而外資工廠的管工又多是外國人，有時分配到的工作既艱難，收入又不多，工友就感到不滿。衣聯會對於這種情形，通常大家討論，指導工友們如何和廠方交涉，必要時或派人和工廠方面交涉；這類情形經常發生，在衣聯會未正式成立前，我們已經碰到過，所以更覺得有成立衣聯會的必要。

問：你們是不是以衣聯會的名義和廠方交涉？收效如何？

張：目前我們仍然不能以衣聯會的名義和廠方交涉，我們只能向工友建議，或其他工友以私人名義去做。收效方面，由於現在有了衣聯會，工友在向廠方爭取之時，態度可以强硬一點；以前沒有衣聯會，我們只能忍氣吞聲，因爲恐怕一旦失去了工作，找工作又不容易。現在則不同，衣聯會裏工友衆多，一旦爭取不來，辭工後找工作也比較容易。

關：工友們加入了衣聯會後，有了支持，也放胆說話了。

問：除了這一類替工友爭取權益的工作之外，衣聯會還有些什麼的活動？

張：我們還舉辦了英文班，每星期兩課，星期二、星期四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教工友一般在工廠裏常用的會話。現在已辦了一期，工友們亦覺得很有用。另外我們間中有戶外旅行，喜慶節日搞些聚餐之類的康樂活動。最近有工人提議辦一個國樂組，我們也是鼓勵的。

問：衣聯會在未來有什麼幫助華人製衣工友的計劃？展望又如何？

張：這或許不會是在很短暫的將來。但我們希望除了英文班之外，設立技術訓練班，讓一些新入行而技術不很熟練的工友有受訓的機會，同時讓一些有意做製衣的新移民也享有更多的機會。展望將來，我們很希望除了製衣業外，其他行業的華人也開始團結起來，成立類似的工人組織。，不單是同一行業，而且是行業與行業之間的工人的聯繫，所有華人工友聯結在一起。

問：不知道其他城市有沒有類似衣聯會性質的華人工友團體？你們有打算和他們建立聯繫嗎？

關：據我所知，我們的衣聯會是全加拿大唯一的華人工友組織。

張：我們希望其他城市亦會出現同樣華人工友團體，衣聯會一定會和他們建立聯繫，因爲這關係到華人在加拿大的移動，假若其他城市有同樣組織，和我們有直接聯繫的話，工友就會去到那個城市亦會得到照應，這是對華人的團結很重要的。

列，爭取每週工作四十小時，增加每週工酬。爲期三個月的罷工，中國勞工站在罷工行列的最前線，緊守自己的崗位。這對於中國勞工來說是罕見的，中文文摘的社論指出中外勞工排除種族界限，齊心合力爲同一目標而努力，而且更促進雙方間的了解。在此之前，一九三四年，美國大不景氣，三藩市舉行罷市，要求政府想出妥善的方法安置大量失業的工人，中國勞工也响應此行動。是日，全唐人社區罷市，工人們更參加遊行行列。

中國勞工不獨對工運的醒覺，並且關心祖國的命運。民國的建立，與抗日戰爭，北美洲的中國勞工曾經出了不少力量，無論在精神上，金錢上，工人們盡了他們力量協助祖國走上軌道。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勞工聯同學生、商人遊行示威抗議美國政府售賣軍火器材予日本，甚而打翻日本代表的座駕車。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八年，唐人社區由最大的外資製衣場(NDS)的工人抗議、廠方用兼職的方式雇用工人，要求廠方以全職工人的身份雇用他們，每日工作九小時。廠方並不答允工人的要求，工人經投票決定罷工十四週，廠方始終不屈服，他們寧可結束營業，到洛杉磯另起爐灶，也不願意給工人絲毫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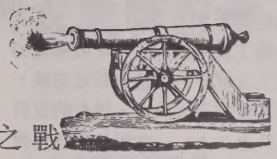
沉默期

二次大戰期間，不少工人被徵入伍，工業缺乏人手，於是許多行業開放予中國勞工。大戰一旦結束，情勢又再度改變，一股新的排華勢力抬頭，今次是紅色恐怖。美國人認爲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共產黨的顛覆份子，會危害國家安全，同時與他們自由民主政策相對立，也威脅他們的經濟侵畧政策，一切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衝突。在蔣介石的好友麥卡錫議員發動下，一股紅色逆流橫掃美國，所有被嫌疑爲共產黨徒的都被關進監獄或集中營內。這股逆流甚至打擊荷李活的電影從業員，鬧出荷李活十君子事件，由此可想到當時的中國人更加誠惶誠恐，爲了明哲保身，一切工人運動便沉靜下來。

結　語

一九六零年以後，美國政府採取較開放的政策，工人運動得以再度復甦，展開歷史新的一頁，筆者因資料上的缺乏，無從作全面性客觀的敍述，所以就於一九六零年打住。

龍城鐵翼戰



杜魯多與雷域克之戰

惠鷹

花花公子型的龍城警長現正面對他上任八年多來的最大危機，在他所管轄的十一個農莊中，有一個剛剛奪位成功的大莊主，竟揚言要另起爐灶，由他自己一手一腳去料理他的農務，並要與警長脫離管轄權的連系；這名莊主更走到另一個鄰邦大鎮去，向當地的銀行家遊說，希望能獲得他們經濟上支持，好使他的揚言更具聲勢，及在要求自主時更具信心。

龍城警長於近幾年來，在其所料理的十多個農莊中的聲望已日漸下降，但他比較其他市鎮的警長來得幸運，因爲在他的小鎮中，並沒有什麼特別具有天賦的人物出現，既然沒有對手，龍城警長便苟且地幹下去。

雖然一向以來，今次發生問題的大農莊的居民已是作怪多端之徒，但龍城警長實在並不多花時間去理會這農莊，因爲他把其一名得意門生安置在那裏當莊主，而他只一心一意地對付另一幫希望能奪得他的職位的人士，怎料他門生所用的手下皆是草包庸材，把莊務弄得烏烟瘴氣，而給造反派奪了實權，這眞是氣得龍城警長半死。

新「造反」莊主到目前尚未算獲得大部份莊民的支持，同意他脫離龍城而自成市鎮，龍城警長就是看準了這點，並於那名莊主在鄰近大鎮返回後，馬上要求與他決鬥，以他們的職位作爲賭注，警長的戰書已下，目前要看的是莊主將在何時接納挑戰。

以上不是甚麼電影的橋段，而是發生在此時此地的現實，龍城警長是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而大莊主則是魁北省的首長雷域克，而他們的「決鬥」仍是魁省的那個全民投票。

杜魯多在拋下戰書後，曾向各界表示不要把這事刻劃爲兩個人物的槍戰決鬥場面，這事不是某方或勝或敗那般簡單，而只是爲保障加拿大能繼續强壯及自由的一條途徑。「龍城警長」同時指出：自魁北克人黨取得去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大選而登台後，魁省的前景便陷於不安及不穩定，他希望雷域克不要把全民投票拖得太久，因爲這對魁省的經濟有長遠的影響，而如魁北克人黨不早作決定魁省是否應獨立的全民投票，聯邦政府將插手主動地舉辦其有關這題目的全民投票。

這新「爭執」起於一月廿五日，剛好在雷域克上台後兩個月零十天，這位魁北克人黨黨魁南飛到紐約去遊說美國大商賈，他在紐約希爾頓酒店內，面對一千六百名華爾街主腦人物，列舉出魁北克省政府的財經政策，及「獨立」後的施政方針。

雷域克對紐約經濟學會叙餐會的出席人士稱：魁北克獨立自治是無可避免的，正如十三個美國殖民地在二百年前脫離英國獨立一般；這次他可算是賣盡風情地去幹，目的不過希望能取得這班商賈大亨的信心，因爲魁省政府在今後四年間，將需要向這晚餐席上的人士貸取數億元計的款項，特別是當魁省要步上獨立自主之途徑的時候。

這位魁省首長除强調魁北克必須獨立外，並特別向美國商賈表示魁省政府將會是如何安定及負責任。他說：以魁省的面積而言，它是最富裕及最具生產力的地方之一，强調用漸進及極之民主的方式足以保證魁省如過去一般，將繼續成爲世界上最穩定的社會之一；就是以這能力，實已足夠顯示出魁省具有處變不驚的韌力，這皆是魁北克經濟及社會定力的最佳保證。

在演詞中，他進一步地透露魁省在獨立後與加國的關係，他表示除與加國組織一共同海關外，他的「國家」並可能與加國同用一種貨幣，雷域克說：他的政府所用的是一個社會民主制度，將歡迎外界投資，但將規定這些投資在開支時皆是按其能力而支出；同時，他的政府並不計劃加稅，在另一方面，魁省政府已與勞資雙方進行協商，希望能改善該省的社會環境。

他說：「經過我們社會上伙伴的共同估計後，在今後數月間，在具有共同發展目的，合理想的增長率，及較佳的資源分配下，我們將會鞏固一個新的工作氣氛。」他表示：他的政府已計劃在春季間舉行一個經濟高峯會議，以探討這理論的可行性。

爲減低外資的恐懼，雷域克在經濟學會的晚餐席上向美國商界保證：魁北克人黨並不打算採取「國有化」的政策；他說該黨是個現實的黨派，而不是個理想主義黨派，他們唯一希望「國有化」的工業，只是該省的石棉工業。

他最後說：「我們堅決地深信我們將可以成功，唯一的理由是，我們不可能不這樣做的。」

在隔天，紐約金融市場上的各項魁北克省美元公債下跌了五角至一元二角五仙不等；爲期三十五年的魁省水電公司債券由一月廿五日的百份之九十二點三七五，降至百份之九十一點八七五，世界最大石棉的公司 Manville Corp. 的股票，也因雷域克的一番話每股下跌了二元五角，至廿八元一股。

而在同一天，加國總理杜魯多在國會上答覆在野黨議員的質詢時，一再强調魁北克人黨的分離主義是沒方法可實施出來的，杜魯多同時亦在下議院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表示：從雷域克的演辭中，更顯現出魁北克人黨要求分離口號的弱點，因爲雷域克所例舉出的政策的大部份，目前均可由留在聯邦制度下的省政府所辦到。他說：魁省首長把該省要求獨立之事與美國獨立之事相提並論，實在極爲荒謬，因爲魁省不是一個殖民地，同時它在聯邦政府中具有很大的權力。

杜魯多說：聯邦政府即將在魁省舉行五個小選，這些小選將可被視作小型的全民投票，以分辨分離主義的弱點，及聯邦政體的長處，他同時表示：魁北克人黨最近違背了該省所作的

兩項諾言：不再參加聯邦政府的反通貨膨脹計劃，及取銷了人力中心給予新移民的英語課程，而聯邦政府將設法恢復英語課程。

加國總理表示：自從他成爲總理後，他的政府一直在嘗試去證實給魁省的居民看，他們成爲加拿大一部份，及留在聯邦政府內，是對他們有利的；同時，他的政府亦不斷地向加國其他國民表示將魁省留在聯邦政府內，對他們亦同樣有利。

他說：「但我們不相信只說互相愛護已爲足夠，最重的還是使加國其他地區皆能採納一些政策，足以讓魁省居民感到他們是加國不可分割 的一部份 ， 而他們在加國能享有同等權利 。」

杜魯多亦指出：魁北克人黨是在隱藏着他們的分離口號後才獲得足夠票數取勝，這點已可證明魁省居民所要求的不是獨立自主，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雷域克及其政黨似乎忘記了，他們的分離思想實在並未取得該省居民的贊同。

他說：雷域克在紐約所說的似乎甚少，他只數出他的政府將要辦的事情，而沒有一樣具有修改憲法的必要，他所提出的包括辦好政府機構，按次序而行事，改善社會保障，及「國有化」石棉工業，這些東西實不需要執行「分離主義」的。

他繼續證實魁省居民是不相信分離主義 ， 但他們將會這樣做的。問題只因加國其他地方不設法了解該省留在聯邦政府內的條件，而聯邦政府在過去一年來一直在宣傳及留意這些條件。

杜魯多指向雷域克的攻勢可算是馬不停蹄地進行，在一月廿八日，這位加國總理在雷域克的大本營魁北克市內，正式向魁北克人黨黨魁下戰書，杜魯多在魁省商會的叙會上，在一千五百名魁省商家的面前，要求雷域克馬上舉行決定該省前途的全民投票，杜魯多說：如魁省居民選擇獨立，他將離開聯邦政壇，而如魁省居民選擇聯邦政府，「他的對手」亦應辭職下台，在獲得決定後，雙方在十五年內不再舊事重提。戰書已擲到雷域克的腳前 ， 下一步要看這位新上任魁省首長如何去對付了。

安大畧省首長戴維斯指摘杜雷兩人的行動實爲罵戰，他說這個冗長的爭論實在已有一段相當久的歷史，而目前要辦的是冷靜地仔細去研究解決的方法，不用過份着急。

第二在野黨——新民主黨黨魁博特賓表示：聯邦政府不能只用經濟方式去推廣聯邦政體，實在亦需要以文化形式去宣傳，而第一在野黨——進步保守黨的代表則要求聯邦政府加緊去搜集資料及做報告，以便證實聯邦政體的好處，俾能對付魁北克人黨在省內所作的政治宣傳。

現在的情況看來正是兩個高潮間的反高潮時刻，人人要等待的是大莊主何時願意踏出莊門接受挑戰，面對龍城警長作最後的決鬥，以決定那個農莊的主權。

蜜糖封口

住咗加拿大咁耐，都未見過政府好似依家咁表示民主開通。以前，政府話一聲：你地的中國人要畀人頭稅先好入嚟，個陣時我哋的唐人街幾乎個個都貧無立錐之地，重要我地納人頭稅添，我地都冇乜聲出，後嚟政府索性立下排華法案，一個唐人都唔畀入嚟。依家就唔同矣，政府話明唔准有種族歧視，重設有人權專署（Human Rights Commission）。綠皮書一出嚟，就馬上徵求民意，見到的唐人冇個會可以代表晒，於是重貼咗一大部份錢，畀各省唐人派代表到鹹水埠開大會。

政府咁好人，所以我一見到溫哥華嫂，就難免唔歌功頌德一番矣。

「嗱，你地睇吓，政府對我地的移民都算幾公道。以前幾鬼多遊客入嚟，乘機申請移民，死賴唔走，於是政府大發慈悲，實行大赦焉。依家政府又搞多元文化，大家都有得玩吓。新嘅移民法例會使得的老人家可以嚟加拿大同仔女團聚……。」

「喂，有冇搞錯」，華嫂大不以爲然。「加拿大本嚟全部都係移民，除咗的紅番之外，不過有的人早嚟，就叫自己做加拿大人啫嘛，早嚟嘅盎格魯・薩克遜人都唔到半數，佢地根本就冇理由可以話晒事。依家政府搞七七多元文化，七七徵求民意，都係見到勢色唔對，就用懷柔政策，畀粒糖衣連心你嘆。」

「你以爲綠皮書係幫我地移民乎？」溫哥又接上，「依家修正咗嘅移民法案，要視乎你有冇銀紙嚟投資焉，於是乎一班有錢佬隆隆聲嚟，又開餐館，又做房屋買賣，冇錢嚟投資嘅祇有眼光光，想納人頭稅入嚟都唔得。聽話新法例取消咗永久居留權(domicile)，如果犯咗小罪，又未入籍，唔理你住咗幾耐，都會畀人寃枉話偷嘢，或者發覺以前用過假護照，咁就大禍降頭，要捲席而走矣。重有，如果你畀政府認爲係响處搞搞震，或者識咗搞搞震嘅人，都唔使查問吓你，就……。」

「我知，我知。」聽到溫哥一路唔斷咁講落去，辛苦到我頂唔順，「其實，好多嘢我都知，我唔講出嚟有我的苦衷，政府畀錢我嚟開會，點好意思講衰佢？我把口都畀佢的蜜糖封住咗，重有聲出咩！」

自嘲自受集

關自守

歐亞旅行社
EUPO-AIR TRAVEL SERVICE LTD.,INC.

返港探親　　順遊歐洲

專營來往香港倫敦包機業務，隨機人員經驗豐富，服務最佳。
經辦歐洲亞洲各地觀光業務，華籍導遊，專業服務。
并代理世界各地廉價機票。

辦事處

加拿大	美國	荷蘭	英國	香港
多倫多	紐約	三藩市	阿姆斯特丹	倫敦	格拉斯哥	伯明翰	中區、九龍	元朗、上水、大埔

多倫多
ROOM 206
210 SPADINA AV.
TORONTO.
TEL:416·361·0900

滿地可
1107 CLARK ST.
MONTREAL
QUEBEC.
TEL:514·861·3497/8

多倫多華埠 治安問題

仁

一點意見

「喂，細佬，呢的水嚟大家使用吓都好嗒」。

經過唐人街，如果遇着兩個年青力壯的陌生人一湧而上勒索時，你的反應會怎樣？

如果你把這件事當作玩笑，事後你很可能會痛苦後悔莫及，深感當初作輕鬆狀是愚不可及了。這不是危言聳聽，類此的事件確實發生過。當時事主偕女朋友剛離開登打士街某飯館，被兩個華裔青年刦持，損失了八十多元。

無論是從香港或紐約來多倫多的華人，都會稱讚多市治安的良好。然而，近兩年來，多市面臨多方面的衝擊而發生蛻變，例如失業率增加，經濟衰退等等。這個素來予人一個友好印象的城市，漸漸露出了敵意，例如最近種族事件頻頻發生，大學在取錄新生設立新標準以排擠移民學生等。華埠治安走下坡，亦是其中的一環。

犯罪事件的滋生，不僅影響了我們的人身及財產的安全，而且會嚴重地影響華埠今後經濟的發展，以及造成外人對華人產生不良的印象，其後果釀成華人在經濟及社會上的地位普遍下降。因此，我們要儘速正視治安的問題，同時要及時提出些切實可行和有效的辦法。

治安走下坡不僅是個嚴重問題，而且是個棘手問題。顯然的原因是：法律是站在明處，而犯罪則是暗中進行；法律往往是在預定的時間地點進行的複雜冗長的過程，而犯罪則是難以預料且在短瞬間發生的事。另一方面，如果治安措施過份頻繁嚴密，亦會惹至草木皆兵，人心不寧。例如有人提出警察見有可疑人物應予搜身。顯然這樣做常常寃枉好人，又侵犯到人權，影响到個人的名譽及自尊。要對症下藥，而且又沒有副作用，並不容易。

對治安問題應採取什麽措施，應視乎發生問題之起因及其嚴重性。因此我們須對犯罪情形有初步的了解。根據多市警察局長亞當遜在獅子會聚餐時透露，多市的罪案在廿年中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去年的搶劫案有九千七百宗（即平均在一小時內至少發生一宗），店舖及住宅被竊的損失達三千五百萬元，比前年增加百分之廿四。至於發生在華埠的罪案，則未見有數字公佈，似乎有不少華人在事發後怕麻煩，或者害怕歹徒報復而沒有向警方舉報。安省中華總會館就治安事在一月卅日開了個公開座談會，不少在座的僑胞生動地講述目睹或耳聞的犯罪事件，其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大羣俱樂部被三名華裔青年械劫，去年「四海羣星會」在本市演出時被迫繳交保護費，以及在登打士街某些屋宇內遭撬門爆竊等。從以上獲悉的消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粗淺的印象：無論是多倫多整個城市或華埠本身，犯罪事件近年來在激增中。

造成犯罪率激增的原因，可以有以下各種假設：一、犯罪是大城市的不治之症，多倫多的人口，車輛，樓宇都在增加，於是漸漸染上大城市的症狀。（目前多市每年增加五萬人，而車輛數目幾乎達一百萬輛）。而華埠在近兩年來亦在迅速地發展。二、「非法移民」不能找工作，無以維生，挺而走險。三、在美國一些黑社會團體或不良少年竄到多市來「做世界」。至於本地是否有部份青年走入歧途而成爲不法之徒，則不得而知。

目前對治安的消極辦法是，喚起民衆的注意及鼓勵事主報案。另一面有賴於警方偵查組的努力。目前情形比較適當的防範的方式應是晚上在華埠增加巡邏車，這樣對匪徒有嚇阻的作用，而且在案發時找警察保護或當場制住匪徒的機會亦較大。警車過多當然會影響到人們的心理，亦增加警察的工作負担。然而，如果有一班不良少年由美國轉移到加拿大華埠這個假設成立，那末，酌量增加巡邏車是必要的防備措施。

至於民衆亦可以有積極的行動協助警方，例如組織治安專門小組，協助事主報案，或向事主解釋法律程序，研究華埠的治安情形及改善的方法等。

至於「非法移民」挺而走險的情形，要歸咎到政府移民政策措置之不當。政府禁止任何人雇用「非法移民」，如果查出是「非法移民」則予遞解出境，忽視了這樣做會令這股人口暗流釀出問題。（根據非正式估計，多市平均十個人之中有一個是「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在無依無靠，閃匿躲藏度日的情形下，自然會被迫上梁山。即使在人道上，政府對這班「非法移民」亦應採取較寬容的政策。

目前警方對反抗匪徒行爲的態度很曖昧，似乎是勸人無原

則地不抵抗，這樣會助長了匪徒的氣焰。在報章上我們讀到一些奮不顧身救人的事，可見得捨己爲人的行爲已有鼓勵的先例，因此，政府對英勇擒賊的事應予嘉獎及宣揚。

黑手何來？

多市華埠的治安日壞，爲非作歹之徒究竟是本地人口或是外來的？是一個相當值得研究的問題。在過去一兩年間，本地的華商及外來演出大戲的戲班間中也有傳出遭人勒索的事情，但歹徒多是不敢明目張膽地去幹，但踏入今年後，黑勢力份子的膽子的確大了不少，他們是否獲得外來黑幫的支持，或根本就是外來的黑勢力呢？這是相當難找出準確的答案的，而只能按可見的事實作一推論。

去年秋季，紐約華埠區內的第五警察分局換了新局長，新人登場後，隨即向當地暗中支持華青幫會的華埠社團（多爲俱樂部之流）聲明，該局將會用鐵腕政策，維持華埠區的治安，而另一方面，警方頻頻向華青黨員施壓力。企圖以直接及間接（强逼某些社團不再替他們撐腰）的方法，逼使這羣「失落」青年踏入正途。

紐約警方除取締賭及搜查華青幫會俱樂部外，並設法拘捕各幫會的首腦，以便繩諸於法。到去年年底，紐約華埠一度傳出該區的華青幫會業已解散，但據內行人口稱：這些幫會只是劃分地盤，以和平共存不再武鬥的方式避避風頭，而曾經犯事及有先例的，則離埠外逃，以便警方減輕對其留在華埠區內的同胞所加的壓力。

在事隔不到兩月後，多市華埠的治安開始急速變壞，這兩事是否有關連，相信要待一兩個爲非作歹之徒在本市失手被捕後，才可以找出確實的證據。

據多倫多市警察局長亞當遜月前在多市國泰獅子會的晚餐席上向華商表示：警方的情報小組正在搜集有關歹徒的資料，他不能肯定這幫不法之徒是來自外地 ， 但也不能否定這可能性。

亞當遜表示：這類要解決事情的有效方法是警民能充分合作。他希望華商在遇事後，能抗拒恐懼勇於報案。好使警方能有足夠線索去追捕歹徒。

在另一方面，這名服務警界已有卅多年的老差骨表示：多倫多市現在是一個大都市，人口有二百五十多萬，而罪案是世界各大都市的一個暗疾，居住在大都市的人士是需要面對這個現實，在過去的廿年間，多市的人口僅加了一倍，但罪案數字則加了四倍，而在罪案中，則以搶劫，毆打，毒品，勒索及青年犯罪問題最爲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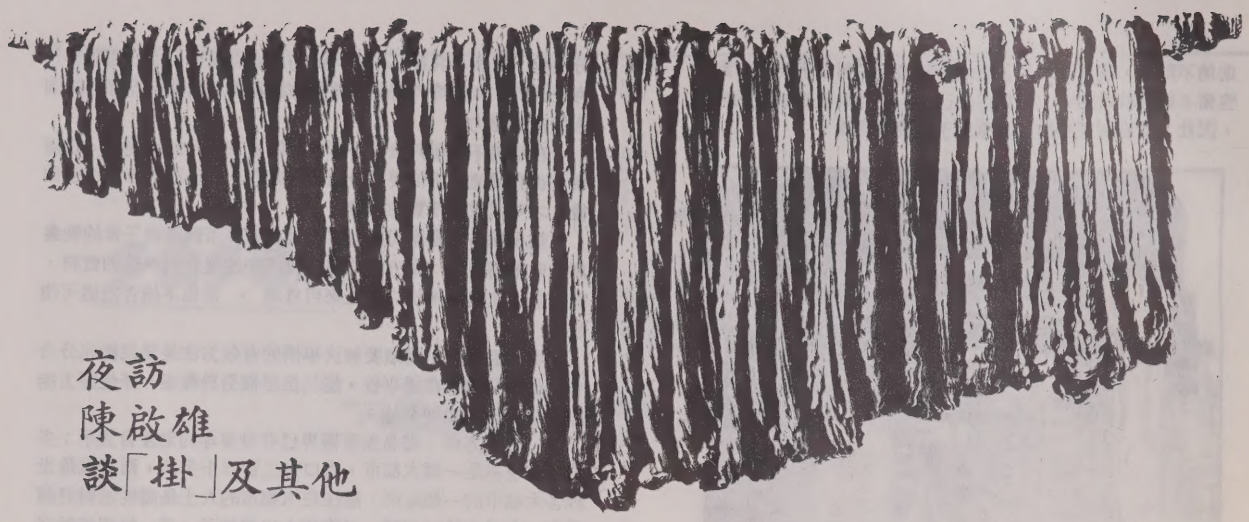
回頭多市華埠，在過去一兩年間，這區的發展的確頗爲驚人，特別是登打西街與史柏丹拿街交界的所謂新華埠，在這麼發達的地區中，貧富間的懸殊更顯得觸目，某一部份不甘食貧的年青人爲滿足自己對物質的追求，挺而走險是有可能的，他們不一定是需要獲得外間黑勢力的支持，他們只要在首一兩宗勒索或搶劫事件中，順利成功後，便會放大膽子幹下去的，他們的最有力「武器」，看來乃是華商及僑胞的膽怯及怕事性格罷了。

華僑旅行社
AA TRAVEL INDUSTRY
384 College St. Toronto, Ont. M5T 1S7
（樂都戲院右隣）
電話：九六七・四七七九

（1）巴哈7天遊	$259
（2）佛羅理達7天遊	$249
（3）賭城5天遊	$279
（4）墨西哥7天遊	$349
（5）歐洲野營團	$316 起(機票另計)
（6）巴黎9天遊	$491
（7）大溪地渡假團	$357（機票另計）
（8）歐洲15天超級豪華遊行團	$1075

本社代理各國簽證

每日有機，來往多倫多、香港、
東南亞及世界各地



夜訪
陳啟雄
談「掛」及其他

日期：二月七日
訪問：關卓中，李懷敏，張淑芳，黃仁達
地點：陳啟雄的寓所
整理：依摩僧

黃：可否先請你告訴讀者你是什麼時候來到加拿大？

陳：一九六六年，我是申請移民來的，同時因爲安省藝術學院（Ontario College of Art）接納了我的入學申請。

黃：當時你選讀那一科？

陳：是室內設計；在香港時對於藝術這一門學問認識不深，自己估計可以嘗試讀，由於不敢嘗試藝術，於是便選擇了應用藝術方面的室內設計。

黃：你認爲自己可以讀藝術，是根據什麼理由呢？

陳：因爲我試過很多東西也不成，所以試試「攪」藝術這樣東西（衆笑）；唔，其實以前在學校時已嘗試過繪畫，但只是很膚淺的……

關：你提過你在香港時曾經教過書？

陳：是的，在「西南」及「聖瑪利」，我本身是在崇基讀生物學的。

黃：這樣你覺得這種轉變大嗎？

陳：基本上是很大的，不過眞實的說，崇基那四年不能說是浪費了——對讀書來說那是浪費——但以過程來說，則是必需經過的。當時無所謂，中學畢業後，再選讀什麼科目也沒有關係。反而對我生活上影響最大的是教了三年書——讀了四年書可教三年書……（笑）

李：你在香港時有沒有正式接觸過藝術呢？除了你提過的繪畫之外？

陳：我在教書時，晚間參加了一些繪畫課程，曾學習水彩等，當時事實上很需要一些課外活動來調劑一下自己，因爲日間教書，忙到不得了，所以設法找一些自己喜歡的活動來調劑一下。

李：當時你有發表過作品嗎？

陳：沒有，因爲當時在這方面的訓練很少，只是中學的幾年間，在大學時則完全沒有機會再進修，我連生物圖也繪得不好……（衆笑）

黃：你是那一年畢業於安藝院呢？找工作有困難嗎？

陳：1970年畢業；是的，很難，我畢業後一年內也找不到事做；不過這件事要分兩方面來說：一來由於那年加拿大的經濟署爲停滯；另一方面我覺得自己仍未學到找工作的方法。因爲以前我一直覺得在學校讀書成績不錯，所以相信自己畢業後找工作應該沒有問題，但這種想法是錯的，因你出去見工時，他們不是要看你的作品，那些只是你在學校時的習作，與他們實際的需要沒有關係，他們只注重你是否可以受訓練，看你的態度，儀表，才能，怎樣「接待」人等等；尤其是室內設計，因爲大部份生意是要靠張嘴。

李：你提過一點，在學校時的訓練與實際的工作沒有多大關係，換句話說，是否要從頭再開始呢？公司從新訓練你，然後才可以正式做室內設計？

陳：不是這樣說，我的意思是：一個對室內設計有經驗的人，他對你在學校時所做的作品會沒有興趣，但你在學校時的訓練仍有用處的，我現在的工作，基本上仍是應用以前在學校所學到的；出到社會後，主要是吸取經驗，而不是理論等等，那些先決條件是你在學校時要學習。但當你見工時，因你以前的學習作品，是不切實際，當你在外面接到一單生意時，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在學校時，你做一件作品，可能要四五個月去完成，但實際找生活時是行不通的；另外還有一些客觀條件，例如，你的客人的實際需要與你在學校時的假設需要不同。室內設計可能較特殊，它是屬於實用藝術的一環；我以前以爲室內設計只是不斷繪圖，繪圖便行了，但事實上那只是佔全部工作的四分之一，其他的四分三是見客人，經

濟預算與及選材料等等。

黃：好了，你現在已工作了近六年，你覺得在創作方面的自由程度是否仍有限制呢？

陳：是的，受限制的仍很多，我現時工作的公司規模很小，現代的設計公司分得很專，有些是專門設計辦公室的；一些是專做家庭佈置的；有些則專做學校，餐館或公衆場所等；我們是專做售買衣服的商店。

李：一個有東方文化背景的室內設計工作者在北美洲這個西方社會裏生活，假如，我是說假如，你的顧客或老板不限制你的創作自由時，你認爲自己的設計是不是帶有「東方色彩」呢？

陳：所謂「東方色彩」很難解釋，以我的解釋是含有東方哲學思想的東西，而不是荷理活式的「東方」；但問題是一般西方人當他們看到龍呀，亭呀便說它是「東方」的；此外，室內設計也如時裝一樣，是順着潮流的，現在的室內設計也是每兩三年便轉換佈置一次，所以沒有可能永遠運用東方裝飾意味來做主題；這幾年來「東方」的意識很流行，但過幾年又會怎樣呢？以我認爲，應注重「全面性」的設計，而不應局限於地方性的佈置，最主要還是要適合用場。

黃：你是一個東方人，來到加拿大，從事室內設計工作，要設計一些適合北美洲所需要的東西，你覺得有困難或困擾的地方嗎？

陳：困難的地方不是我是一東方人，而係我是一個外來者，對這裏的生活習慣不熟識；另一方面我是在香港長大的，但十多年前，我們對於中國的認識很少，反而我來到北美洲後，在博物館，雜誌及個人收藏方面見到關於中國的東西比在香港時還多！

黃；你已工作了六年，你曾否遇到一些工作（Job）是要帶有「東方」味道的呢？

陳：沒有。

黃：是因爲顧客的不需要？

陳：是的。

關：你可否解釋一下你所謂的「東方色彩」？

陳：我的「東方色彩」的意思是指設計時所運用的顏色，空間感覺的佈置，比例與及材料選擇等。我還是認爲比例最重要。

黃：我知道除了室內設計是你的日常工作外，你還從事其他的藝術創作，你可否告訴讀者你所運用的那類藝術媒介應該怎樣稱呼？

陳：這類藝術品的稱呼就算在英文方面仍很難介定，本來是由 Hanging 這個字用過來的，或稱之爲 Taperstuy，中文方面我稱它爲「掛」，因爲與Hanging 同一意義，而且在中文，「掛」包括有織錦的意思。

黃：你本身已從事室內設計的創作，爲什麼還要再做這類藝術創作呢？

陳：這等於你做廣告與繪畫。前者是實用藝術；而後者是純藝術，代表個人的思想與感受……

黃：你覺得自己從事純藝術方面的創作與這個社會有沒有直接關係呢？

陳：可能完全沒有。

黃：例如你說純藝術純粹是個人思想方面的，那麼這種思想或感受是從那裏得來的呢？

陳：主要是從個人內心世界向外間發出的；而實用藝術則是吸收外間人們的意見，你所做的可以吸引所有的人。

黃：所以你現在所做的純藝術工作不是反映這個世界……

陳：可能是。亦有可能是反映我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意見。

黃：那麼你爲什麼會選擇這種媒介呢？

陳：啊！這純粹是偶然而已！因爲恰巧有一年暑假我很空閒，於是買了一些繩索回來試做，後來我從安藝院畢業那一年，找不到職業，所以有較多的時間做這類工作，最後參加了一個展覽，當畫廊的主持人看到我的作品後，便爲我安排了另一個展覽，那是一九七一年的事情了。

黃：你說過你只是偶然的……

陳：當然我也曾經作過其他嘗試，但可能這類……可能它較近我的……不，可能是我的性格較接近它吧！

李：你怎樣通過「掛」來反映你對這個社會，世界或人生的看法？

陳：我根本沒有這種興趣，但可能反影了我的一部份看法。

關：你可以介紹一下你從事「掛」這項藝術創作的過程嗎？

陳：唔，在第一次展覽之後，觀衆的反應很好，之後我另外有兩次展覽，觀衆覺得很怪，可能是新奇吧！因爲直到現時爲止，一般人的觀念仍認爲「掛」主要是以紡織爲主；但我自開始便不是以這種手法爲主，因爲我根本不懂得紡織的技術，所以我做的方法與其他的人不同，我是先想到一個意念，然後才想應該用什麼方法去解決技術上的問題。

黃：你說過觀衆看到你的作品時覺得很新奇，那麼你以爲你應否有責任或目的去令到他們了解及接受嗎？

陳：我個人覺得沒有這種責任。

黃：那麼你開展覽的目的在那裏？

陳：我希望有人會明白我做些什麼。

黃：你意思是令觀衆了解你的作品的責任不在你，但假如過了很長時間他們對這方面的認識仍很低的話，你覺得你的作品與觀衆之間的價值在那裏？

陳：我根本沒有要求過觀衆什麼，所以我並不需要將價值這觀念放進去，當然這種作品對我的價值很大，因爲它幾乎可以反映了我整個人在某段時間內的轉變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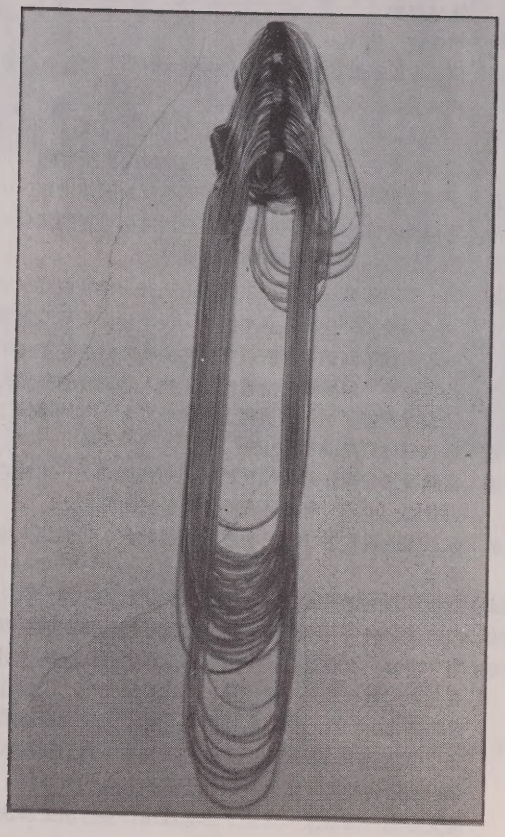
李：讀者會有興趣要知道關於「掛」所用的材料……

陳：基本上任何材料也可以應用上去，例如繩索，線，木材等等。「掛」很接近我們中國以前的織錦，錦像，地氈等，只是以前多數是用絲，或羊毛來編織，但時至今日，「掛」在材料方面已沒有限制，總之可以掛起來的便行。而「掛」主要是受南美洲的民間編織品影響，秘魯的編織技巧很高，他們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黃：那你自己又多數用那些材料呢？

陳：我多數用棉線，最早期也是多數用棉線及繩，因我本身對羊毛起敏感。

黃：我曾經看過你一件作品是用透明水喉膠管做的……



陳：啊，是的，我時常也試用新材料，但目前來說，棉線對我最適合，不過現在供應方面愈來愈困難，通常要到大紡織廠去購買，他們只做批發的，要用「噸」做售賣單位，所以很難。

黃：那你有想過轉用其他材料嗎？

陳：沒有，其實我也喜歡就地取材，我的第一次展覽的作品便多是就地取材。

黃：你對棉線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陳：編織的東西，顧名思義，是以經過手去編織，用感覺及觸覺的地方很多，棉線對我有一種特別的感覺，等於我們穿一件用棉線織的衫，有一種令人舒服的感覺，毛的不十分舒服，人造絲更差。

黃：我想再問問你關於那件用膠管做的作品，你可否告訴我們當時你如何想到會用膠管這種材料來創作呢？

陳：很簡單，因爲當時我有位朋友送了一些膠管給我。

黃：那麼你覺得一件用膠管做的「掛」與及一件用棉線做的「掛」在感覺上有什麼不同？

陳：感覺可能會一樣，但只是做時的過程不同，要求不同，因爲你用膠管創造時，你已有了膠管這個概念在你的腦海中，所以在做時盡量發揮膠管的特性。

黃：你說過秘魯的編織業很發達，但相信那只屬於手工藝製品吧？那你怎樣去分辨何謂手工藝品，何謂藝術品呢？

陳：我自己的作品不屬於手工藝品，因爲手工藝品可利用技巧而重覆製做無數件出來，但我現在的作品就算你要我再重做一件一模一樣的話，是不可能的。「掛」是到了近十多廿年才開始有「作者」，以前多數是由很多人一齊來完成一件作品，例如波斯地氈便是。現在，畢加索也可能會設計一件作品，而由工廠及工人去完成，但由於有了畢加索的設計及意念，故有了一個特別的價值在裏面。

李：作爲一個藝術工作者，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作品風格的轉變過程嗎？

陳：唔……有的，但由於我的旅程仍很短，所以這種轉變可能是形式方面超過內容方面。

李：你認爲自己的創作已經進入成熟的階段沒有？

陳：所謂成熟是指定型，但以我的看法，我沒有可能不繼續變……

李：但這並不表示你仍然是在摸索的階段。

陳：對，我相信現在我每一件作品也可以表達自己的要求及意見，在這方面我認爲是成熟的階段。但每個階段對事物的認識也不同。

關：加拿大方面如何呢？大衆是否可以接受「掛」呢？

陳：加拿大是一個很保守的國家，對藝術來說亦是；每次也要在其他地方可以接受新事物後，他們才能接受。

黃：世界上那個國家的「掛」最先進呢？

陳：歐洲的國家，例如波蘭，他們有幾個很出名的作者，美國也有，但基本上仍是歐洲最發達，加拿大仍很落後，主要是指「觀念」方面，因爲很多人仍受傳統的編織觀念的影響。

黃：歐洲與北美洲在「掛」方面所利用的材料有什麼不同？

陳：沒有多大分別，主要仍是用羊毛等，因可以耐久保存。

李：在加拿大除了你之外，還有其他華裔的藝術工作者致力於「掛」的創作嗎？

陳：我不大清楚，問題是屬於手工藝製品的不算在內。

黃：一件「掛」的顧客多數是什麼人呢？

陳：多數是大公司。現在連安大畧畫廊（Art Gallery of Ontario）仍未承認「掛」是一件藝術作品，所以你可以看到多倫多的保守程度。

張：你有沒有感覺到你已花費了大部份時間及精力在你的日常工作上，這樣對於你個人的創作會有困難嗎？或者你會放棄嗎？

陳：是的，我已感覺到愈來愈難，因我日間在公司裏所負担的事務愈來愈多，所以我的作品愈做愈慢。但好處之一就是因爲我的作品不很賣得，所以不用怎樣趕，以前我大約一年半開一次展覽，現在已退到兩年一次，可能亦由於我的作品越來越大件吧！最理想當然是我可以放棄我日間的工作，但到時我是否仍然可以專心我的創作呢？以我目前的想法則認爲沒有可能，因爲我不需要靠它來維持生活，故可以說是一件很「自在」的工作，我做什麼與及做多少沒有人會干涉我……

張：但假如當有一天你已有錢……

陳：這又不同了。（笑）

黃：一間畫廊的主要目的只是爲了能售賣藝術作品，可算是一種商業的行業，這樣，你以爲一個藝術工作者與畫廊之間的關係會是怎樣的呢？他會接受畫廊的意見及影響嗎？

陳：會，你可能會受他們的影響很大，但主要還是因人而定，以我來看，一個藝術工作者可以不用理會他們，而只依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當然，整個過程仍是像做生意一樣，好處只在於可以將你的品交由畫廊替你處理。

黃：你覺得你做的東西受畫廊的限制大嗎？

陳：目前來說仍沒有， 假如有的話， 我會自動離開那間畫廊。

李：作爲一個加籍華人藝術工作者，你是否感覺到在發展方面存着很大的局限，競爭和困難呢？

陳：沒有。

李：那即是說你認爲藝術是可以超越國界及種族嗎？

陳：我以前沒有注意過這個問題；而事實上我在加拿大這樣多年，也未曾遇過這些情況，而且不單在藝術方面。

張：你創作時，是否先注意顏色呢？

陳：我主要是先注重造型，然後是顏色。

張：你是先有計劃才去做的嗎？

陳：不需要，我是一邊做，一邊改的。

李：通常你賣入棉線後，是否就利用它的原色來編做呢？

陳：我多數是就地取材，但假如你細看那件（指着其中一件）「掛」，你會發覺至少有二三十種顏色編織在裏面。主要是看我當時需要那幾種顏色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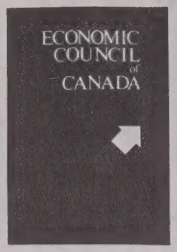
黃：你有受別人的影響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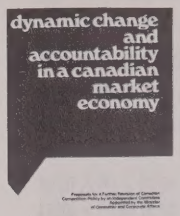
陳：可能有，不過現在做「掛」的人仍不很多，可能有受影響，因爲我一向也很喜歡雕塑，繪畫，所以一定會有。

KAI CHAN

陳啓雄：一九四〇年生於中國；六三年畢業於香港崇基書院生物系，六六年移民來加；七〇年畢業於安大畧藝術學院；歷年「掛」展覽包括：七二年的「二人展」、「羣展」；七三年的「羣展」、「個人展」；七五年的兩個「個人展」；七六年的「安老院一百年的演變」展；舞台及服裝設計包括：七二年的「You Me Raincoat」、「Tantrums」；七三年的「God in the Manger」等。

加拿大經濟巡禮





本刊記者

（一）貿易：

加拿大去年國際貿易出超達十一億三千萬元。自六〇年以來，一九七五年第一次貿易出現入超，數額爲六億三千九百萬元。本年輸出品大宗者爲原油，值二十九億九千萬元；小麥，值十九億一千萬元；天然氣，值十六億二千萬元；紙料木材，值六十四億一千萬元；運輸機器值八十八億七千萬元。加拿大輸入的原油和運輸機器均比輸出者爲多，輸入額分別爲三十二億七千萬元和一百〇二億二千萬元。

（二）加拿大在美國的投資：

去年加拿大在美國的投資額，爲外國在美投資之最大者。在二百五十個外國投資事件中，加拿大佔六十一件。

（三）加拿大中央銀行減息：

去年十一月以來，中央銀行對Chartered banks貸款的利息共減了三次，現已跌至八厘。此外，從二月開始，對 Chartered banks 適用的最低貯備金比率，亦從百分之五點五減至百分之五。據中央銀行總裁 Gerald Bouey 稱，減息目標在保證金錢流通量可按計劃中的百分之八至十二增加率，按年遞增。此舉將導致較大之商業借貸，有助於經濟成長和復甦。

（四）公債和公司借貸：

一九七六年，聯邦政府、省政府及市政府的公債及公司借貸共達一百七十二億六千萬元，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五十三億多元，其中九十億四千萬元是在本國借入的。聯邦政府公債爲三十五億九千萬元，省政府公債爲七十一億元。轉入七七年後，聯邦政府再發行八億四千三百萬元的公債。

（五）建築業前景暗淡：

加拿大建築業商會會長塔哲倫 （Henry de Puyjalon）表示，一九七七年之內建築業將不見成長。且由於建築業爲加拿大僱員最多的行業，失業率可能因此增至百分之八。他預料今年商業性建築可能減達百分之五；機構性建築無甚增減；工業性建築或有微增；居住樓宇開建數字將比以前預料者爲低——約 22,000 至 225,000 之間。大西洋省份將減產；魁北克省將不見成長；安省或有輕微增產；曼爾吐巴省將減產；沙省或增產百分之四；亞畢打省或增百分之七；卑詩省難望增產。不少承建商正考慮國外工作。

（六）溫哥華空置樓宇大增：

多年以來，第一次溫哥華的寓所式樓宇空置率大幅度增加，若干地區已升至百分之二以上。原因可能是：由於林礦業不景和移民政策緊縮，溫哥華人口在最近五年內減少約二萬人。租金暫時未見下降。卑詩省是實行租務管制的，大部份樓宇增租率不能超過百分之十點六。若干不受管制樓宇最近一年內升租百分之二十以上。

（七）婦女和貧困：

婦女地位諮詢會 （Advisory Council on The Statvs of Women）調查所得，經濟上自立的母親貧困機會比任何其他類別人仕爲高，倘若她不往外工作的話，她會失去作爲供養家人生活的納稅人的利益；倘若他往外工作的話，她卻要從她微薄的入息中付出稅金。在一九七三年中，經濟上自立母親爲一家之主的佔所有家庭百分之八點六，但是此等家庭爲全加窮困人仕之百分之廿八點七。一九七四年的統計數字表示，男人當家的家庭收入平均爲$13,841，女人當家的家庭收入僅爲 $5,91$_0$。加拿大統計處認爲，一個五人的家庭而收入低於 $9,388 元一年，在滿地可、多倫多、溫尼泊、或溫哥華居住的，以一九七五年的物價，生活卽屬於非常貧窘之列。據調查所得，加拿大約有三百五十萬窮人，其中三分之二爲婦女。當家者教育程度通常甚低。他們之中很多是要繳稅的。

（八）薪金物價管制將可逐步取消：

財政部長麥當奴表示，薪金物價管制將可逐步取消。代之可能會設一物價監察處，此監察處會對過高之物價或薪金升幅提出建議，但將沒有强制物價薪金的權力。

（九）新聯邦財政預算卽將公佈：

財政部長麥當奴表示，新的財政預算將於本年二月尾至六月初間提呈下議院。預算案的首要任務是鼓勵投資、減低外匯出超赤字、減低物價上漲壓力和失業數字。

民生與經濟

何濂生

長篇連載之三

第三章　社會主義社會的剝削

很多人以爲，當資本主義社會轉化成爲社會主義社會，剝削的現象便會消滅。資本家藉以剝削勞動者的生產機器，一旦給工人階級掌握了，他們就無所施其剝削的技倆。而工人階級又怎會自己剝削自己呢？

事實證明，在所有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裏，剝削的情形繼續存在。其形式和程度或有分別，但剝削的本質仍未改變，甚至可以說，在某方面剝削的情形比「資本主義」期還變本加厲。

這關鍵在那裏呢？在「人性」的不可救藥，還是「思想改造」的困難、還是社會制度的不健全？在試圖解答這些問題之前，讓我們先談談：社會主義社會裏，剝削的情形是怎樣和怎樣發生的。

一些社會主義社會的剝削現象

上一章我們指出，剝削就是任何憑藉自己擁有的特權而進行的損人利己的行爲。所謂「特權」，就是那些既不是由自己的工作換來，又不是羣衆給予，而別人又不能享用的權益。

在我們所知道的「社會主義」國家裏，眞正的全民平等仍未達到。特權的存在，顯示着剝削的持續。共產主義者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歸咎到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上去。可是，誠如大衞·雷吾①所指出，「所有制」有法律方面和社會方面的雙重意義。儘管在法律上，私人的「所有制」已告不存在，在社會功能方面，生產資料和國家機器仍爲若干人仕所控制，而未能達到全民控制。雖然，要求生產資料和國家機器的眞正全民控制，是較長遠的理想，不可能一蹴卽至，少數人對這些控制權力的把持，就替社會主義社會下的剝削做成了條件。

社會主義社會裏，最突出的剝削情形可以分爲四點：

【一】當權派對異己的壓迫。（政治權力的剝削）

【二】購買力跟個人生產值的不相稱②。（經濟權益的剝削）

【三】個人發展機會的不平等。（政治及經濟權益的剝削）

【四】文化生活的剝削。

政治及經濟權益的剝削

【一】有人說過，筆尖比劍還利。歷來，人民之中對當政者不滿的，往往利用文學或輿論的形式對當政者諷刺或直接抨擊。歷來，筆尖的力量，成爲社會進步的摧化劑，使迂腐的當政者十分頭痛。清朝聞名的文字獄就是當政者對筆尖懼怕的反映。可是，科技的進步使掌軍政大權的統治階層，開始可以連筆尖也操縱和壟斷起來。這就是一個原因，爲什麼當權派對異己的壓迫，居然也出現在進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最近，在批「四人幫」的資料中，我們看到了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一些特權階級如何可以打着「無產階級專政」的旗，把自己的政治敵人打成反革命份子，又把他們的言論發表權利剝奪。在很多事例中，我們也看到一些當權者如何利用起用或貶職的權力，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二】關於購買力跟個人生產值的不相稱，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是特權主義，一是平均主義，兩者都會產生剝削。特權主義是自私的表現：不理會別人的利益，但求提升個人的收入；或是用其他的手法，提高自己的購買力。這包括在中國常有發生的「走後門」情形，和蘇聯的特殊人物購物站——「小白樺」商店等③。平均主義是要求表現不同的工作者獲得相同的報酬。由於每人的工作積極性和工作的興趣不同，平均主義做成另一種形式的剝削：苟且的工人佔取多於自己生產值的購買力；輕快的工作崗位的工人比勞累的工作崗位的工人付出較少的勞動，却也得到了同樣的收入。或者有人說：用教育的方式總比用「物質刺激」來發動工作的積極性好。這點我也同意。不過，在社會實際上仍存在着好逸惡勞的情形，平均主義只會做成此類份子對勤奮工作的人的剝削。（因廢疾或別的原因需要社會照顧，不算剝削。這是社會對他們的關懷和責任。）

【三】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個人發展的機會往往仍未平等。直至目前，在中國，出身對個人的發展仍影響很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聲明：「國家依照一定時期內剝奪地主、富農、反動資本家和其他壞分子的政治權利，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爲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所謂「地、富、反」實際上是往昔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及其子女。他們如今基本上已沒有土地、財富、或工廠。在中國，還有所謂「紅五類」④的，他們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發展機會。不少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國民經濟活動的統一計劃，由機構安排的職業分配取代了個人申請和公平選拔。這便對「走後門」大開方便之門。這不單做成不公平的情形，而且，由於未能發揮個人的主動性和未能給每職位選用最恰當的人選，損害了國民生產力。

【四】文化生活的剝削有時也相當嚴重。當權者對文化生活有所偏好，使藉着控制了的文化部門，强加自己喜歡（或自認正確）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內容於民衆身上，這就做成了文化生活的剝削。儘管當權者的出發點是爲人民，他們的觀點必然免不了有一定的局限性。要脫離這局限性，就非依靠羣衆公開討論研究不可。對某一本文學作品的評價，並非可以由若干「革命評論家」妄下斷語便能作實。毛澤東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曾提出六個標準以決定某作品是「香花」還是「毒草

」。該六項標準就是：「（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可是，到底什麼樣子的文藝作品才能滿足這些條件並非很容易就看得出來。最近在中國恢復上演的「園丁之歌」，不是也曾被打成「修正主義」的嗎？而且，同一部作品，可能有它進步的一面，也同時有它退步的一面。若果要決定了是香花還是毒草才能讓人民進行他們的文化生活的話，恐怕人民的文化生活將會變成極沉悶的了。爲什麼？正是因爲經專家鑑別了的作品的評價已經有官方認許，人民只須認同，不用懷疑思索了。

教育？制度？

自從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央發動過很多次大型的羣衆運動，目的都是突出「政治」，和借助羣衆的力量，去打擊一些「反革命」份子。這就提出兩個不同的問題：（一）是中國對「思想教育」的極端重視，象徵着中國對思想教育的信心。到底思想教育收效若干？貪婪、自私的「人性」是否可以改造？（二）是羣衆的辨別是非的能力和衝勁，是否可以依靠？還是羣衆只是被不同的當權派煽動，而缺乏明辨求眞的力量？

馬克斯指出，資本主義的剝削做成了工人階級的「疏離感」(Alienation)，這就是由於對個人工作成果失去控制能力所生產的一種無能爲力的心理狀態。社會主義下，剝削同樣會做成「疏離感」，這就是當事人在環境迫使下，要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時，產生的無可奈何的心理狀態。當「四人幫」大權在握的時候，他們也曾成功地發動很多城市的羣衆對鄧小平進行批判和示威遊行。最近這些示威遊行都不見了，我們反而見到不少支持鄧小平的大字報。於是有人認爲：羣衆是盲目的，受擺佈的。我不同意這種講法。羣衆的積極性是巨大的，只要給他們適當的條件，羣衆的明辨性、進取性就可以發揮出來。

發揮羣衆的明辨性和進步力量，需要兩個條件。一就是在制度上保障羣衆自發的權利，消除一切「疏離感」的來源。這包括了落實中共憲法裏第二十八條所申張的「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第二個條件就是羣衆都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權利並行使這些權利，且對國家大事的有關資料，得以閱讀（關係國防公安的資料除外）。否定了羣衆對有關資料認識的權利，就是蒙蔽着羣衆去進行羣衆運動，這當然是沒有好處的。

中國對思想教育的重視是正確的。沒有適當的思想教育，一切制度和法律都不能確立而終歸破壞的。法律和制度須要落實，有賴羣衆對它們的認識、信賴、和支持。中國對思想教育的方針，除了鼓勵「自力更生」、「捨己爲人」等，更急切需要的，並不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套。中國的人民要眞的解放，大家須要認識羣衆運動的條件，更須要爭取健全的羣衆運動的實現。只有這樣，特權階級才會眞正被打倒，平等的社會才會實現。

> 向現實低頭，
> 就是迴避現實的挑戰；
> 却有人道開拓理想的天地
> 爲不實際。

沒有剝削的社會

最後，讓我列舉一些沒有剝削的社會的特點，作爲社會改革的方向：

一、廢除了一切財產或權力的繼承。

二、所有財產，應經過生產活動而得享用。廢疾老弱或未成年者除外，此等皆由國家統一支給生活津貼。

三、所有政治權力都是從人民支持下得來，因此國家領導人必須向羣衆負責，接受羣衆監督。

四、人民要學習彼此尊重，不應以多數欺壓少數；要學習自立和服務的精神；更要學習成爲敢於保護平等的公民，向一切特權制度宣戰。人民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

五、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宣傳宗教或無神論的自由；有競選和選舉的自由。

這些都是比較一般性的討論，但都是一個開放的、平等的社會所應具有的特點。至於社會的具體結構，自然會隨着環境的改變及人民的認識不斷適應轉化。再長遠一點，馬克思等人預料，待共產主義來臨，國家這人爲的制度，終會消滅（「The 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我們覺得，一旦平等開放的社會制度已確立於兩個不同的國家，此兩個國家即可實行開放的雙邊移民政策。甲國的公民，只要經過申請的手續，即可改變成爲乙國的公民。待更多的國家參加了開放的社會制度的行列，人爲的旅行和移民障礙，即可減至最低限度。那個時候，國界的紛爭，自然沒有意義。眞正的大同的社會，便會出現。那個時候，儘管「國家」這概念仍存在，它跟現在的「國家概念」已相差十萬八千里，成爲只因行政上的方便而存在，再不是保障特權階級的工具了。

註一：David Lane, The End of Inequality, Penguin Books, P. 130.

註二：國家按需要抽稅作爲建設、行政、或收入調整之用者不在剝削之列，因爲這是對全民適用的徵稅辦法，用以促進國民整體利益的。此外，所謂生產值，往往是須要發動羣衆評比的。

註三：蘇聯內幕，廣宇出版社，P.88。

註四：所謂紅五類，即貧下中農、工人、革命幹部、軍屬、烈屬。

（下期將討論：民主、專政，與民生發展的道路）

目前中國大陸的教育

方資求

由江紹倫教授主講的題爲「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道路」的座談會，是聯校中國週（由多倫多、渥太華、滑鐵盧、麥基爾、皇后、雅崗昆及伽爾頓七間大學中國同學會合辦）其中的一個成功節目。參加者頗衆，約有五十多人，發言及發問都很踴躍，主講者又解釋得翔實，生動。茲就本人與會時之見聞及記憶所及，將江教授闡述的見解簡短地介紹。

該座談會的題目雖泛，然話題集中在中國大陸的教育方面，間亦涉入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幫。這可能是由於江教授研究的主要興趣是教育（據主席黎國燦君的介紹，江教授在兩年前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現任教於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以及主席的原意。

首先，江教授指出，在中國大陸大力推行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上山下鄉等，讓青年遠徙到邊陲區域落實生根，是富有國防和改變鄉村的雙重意義。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一直受到英美等大國的覬覦，直到近年來邊境又曾受蘇聯及印度的滋擾，爲國家自衞起見，對人口及物資的分佈，是有重大調整的必要。配合這個需要，地方單位上的發展的特色爲「細胞式」，與美國的「點線式」（筆者按：「點」指人口集中的大城市，「線」即是聯系大城市的交通線網）成對比。這樣，可以避免帶核彈頭的越洲飛彈全面性摧毀。當然，這種「細胞式」——即以公社、大隊爲單位的組織，是須要有一個强有力的中央來調度的。

伊寧的哈薩克族流動小學

說到教育普及後的效果，江教授據其親身經歷的所獲有的資料，估計目前中國有百份之七十左右的人具有基本文化（這個估計比官方數字爲保守），跟一九四九年前百份之四來比較，可說是一大進步。普及教育後有兩個顯著的效果，特別值得提出，第一，許多人能夠舉出些具體的確切數據來說明事理，對度量（Measurement）觀念再不是過去「差不多先生」那樣馬虎、含糊。第二，增進了民族的自尊心及自信心。

江教授分析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認爲在五十年代，大專學院在教、學、研三方面都熱情高漲，具體明確目標，也相應地收到良好效果，培養出一大批國家需要而具備高度水平的畢業生。到了六十年代，由於一連串發生的天災人禍，農業欠收，蘇聯撤退專家，隨着是文化大革命，高等教育便處於混亂和停頓的狀態。自文革結束七十年代開始，高教進入摸索的階段，在未能確定明確方針及全面恢復招生上課的情況下，高等教育的發展，仍有待新的措施。根據他所描述教育和社會發展兩方面關連的模式，提高了教育的水平面（例如擴大大學學額，增加研究經費等），可以促使社會一般發展（General development）水平在經過一段時間後相繼提高。過去幾年來甄選學生的試行方式是通過個人的志願，羣衆的推薦，黨的核准及學校的取錄四者。這樣的方法在試行過程中也產生一些問題。主要是有些學生缺乏基礎知識，雖由教授們進行重點補習，仍未能搞好業務。此外，無論是學制，課程，學校管理，各類專門的招生人數等方面的計劃和施行，還要根據中國實際的建設條件去製訂的。江教授認爲中國須培養出一班專家，而這班專家又不應是不講求實際、空談理論的特權份子，江教授探訪中國所得的印象有所證明，中國本身有條件大力推行高等教育，搞出一套符合建國所需的教育模式，而並不需要與美國的教育模式相比。

江教授提出，爲改善今後的教育，需要有一套健全的計劃，一個切合實際客觀條件的方案，和健全的行政組織。近數年來，教育部幾經調整和人事上的變動，對於教育的正常發展，曾產生過一定的阻碍，四人幫一度捧出來的負責人，對於高等教育發展也曾作出重大的破壞，這些情況，可以由最近清華和北大學生所反映出來的資料看到。在徹底批判四人幫以後，教育將可以出現新的景象，也許，在新的發展高教的方案中，祖國可以替海外學人願意回國的提供妥善的安排。

最後，江教授表示，中國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教育既是社會建設的重要環節，往往與社會的一般變動發生相應的種種問題，是非常複雜的。我們對待問題的態度，應着重實際及分析，不應先入爲主，武斷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或者斷章取義，盲目地高叫空洞的口號，這樣才可以引致同學們對中國的認識。

快意機票

閣下 回港渡假，
只需要在卅五天前訂座， 快意旅行社
至少爲你節省三百元，
自多倫多，滿地可，渥太華，
溫泥壁起飛。 自由選擇回程日期。

FAR EAST EXPRESS TRAVEL LTD
307 SPADINA AVE., 2/FL. TORONTO, ONTARIO
M5T 2E6 TEL: (416) 366-1993

老問題

二了

你來了，提出那個千萬人反覆詢問自己的課題，實在使人無以爲應。

你常言追求完美。作爲鼓勵前進的力量，它也許有着一定的功能。祇是，你偏把自己戲弄，再次掉在虛無的泥淖裏。

從小浸浴在家庭的溫馨和過量的慈愛，莫非眞的使你羸弱起來？不是的，你沒有因此而順伏下去。你曾經屢次轉換新的環境，從修讀工商管理的範疇改絃換轍到純物理科學的領域去，由亞熱帶的南國小島移居到北回歸線以北的異地。這種種「反抗」，隱藏着自我解放的意味；離開困囿的、無牽掛的溫室，走向外間的風雨世界。

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能搏取改變帶來的果實，那段期間，你是快樂的。像許多其它找着了生命底實質的人一樣，你爲自己做着的事情感到滿足。「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一類問題對你來說已是不成問題了。行動比思考更爲重要，你捲起了衣袖。

失業後的經濟壓迫，雇主們的推拒，派發福利救濟金的人底白眼，無疑是使人氣沮的，但喪志却不可！是的，你要憎恨，但必需先學會如何憎恨。人們常說：人窮志短，我看不然。富者多無大志，中外歷史裏有着很多先例，不用我再多說。朋友，你在失意的時候才思考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倒不如捲起你的衣袖，到街頭去吧！答案也許就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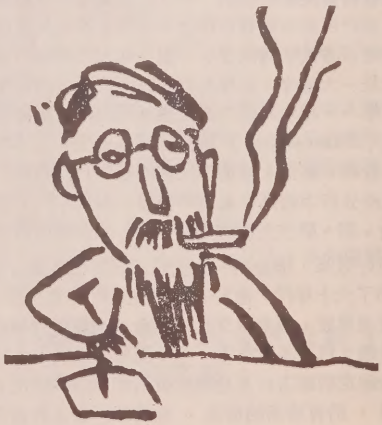
瞎子摸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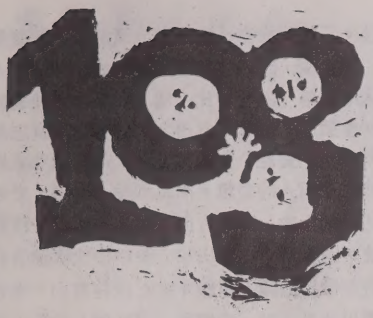
紅雲

記得兩年多前，在「明報月刊」裏讀到一篇關於藝術與政治的文章，文章的作者舉了畢卡索和沙特的例子，說這兩個人都是共產主義者，但共產主義理論裏不容許創造性的文藝，於是畢卡索最後不再提社會思想，沙特只好放棄他文藝上的努力，求社會思想上的安慰，這篇短文不打算論述畢卡索後來有沒有通過他的作品表達他的社會思想，亦不想談到沙特對文藝的各種看法，這裏談的，是究竟共產主義理論，是否根本排拒了文藝的創造性。

馬克思論述共產主義的著作中，沒有具體地描述共產主義社會的制度，因爲如他所說，他並非一個預言家，無法預知未來，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共產主義是一種消除了人爲的社會壓迫的制度，那時在經濟層面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在政治層面上，人們服從於分工的規律，自覺地按客觀需要設立行政系統，人類將共同爲創造更高度的文明而努力，自然災害將是唯一的敵人。文學與藝術，在這樣一個模式的制度下，只會隨着人爲的社會壓迫的消除而獲得更高的發展。今天某些人在評述共產主義與文藝的關係時，總愛把兩者對立起來，以求證明共產主義是完全抹煞個人創造力的一隻怪獸，這是對馬克思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歪曲。

人們又愛拿蘇聯與中國爲例子，「證明」創作性的文藝如何不容於「共產主義社會」，這也是非常淺薄的看法。對馬克思主義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馬克思說的共產主義社會是在私有制被消滅，經過一個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之後才出現的，它的基礎是建立在高度發展了的生產力之上；共產主義並不是在一個國家範圍內可以適應的，甚至社會主義也不是在一個國家範圍內能夠建設完成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比資本主義高級，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社會高，因而在文化上也比資本主義社會進步。這樣看，我們便可以知道，蘇聯、中國等十四個所謂「共產主義」國家，實質上並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她們甚至還不曾完成了社會主義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至於她們的「黨性文藝」，正是這些國家爆發革命時，經濟上的落後性的某一反映；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主觀上如何幫助扶煞了個人創造力的八股文學，使其得到蓬勃發展的機會，則只要看看當前中共在批鬥「四人幫」對於文藝領域的壟斷從中發揚出來的材料，便可以證明簡單地把對文藝的握煞歸罪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是如何以偏蓋全，瞎子摸象的了。





談言論自由

學永

西方國家大談言論自由，到底言論自由是不是沒有條件的呢？

爲什麼需要言論自由？

從個人的出發點去看，言論自由是個人學習的輔助。對每一件事的看法，人人有不同，人人有自己客觀環境的局限，所以，要增廣自己的眼界、了解別人的看法、增加自己對該事物的認識，非通過討論交流不可。所以，言論自由有助於知識的傳播、智慧的增長。言論自由像心智的望遠鏡，增廣心智上的眼界。

從社會的出發點去看，言論自由是人們互相尊重的表現。對某一件事物彼此看法雖然有異，但是由於彼此尊重，所以不同的看法也可提出，以便互相參考。對一項社會的決策，每人都有發言權，具體的做法可以由羣衆經過討論後找出協議，也可以由羣衆代表考慮討論的內容，然後作出適當的判斷，再向羣衆交代。

所以，在機會均等和互相尊重的大前提下，言論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豐富個人和羣體的生活，也可以促進社會的進步。

可是，西方國家之中，機會均等實際上並不存在。這就形成了幾種不利於言論自由的現象。

機會的不均等和財產的集中於小撮人手中，乃形成了階級的對立。階級的對立就否定了人們互相尊重的存在。於是西方國家的「言論自由」演變成爲階級之間（或利益集團之間）互爭長短的戰場。既得利益者要鞏固自己的地位、保衞自己的利益，一邊收買、一邊直接控制國內的輿論喉舌。另一方面，與之抗衡的其他利益集團，分別以自己的利益爲依歸，針鋒相對。小部分的知識份子，或是在混戰中迷失了方向，或是在找尋自己理想的天地。

西方國家言論的自由是不平等的、集團中心的。它既非以全國利益爲依歸，亦很少是個人觀感的產物，而是主要爲階級或集團服務的。言論的主流是作爲既得利益者的喉舌，次流是作爲抗衡者的輿論，再次流才是個人的抒發和評論。

中國的言論自由也是不平等的。言論的主流也是作爲既得利益者的喉舌。號稱是「無產階級專資產階級的政」的體現，實質是直接向當權者負責，說當權者主觀上認爲服務無產階級政治的話。個人的抒發和評論是暗流。

這樣看來，在中國和西方國家中，眞正的、平等的言論自由是沒有的了。

將來又怎樣？

現實和幻想

方生

沒有比「現實」和「幻想」更含糊更濫用的名詞了！「逃避現實，沉醉於幻想」的被揶揄，「以前幼稚的幻想都拋開，如今能夠面對現實」的就被認爲是成熟。但是，到底「幻想」和「現實」是什麼呢？誰知道，現實是否會觸起了幻覺？又誰知道，幻想存在的本身是否一種現實？

談到現實，不少人將之與金錢視作同等。可不是嗎，錢多好辦事，錢少寸步難，有錢可以昂首濶步，沒錢的則祇有垂頭脅肩。一隻猩猩披金掛玉，或者一隻猪玀坐上了勞斯萊斯，不少人會必恭必敬，又讚又羨。對金錢着魔着得將之當現實，何嘗不會衍生出幻想？可不是嗎，也許你會認識某某人，錢不離口，似乎很現實，却恨自己不是百萬富翁，於是幻想自己中了頭獎彩票，而且把這種「幼稚可笑」的幻想宣諸於口了。講現實而陷於幻想，大概是出乎對現實的誤解，以及對這誤解了的現實有不能自制的慾望。將對現實的幻想當作是現實，再不是成熟，而是糊塗了。

至於「幻想」又是什麼？在所謂愛情文藝小說中描寫的某某少女幻想自己遇上了一位所謂「白馬王子」。光是遇上而沒有吸引「白馬王子」當然還未能達到這份幻想的完美。在少女的內心深處，不是愁沒有「白馬王子」向自己奉獻愛情。如果眞的有位「白馬王子」疼愛，自然會一萬個願意，除非喜歡鬧別扭。遇上「白馬王子」與其說是幻想，倒不如說是自戀心理（narcissism）在作祟。

幻想不等於是白日夢，亦不一定是思想的任意塑造。請看一下近年來歐美出版界蓬勃發展的科學幻想小說，究竟有多少是較爲符合科學的科學幻想？許多作家固然缺乏基本科學常識，甚至連弄通一點科學亦不願意；所以筆下的作品，不再是科學幻想小說，而應是神秘小說了。這好像武俠小說一樣，作者往往不懂武術，任意誇大，說是武俠，不如說是神仙，說是武功，不如說是法術，神怪詭異，難以稱作武俠小說。能夠天馬行空般幻想又能夠恰到好處合情合理，是何等難的一回事！

幻想，本身是智慧的構思。懂得幻想是成熟的徵兆，盲目講現實是幼稚的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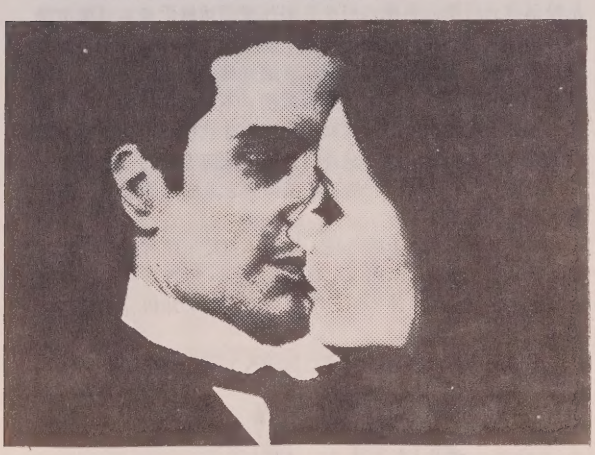
如果說幻想是天上的月亮，伸手不可及，祇有說說「欲上青天攬明月」的份兒，那末，我們也會說，現實是放在眼前的一塊冷冰冰的骨頭，伸手可以放在口中嚼嚼，却沒有一點兒味道。

沉迷於講求現實而不懂得幻想的人，可以醒醒了！

最後大亨
LAST TYCOON
魯平

近年來荷里活電影興起一陣懷舊熱，史葛脫・費茲傑羅的小說不斷地被搬上銀幕。第一部拍成電影的是「大亨小傳」，傑克・基萊頓執導，羅拔・烈福扮演書中的浪漫人物蓋斯比。這部片有意把原著電影化，由於過份刻意經營，變爲一般荷里活的通俗愛情故事。這一次，費茲傑羅的遺著「最後大亨」搬上銀幕，論成績來看是比較前一部片出色。這部片結合荷里活的人才，如導演伊力・卡山，編劇夏洛・品脫，演員羅拔・狄尼路、積尼高遜、珍摩露等人。

這部片十分忠於原著精神，其中畧有更改故事情節。片中最重要的更改是把第一人稱的敘事手法改爲第三人稱。這樣刪去費茲傑羅所用的傳統敘事手法，卽是以幾個人物的看法去表達主人翁特出的性格及中心主題。編導是希望用客觀的手法去寫一個人物，不加以其他的觀點或象徵手法，嘗試讓觀衆自己去領會及欣賞。沒有讀過原著的觀衆可能摸不着影片的中心主題，部份場面拖得太慢，這方面顯然是美中不足之處。



這部片是以二十年代荷里活爲背景，講的却是一個雄才偉畧的製片家門羅・史達的事蹟。由於編導以七十年代眼光觀看二十年代社會，是不可能完全重拍當時荷里活電影王國的一切。片中的時代背景及細節沒有過份渲染，那些加插的電影片段看上去根本與時代脫節，而且還諷刺了當時流行的幾種類型電影。荷里活電影以荷里活爲題材已經不是新鮮，其中以「星海浮沉錄」及「日落大道」聞名一時。這一類片本身就帶有諷刺性，不能客觀的指出荷里活與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平衡進展，因此往往流爲通俗劇形式。費茲傑羅晚年寫作方面不得志，酗酒誤事，於是去了荷里活當編劇，他將個人的才華賣給荷里活，直至沒落。「最後大亨」還未完成便逝世。費茲傑羅要寫的荷里活是一種實業，同時也是整個美國的縮影。主人翁門羅・史達和「大亨小傳」的蓋斯比一樣，司是白手興家的資本家。他隻手控制整個電影事業，獻出全部的智力和意志創造最有力的通俗藝術形式。史達是夢的製造者，他提供別人娛樂，但私底下却不能完成個人的夢想。簡單地說，門羅・史達是所謂「美國夢」的悲劇人物，另一方面，他是代表着一種舊有的美國性格及傳統，隨着新勢力的抬頭（書中柏比狄形象化這一點）而逝去。費茲傑羅把個人經歷詳細紀錄在書中，他沒有正面批判史達或荷里活是有點一廂情願，這種個人矛盾正是費茲傑羅的性格。費茲傑羅晚年在荷里活埋沒自己的才華，想不到死後小說却被拍成電影，其中不無諷刺之處。

辣手神探冲天炮（港譯）
ENFORCER
夸父

雖然警察電影曾經掀起一個熱潮，並且取代一切動作片，但是發展到今日，已不再成氣候了，「辣手神探冲天炮」更可以說是這個類型的末流，了無新意，除非再有新的冲擊力量介入，否則可以爲警察電影作一個段落的總結。

警察電影的社會背景是今時今日，描寫對象是七十年代的警察與高度組織性的幫會、毒販、貪污等惡勢力作戰，甚而對制度上的垢病挑戰。荷李活的警察電影偏偏脫離事實，閉門做車的產品，期望中反映活生生的事實與人物皆付之闕如，一切皆違反本質上條件的限制。筆者並不反對把警察塑做成正面化的英雄人物，强調那股嫉惡如仇的精神，但却不能把它作爲製做血腥大屠殺的理由，一廂情願的說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辣」片中的革命軍劫取軍火庫的火箭炮，綁架市長是爲了勒索金錢抑或是具有政治意義，編劇祇假設一個模型予這批人，然後輕輕帶過，把重點放在哈利與女督察間的關係上。大男人主義的哈利與滿口法律條文的女督察簡直是生活於兩個不同世界的人物，思想、行事方法絕然不同。在哈利的陰影庇護下，一無所知的女督察（證諸於軍部示範的火前炮威力）得到實際工作的經驗，而且二度於危險關頭拯救哈利脫險，其間的轉移並沒有留下足夠的伏線，所以她的殉職所引起的共鳴打了一個折扣。

結局時，哈利站於廣場上的美國旗之下，太陽從另外一個角度射進來，足下躺着殉職的女督察，攝影機就於此時慢慢地向外拉出，隨着入鏡是警察局的直昇機携帶贖金來交換市長的生命。這種矛盾不調和的鏡頭組合正好代表「辣手神探」片集的主題：哈利是個人英雄主義者，他對暴徒以暴易暴，對女性却粗獷中帶溫馨，對制度不滿；他完全可以審判世界上每一個人，他是超然的法律執行者，但是他仍然不愧是傳播美國主義的使徒。

安省華僑史 彙編之一

無業遊民

溫沙市華人社區簡介

編者按：一九六五年底，安省溫沙大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學院的盧鐸夫・喜齡（Rudolf A. Helling）在安省人權委員會的資助下進行了一個名爲「黑人、華人和義大利人在溫沙市社會結構裏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Negroes, Chinese and Italian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Windsor Ontario）的調查報告。透過問答的形式和局部的研究，喜齡比較了上述三個少數民族多方面的異同，並且就調查的結果向安省人權委員會提出了若干建議。我們在這裏將該調查報告有關華人的部份譯成中文，作爲本篇的開端。在翻譯的時候，我們盡量依照原文的意思，祇在無關重要的部分作了刪節。我們不一定同意原文的觀點，但爲了「存眞」起見，我們還是決定把它翻譯出來。調查報告引述資料謬誤，或足以引起爭論之處（若然有的話！）還望有識之士來信指正和討論。

歷史的回顧

外國人很少能夠全然了解華人在溫沙市定居的生活狀況。其它少數民族與外界人士接觸頗頻繁，而華人則處於半隔離的生活狀態。

十八世紀的九十年代，大概是華人移居溫沙最早的時期。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五年的四年間，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爲了完成卑詩省費沙河一段鐵路的工程，召募了大批華工。一八九一年，加拿大政府允許一間名爲安得當黑（Onderdonk）的建築公司從中國南方召來一萬七千名華工。在鐵路工程完竣後，華工發覺在其它的建築行業內簡直找不到工作，因而被迫轉到服務性的行業去。稍後，部份華人開始向加拿大東部發展，到安大畧省和溫沙等地方找尋新的機會。一八一一年至一九二九年間，溫沙埠的經濟迅速增長，華人移居該市的亦漸多。這期間，大量單身的男性華工湧至溫沙。他們先前有些是在加拿大其他地方的農場裏工作，有些則曾經在歐洲居留而沒有家庭牽掛的人。華人工作性質的範圍大多數是與家務有關的，包括洗衣和提供價廉物美的食品。

加拿大政府從來沒有全心地鼓勵華人移民來加。首先，加拿大政府向每一位進入加境的華人收取五十元加幣的人頭稅，希望藉此苛例打掉華人欲移民加拿大的念頭。一九〇一年，人頭稅的稅額增至加幣一百元，四年後則再暴漲至加幣五百元。除非申請者有担保人在加拿大。這筆龐大的款項實質上收到打擊華人移民的效果。藉着人頭稅制的關係，形成了博文會館。（Benevolent Associations）與 及類似的團體在華人社區內的巨大影响力。

在主要來自有組織力的工會底堅持下，加拿大國會於一九二三年通過了一條「華人移民法案」，並且於一九二七年進一步修改和加强了法案的限制範圍。該法案頒定除非是屬於該法案定義下的加國公民，否則，祇有那些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在加拿大居住的華人才可以繼續留在加國境內。一九一七年以後進入加境並曾繳納五百元人頭稅的人才不至被遞解出境。加拿大政府規定下的外交使節團的成員，在加出生的華裔、某些類別的商人、與及實質上是來加拿大求學的留學生等才不受他們原來的公民籍和效忠的政府的背景限制，「華人移民法案」裏的細節更是苛嚴，使移民局擁有無上的權力對付華人。明顯地，訂立這條法案的目的是希望以平和的手法來排擠華人。在「華人移民法案」有效期間，祇有十五名華人能夠合法地被批准進入加拿大。華人離開加境必得註冊，再度入境時才不致被拒。華人並且不能離開加境超過兩年的時間。

一九四七年，加拿大政府撤消了「華人移民法案」。像其它的移民和居民一樣，華人享有差不多同等的規則和法例。根據一九五三年通過，一九五六年修改的第二十D條規例，華人可以担保丈夫、妻子、二十歲以下未結婚的子女、年齡超過六十五歲的父親或六十歲以上的母親前來加拿大。申請獲准的子女需與父母一同前來加拿大。一九六二年修訂的移民法例仍然歡迎担保近親移民，至於屬於其它分類的移民的選取，則視乎申請人的教育、技能和訓練，而非以種族背景來作標準。

「假仔紙」

華人在溫沙的社會地位大抵上與華人在加拿大各地的相若。本世紀的二十年代，華人在溫沙的人口增加了少許。排華法案對已經在加境的華人沒有多大影响。一九三一年以後，華人在溫沙的數目逐漸減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後，華人人口數目才停止下降。到了一九四七年，第一批華人担保移民來到加拿大；一九五一年後，此類移民逐漸增多。移民政策的放寬給「假仔紙」的制度（Slot system）提供了機會。在「假仔紙」的制度下，華裔加人通常在南中國那裏成家立室；在居留加拿大的期間，定期回鄉探親。他所生的子女或是在他名義下的「兒女」，均有權移民進入加拿大。倘若造名的或眞正已出的兒女死去，「假仔」的虛位便可以過契給親屬，或是到香港出讓給別人。祇要把那名「假仔」隨同領有加國公民身份的「父親」帶到移民官的面前，他便可以取得移民的資格。數以千計的華人曾經以「假仔紙」的資格來到加拿大。他們之間以男性的居多。因此形成那時期旅居在加拿大的華人「生男比生女多」的明顯現象。美國的華人社區是最早利用「假仔紙」的方法使華人得以進入美國的地方，並且使它系統化；這制度稍後才傳入加拿大的華人社區。不久，加拿大移民局的官員在皇家騎警的協助下，開始偵查「假仔紙」的行動。這兩個部門曾經要求香港警方合作，追查「假仔紙」的來龍去脈，他們獲得的資料却不多，這是由於「假仔紙」制度祇有在吻合了强大的鄉黨組織的利益才能夠施行起來，族人是不會洩漏它的秘密。公開承認使用「假仔紙」的方法進入加境，祇會損害了華人在社區的面子。

六十年代溫沙的華人

六十年代，加國政府曾經一度考慮嘗試以「大赦」的方式，來解決華人移民的問題。在某一段時間內，任何非法入境的華人，祇要前往移民局表明自己的身份便可以轉取正式移民的資格。不幸地，由於過往加拿大政府對華人種種苛例，促成華人不再信任移民局，前往表明並改變護照身份的華人並不多。因此，目前在溫沙，部份的華人仍然是採用兩個姓名；在華人社區的圈子內用的是自己的眞正姓名，而爲了應付政府或對外則採用他們的「加拿大」姓名。非法的身份往往導致被人利用的機會，尤其是被那些有法子把他們帶來加拿大的人利用。持有「假仔紙」的人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資，並且祇能局限在唐人街內找工作。

由於華人社區內男多女少，王老五很多時被迫到香港找尋結婚對象。在那裏，他們被視爲特殊階級，因而有機會娶得比自己身份更高的配偶。來自一般環境的華籍男仕，偶獲教育程度較高的女子「垂青」。與舊中國的情形相反，旅加華人的妻子教育程度和修養高出她們丈夫的是相當普遍的情形。在新的移民法則實施後才申請來加的則是別一類型的移民，他們很多是來自外省的，日常使用的語言則是國語而非四邑語，這些新一代的華人移民有別於老一代的移民，彼此亦不相往還。大部份新的華人移民是屬於專業人材和技工；他們比較容易適應加拿大社會的制度。

目前（譯者按，指一九六五年左右）大概有七百五十名左右的華人在溫沙居住，這數字却與政府的人口統計紀錄畧有出入（請參考圖一）。

六五年華人社區的狀況：

根據調查統計，在愛撒斯郡（Essex County），佔百份之八十二的華人是居住在溫沙市內的。土生的華裔則住在近郊，而祇有少數的老一代華人是居住在郊區裏。百分之七十五住在河邊區（Riverside）的華人是以中文作爲母語；住在沙文治西區（Sandwich West）的華人，使用中文的祇有百份之六十；而在溫沙市內，仍然使用中文作爲母語的華人却高達百份之八十七。

華人最初大多是住在溫沙市內臨近河邊道東一帶的地方。其後，這區域內的高度發展，迫使華人遷離那裏。新的唐人街座落在栢克街西（Park St. W.）和杜高路（Dougall Road）之間，北接大學路（University Avenue），南則以雲鐸路（Wyandotte）爲界。正如專業界的華人一樣，第二代土生的居所的分佈比較廣泛。除了部份在溫沙大學攻讀的學生或部份專業人士外，溫沙的華人很少使用國語交談，而外省籍華人在溫沙市祇有少過十五名的數目。百份之九十在溫沙市居住的華人是來自四邑的。這數目特別包括了持有「假仔紙」身份的人。四邑是指廣東省的台山、開平、恩平和新會。溫沙的華人大部份來自新會，一個位於澳門西北不遠的縣。

溫沙居住的華人以姓李、黃、陳、胡、余和吳的居多。在溫沙，李氏宗親會看來是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一個宗族。

在溫沙，祇有少數華人是在傳統的飲食業和服務性質以外的行業工作。大約有五名華人是在汽車和鋼鐵製造廠工作。一名不是四邑籍的華人是一間汽車修理廠的修車技工。其它沒有專業訓練的華人則在雜貨店，食品製造工場和洗衣館工作。一間曾經由一位有名的華裔商經營，現今則是美國人的資本，名爲重慶股份有限公司，在目前溫沙市的唐人社區擁有十間唐餐館，兩間雜貨店，數間洗衣館。若干非華資的餐館也僱用華人爲廚師，洗碗工人和酒吧侍應等職位。一名華籍宣道者在一間由加人主持的教堂裏工作。在溫沙市內，也有數位華人醫生和一名牙醫執業。以加拿大一般的標準來看，大部份居住在溫沙的華人的生活是算得上清貧的，祇有二、三戶人家是可以被稱爲富裕的。信教的華人大部份是隸屬於聖安祖士長老會（St. Andrews Presbyterian Church），或是浸信會（Temple Baptist Church）。從來不到教堂的華人佔了更大的比例。溫沙的華人對政治一直不大活躍。那裏從來沒有華人參與政治競選，祇有一位有名的華裔對溫市社區的事務和組織發生興趣，而其它的人則從來不直接參與這些活動。很多華人把社交活動局限於民族團體範圍以內。在雲鐸西街有一間名爲中華(Chung wah)的華人會社。別一羣華人則在雜貨店內進行不規則的聚面，在國際自由日的遊行(International Freedom Festival Parade)中華會的成員表演舞獅的節目。溫沙大學裏的華籍學生也甚少與其他學生來往。大約有二十五名來自香港的學生。他們很用功讀書，很少參與課外的活動，與外界祇是有極少數的私人接觸。

圖一、安省愛撒斯郡華人人口從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增長情況

區域	1911		1921		1931		1941		1951		1961	
	人口總數	華人人口	人口總數	華人人口	人口總數	華人人口	人口總數	華人人口	人口總數	華人人口	人口總數	華人人口
溫沙市（四十一區）Windsor units of 141	23,433	60	55,935	217	98,179	358	105,311	259	120,049	263	114,367	506
柯哲朗 Ojibway	—	—	101	—	79	—	24	—	21	—	6	—
河邊區 Riverside	—	—	1,155	—	4,432	6	4,878	3	9,214	—	18,089	32
聖奇爾灘 St. Clair Beach	—	—	—	—	—	—	213	—	474	—	1,469	—
沙文治東區 Sandwich E.	4,195	3	1,713	—	5,421	—	8,571	2	13,663	—	21,819	3
沙文治南區 Sandwich S.	1,584	—	1,584	—	2,276	—	2,482	—	658♣	—	4,436♣	—
沙文治西區包括喇沙 Sandwich W. include Lasalle	3,231	6	4,598	1	4,485	2	5,686	9	8,196	—	28,613	28
德金泰 Tecumseh	—	—	978	—	2,129	5	2,412	1	3,543	—	4,476	—
愛撒斯郡 Essex County	67,547	87	102,575	241	159,780	394	174,230	299	217,150	305	258,218	602

♣ 沙文治南區市內

北美洲華僑史

梁啓超

（五）加拿大東部之行

四月三日，由溫哥華首途，乘汽車往紐約，卽C.P.R.公司之鐵路也。此鐵路橫貫美大陸，長三千餘英里，實中國萬里矣。當俄國西伯利亞鐵路未成之前，此路實世界第一之長線（美國鐵路雖貫大陸者數線然非全成於一公司之手）。當初議建築時，資本家多目笑之，募股份，應者寥寥，謂其工程之斷難就也。今則利數十倍矣，加拿大聯邦之鞏固，實自此鐵路始。鐵路與國政羣治之關係，偉矣乎。

行經落磯大山而東，層峯積雪者千餘里，汽車所經行最高點，距海平殆三千尺，以機器車三座推挽始得上。沿山螺旋，蜿蜒而進，一目見三鐵路，若作平行線形，亦一壯觀也。車中有感，口占一絕：

四月猶爲踏雪遊，
光明世界入雙眸，
山靈知爲誰辛苦，
如此華年也白頭。

行五日抵阿圖和（編者按，卽渥太華），阿圖和爲加拿大首都。總政府在焉。加拿大之政體，與澳洲畧同，名雖英屬，實則一獨立國也。

初十日，抵滿地可。滿地可者，加拿大最大之都會也。人口約四十餘萬，工商業大盛，視西部各市，過之遠矣。其中法國之移民强半，市內除最旺之一隅外，多有以英語不能通行者。吾未嘗至法國，觀此亦可以見法人社會之一班焉。

凡在阿圖和二日，在滿地可五日。其地素未有中國維新會，至是始設，人心大好，會所咄嗟成立焉。

（六）由加拿大至紐約

四月十六日，由滿地可抵紐約，以午後九點鐘至。維新會同人迎於車站者數百，華人市皆罷工，觀者如堵。余直至華人戲院，演說片刻，表謝意。 座中西人亦多， 並以英語謝其歡迎。

居紐約凡兩月餘，其間由紐約而適波士頓，而適華盛頓，而適哈佛，而適費爾特費（編者按，卽 ），而皆復返於紐約，實居紐約者不過一月。其間接見邦人，接見報館訪事、演說、赴宴，費時日十之八九，殆無餘晷以及遊覽調查之事。所觀察草草殊甚，僅以夜間藉字典及舌人之助，一閱報紙，或訪問於其市民，欲以評論此世界第一都會，所謂隔靴搔癢也。姑就所觸，隨記一二。

二十六日，赴亞細亞協會之宴。座中美國人二十三，日本人二，中國人並余而六。其美國人類皆紐約市中實業家之有力者也。此會之目的，全在生活計上，於政治上毫無關係。然東方稍知名之人至者，必饗宴焉。前公使伍，現公使梁，皆嘗到演說，宴梁後半月而余至。席間總幹事赫欽士，先起演說，極言美國無利中國土地之意，惟願保和平興商務，余亦照例述感謝之詞，並言中國若不得良政府，則世界之平和，終不可得望。列强狃於現政府一日之安，欲在此亂機滿地之市場，殖其產業，非預備數倍之保險費不可；或又欲利用現政府之昏弱，而因以攫特別之權利，吾信其將來之或失，必不償現在之所得云云。余約演四十五分之久。此後繼演者尙十數人，率皆照例附和余言。

（七）美國移民一覽

余遊美，無一事爲美人憂爲美人恐者。雖然，有一焉，則歐洲及其他各地之下等民族，日輸入於美國，而爲其國民，是也。試將去年及今年之統計列其移民比較之如下（此表據西歷十二日在舊金山所購美國今年統計書）：

國　名	一九〇二年	一九〇三年	增加數
奧大利匈牙利	171,989	206,011	34,022
比利時	2,577	3,450	873
丹麥	5,660	7,158	1,498
法蘭西	3,117	6,678	2,461
德意志	28,304	40,086	11,782
希臘	8,104	14,090	5,986
意大利	178,367	230,622	52,247
英倫	13,575	26,219	12,644
愛爾蘭	29,138	35,310	6,172
蘇格蘭	2,560	6,143	3,583
威爾斯	763	1,275	512
中國	1,649	2,209	560
日本	14,270	19,968	5,698

（附註）上表所列，連美國屬地在內，卽如中國條下，包含往檀香山及菲律賓者。日本條下，則往檀香山者居大半也。然惟此兩國惟然耳。自餘諸國人，皆往美國本境，其往屬地者不及百之一也。

更舉最近二十五年間移民之統計，則

一八七八年	138,469人	一八七九年	177,826人
一八八〇年	457,257	一八八一年	669,431
一八八二年	788,992	一八八三年	603,322
一八八四年	518,592	一八八五年	396,346
一八八六年	334,203	一八八七年	490,109
一八八八年	546,889	一八八九年	444.427
一八九〇年	455,302	一八九一年	560,319
一八九二年	623,084	一八九三年	502,913
一八九四年	314,467	一八九五年	279,948
一八九六年	343,267	一八九七年	230,832
一八九八年	229,299	一八九九年	311,715
一九〇〇年	448,572	一八〇一年	487,918
一九〇二年	648,743	一八〇三年	857,046

（附註）上表所列，以今年（即1903年）爲最高額，而1882年次之，去年（即1902年）及1881年1892年復次之。1885年何以銳減，則初禁華工之結果也。1894年以後何以復銳減，則再禁華工之結果也。由此觀之，知前二十年移民之數，中國人占一大部也。至近一兩年之增加，則全屬歐洲人矣，觀表自明。

由此觀之，僅以二十五年間，而外國人之入美者，總數凡一千一百八十餘萬，居美國人口七分之一有奇矣，而其勢且滔滔橫流，未知所屆。稽其國別，則意大利人及奧匈人最多，在去年各十七萬餘，在今年各二十萬餘，居全數之半，次則俄羅斯人，去年十萬餘，今年十三萬餘，合三國計之，幾居全數三之二。稽其種別，則拉丁民族居八分之三有奇，斯拉夫民族居八分之二有奇，其餘東方民族及難晰別之民族，居八分之二有奇，而條頓民族則僅八分之一也。且其國別種別之遞嬗，愈近而愈變。當十年前，即一八九三年，德國人之來者七萬八千餘人，去年則減至二萬八千餘人。十年前，愛爾蘭人之來者四萬三千餘人，去年則減至二萬九千餘人。若意大利，則十年前來者僅七萬二千餘耳，而去年乃增至十七萬，今年乃增至二十三萬，此實北歐移住者日以少，南歐移住者日以多之明證也。若是者爲美國之利乎，將爲美國之害乎，吾不能無疑。

美國當千八百年，只有五百三十萬人，至千九百年，驟增至七千六百三十五萬人；百年之間，增十五倍，何以得此？曰惟受海外移民之賜，美國前此以歡迎移民爲國是也，無足怪者。雖然，以今日大勢所趨，恐數十年以後，美國將不爲條頓人之國土，而變爲拉丁人及他種人之國土，此其機不徒在移民之突進而已。其原住之舊民，婚姻愈遲而產子愈少；其入籍之新民，婚姻愈早而產子愈多，苟率此不變，吾恐不及百年，而前此殖民時代獨立時代高貴民族之苗裔將屏息於一隅矣。吾所以代美國抱杞憂者莫亟於是，而美之政論家，若瞶然不以爲意焉，是則下走所不解也。

（八）外來移民滲入的影响

美國人以平等博愛之理想自誇耀者也，故其對於他民族，妒嫉之念頗淡（除中國民族不計），是其可敬佩者也。但以吾觀之，美國立國之元氣何在，亦曰條頓民族之特質而已。使政治上社會上種種權利，全移於條頓以外諸民族之手，則美國猶能爲今日之美國乎，吾所不敢知也。昔北歐蠻族南下，而羅馬之文物以亡；自今以往，美國若有潰虞，其必自此焉矣。

美國自恃其同化力之强，謂能吸集種種異族，使從同於美，故雖龐雜不爲害，斯固然也。雖然，吾見其同化力之速率，不能與外加驟進之力相應也。昔日本人謂中國人最不肯同化，無論至何地，必自成所謂支那村支那町者（編者按：支那村支那町即現今之唐人街）。今吾觀於美，則豈惟中國人而已；即紐約市中，若者爲義大利村意大利町；若者爲猶太村猶太町；若者爲俄羅斯村俄羅斯町。雖以吾輩初旅行者，猶一望而知其區別。然則所謂同化者，其亦僅矣，其亦緩矣。

以吾所見，則外來之民族，其影響於美國之道德上、政治上者甚多。

其道德上之影響奈何；外來之民，固非無大學家、大政治家、大宗教家，足爲美國前途之光者。雖然，不過百中之一二耳。若其大多數，非無智無學之農民，則蕩檢敗行之醜類也。或其生計不能自存於本國；或其性行不能見容於本國，乃不得已，而以新大陸爲逋逃藪。據倫敦移民會報告書云：每歲由愛爾蘭移住美國者，其百分之七十四爲罪滿出獄之囚徒。觀於此不能不爲美人變然驚也。失業無賴之人麕集既衆，於是酗酒茹淫殺人盜窃諸惡風，日浸淫於美國，終非宗教之制裁所能範圍。據千九百年統計，紐英倫四省之人口，其外來者居百分之四十，而犯罪之人數，外來者居百分之七十五，可以見其概矣。其他雖不悖於法律，而有害於風俗者尚多。據千九百年統計，則美國賣酒業中百分之六十三，釀酒業中百分之七十五，飲食店中百分之七十七，皆爲外來移民之所營業云，其於道德上之影響，必不少矣。其政治上之影響奈何。

（一）外來者多酗酒，故務求所以利酒業，當投票選舉時，至生出所謂「酒家票」者，剔至爲政治上一勢力，近世有「禁酒會選舉團」，亦因防此弊而起也。

（二）外來者多好淫，故摩門教利用之（摩門教起於美國中都以一夫多妻爲教義）。當選舉時，生出所謂「摩門派投票」者，爲政治上一勢力。

（三）外來者之大多數屬天主教，故天主教投票爲政治上一勢力。

（四）外來者多持偏激之社會主義，故社會黨投票爲政治上一勢力。

（五）外來者多麕集於大都會，至使市政種種腐敗，危及地方自治之基礎。

（六）外來者多不能同化於美國，各自用其國語，沿其國俗，於合衆國政治上，別爲一團，若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愛爾蘭人、其最甚也，故有所謂德意志投票、意大利投票、愛爾蘭投票者，各爲一特別之勢力，牢不可破，每當選舉時，其妨害公安公益者實甚。

（七）外來者以無智、無學無德之故，實不能享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以一國主權，授諸此輩之手，或剔至墮落暴民政治，而國本以危。

由是觀之，則外來移民，其關係於美國前途者，邈乎遠哉。然此等種種惡影響，惟自歐洲來者實尸其咎，而自中國來者蓋甚稀焉。中國人之病美國者，不過勞傭價廉，與彼之下工相競耳。而所競者，又僅在太平洋岸之一小部份，而非若彼等之蔓延及於全國也。然則爲美國計，中國移民，不過疥癬之患，而歐洲移民，實心腹之憂也。乃彼中政治家，顧厄我而驕彼者何哉？彼有選舉權而我無之耳。美國政治家，他無所懼，而最懼工黨，蓋一失工黨之歡，而位遂不可保也。準是以談，則美國人對於此問題之理由，可以見矣。夫孰不知其爲國家將來一大患，其奈國中選舉票之半數，皆已在外來新入籍者之手，一倡異議，則萬戈向之。彼十年前固嘗有議禁意大利人者矣，乃不旋踵而噤若寒蟬焉。則國中有二百餘萬意大利人之投票以循其後也。使我華人在美者而有此權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噫。

讀者來函

編輯先生：

貴刊第二期關於四人幫問題的座談會裏，提到了李一哲大字報；我認爲人們探討中國國內政治局勢的種種問題之時，不可忽畧李一哲大字報的代表的政治意識。現欲借貴刊大家寫一角，表達我對李一哲大字報的看法。

李一哲是李正天，陳一陽、黃希哲的化名，他們都是廣州美術學院的畢業生，相信曾經參預文化大革命，並且遭受過鎭壓（註一）。他們大字報裏的意見，在某一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些經歷過文革的知識青年對中國政局的看法。雖然在大字報裏，我們可以從某些字句中看出李一哲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幹部說話（註二）。但這可能是爲了避免受太多方面打擊起見的做法；大字報裏最重要的且是最值得注意的部份，是關於一般人民如何能夠具體地擁有社會主義民主，如何確保人民的能夠獲得應有的民主——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擁有監督權利的問題，也就是說，什麼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的問題！這一點是以往的極左派紅衛兵從來沒有清楚地談到的。

在李一哲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正文的第一段裏，李一哲指出了所謂「走資派的社會基礎」：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註三）。毛澤東在世時曾經提過「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當他發起文化大革命時，其中一個主要的口號是反官僚特權！被打倒的張春橋率先揭起「限制資產階級特權」；中共的理論機關報紅旗在一九七五年四月號的一篇文章裏，亦提到黨內的「一些人員，也嚴重地滋長了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三害』行爲」（註四）；可見所謂官僚特權也者，並非是虛構出來的一回事。方海在「批判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摘要）一文裏，更列出了共產黨員的十種資產階級生活作風（註五）。但是李一哲提出解決官僚特權，與及隨之而來的對人民羣衆的鎭壓的辦法，却被批爲是「妄圖顚覆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打倒我們的黨」（註六）的「大毒草」。宣集文對李一哲進行了體無完膚的攻擊，「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限制特權的條文」（註七）。「我們的幹部不應是當官做老爺……最主要的是人民羣衆的革命監督」（註八）。宣集文對李一哲大字報裏以上最主要的論據不加以反駁，却亂扣帽子地誣指李一哲提出「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法制」（註九），這與當前中共指摘四人幫的「鋼鐵工廠」，「帽子工廠」有何分別？「擺事實，講道理」，李一哲擺了「把林彪這樣一個法西斯魔王法定爲接班人的事實」，然後講出「應當怎樣保證我們黨和國家和政權掌握在馬克思主者者手裏呢？」的道理，宣集文有沒有正面給予回答？難道這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嗎？四人幫不是差一點篡了黨權，奪了主席位嗎？劉少奇不是曾經一度是國家主席嗎？林彪不是在九大裏被指定爲接班人嗎？我們怎樣解釋這些事實呢？四屆人大不能如期召開，難道與中共黨內擁有特權之輩的阻撓無關？李一哲說「不知道這些代表是怎樣選出來的（註十），然而仍然對四屆人大充滿了希望，語語不忘對四屆人大的期待，難道不是出於對國家的熱愛？

李一哲大字報還批了王洪文的「五不怕」，它說：「王洪文同志報告號召人們發揚『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現在的情況，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不能形成湧來之勢的潮流。」（註十一）這些話現在不是全對了嗎？四人幫壟斷了報刊、雜誌等一切宣傳媒介，現在已得到證實，我們還能夠否認嗎？

今日指摘四人幫的人們，去年夏天在那裏呢？李一哲批了張鐵生（註十二），今天證驗了；李一哲反駁王洪文，今天也說對了；那麼他提出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呢？

當李一哲談到明哲保身之輩的態度之時，當他談到態度上如何眞正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鎭壓敵人，保衞人民」的法治原則之時，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去反對這種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禮治原則，我們能把無產階級的『鎭壓敵人，保衞人民』的法治眞正實行起來嗎？」（註十三），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今天看蘇聯的官僚統治，但早在赫魯曉夫之前的關係，難道不是「君臣父子，不得犯上」？否則王明這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何能直到投奔蘇聯之前，還是中共委員？王明這個既無革命功績，又無實際革命經驗之人，何能搞出了王明路線？他首先依靠的，不是當時得寵於史太林的米夫嗎？

我們只要記住一點，不去挑戰這種「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禮治原則，今天還是四人幫的天下；至於明天，是決定於我們——一切熱愛社會主義的人們身上！

讀者 金山 上

註一：在李一哲大字報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的張貼序言裏，李一哲說：「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青人，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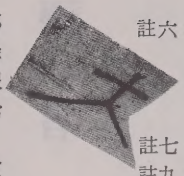
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兇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住，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明報月刊社一九七六年六月出版，李一哲大字報第十七頁。

註二：「……不少僅僅在某些方面執行了劉少奇、林彪在黨內貫徹的錯誤路線的好幹部却繼續被當做敵人加以無情打擊。」同上第十頁，「難道大批雖然犯過這樣或那樣錯誤，但經過長期考驗證明是對黨忠誠的老幹部就不應該再使用了！鄧小平、趙紫陽這些同志根本就不應該入中央委員會是不是呢？」同上第十三頁。

註三：同上第十八頁。

註四：參閱「回顧『三反』『五反』運動」——翟青【載於「紅旗」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第四期】

註五：參閱「批判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摘要）——方海【載於「學習與批判」一九七五年三月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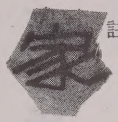


註六：「對『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的批判」——宣集文：明報月刊出版社李一哲大學報附錄一，第三十九頁。宣集文是中共著名理論家之一。他的文章常常刊載在「紅旗」、「學習與批判」上。

註七、八：同上廿八頁。

註九：同上五十六頁。

註十：同上十七頁。



註十一：同上廿五頁。王洪文在中共第十次大會上提出的報告內要求共產黨員「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九月版第十九、二十頁。

註十二：見李一哲大字報，第十四頁。張鐵生是在一九六八年下鄉的知識青年，七三年參加大學入學試時交了白卷，抗議考試制度。他的抗議書得到遼寧日報和人民日報的讚賞，列爲反潮流人物的典範。但最近四人幫垮台後，張鐵生亦被鬥倒。

註十三：見李一哲大字報第廿六頁。

ming-ko wong

An Exhibition of Silkscreen and Collograph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attend the preview on
tuesday, march 29,1977, 8-10p.m.

open to the public
march 30-april 23, tue.-sat., 12-5:30p.m.

OUR OWN STUDIO
587 Markham Street, Toronto, Ont.
533-4510

徵文

（一）本刊為一公開園地，歡迎各地讀者來稿。

（二）本刊選稿的原則：凡不作人身攻訐的文章均一律歡迎。

（三）來稿請以原稿紙書寫，切勿一紙兩面；除專題特約稿外，以不超過三千字為佳。來稿請附上真實姓名和地址，惟可用筆名發表。文章不願刪改請註明；如欲退稿請附上回郵信封。

（四）本刊因經濟關係，暫不設稿費，來稿一經刊載，即致送該期本刊二份。

（五）來稿請寄

P. O. Box 53
STATION P.
TORONTO,
ONTARIO,
CANADA.

土豆加牛肉？——

從鄧小平復出談起

在中共宣稱「四人幫」羽翼未完全被剷除之時，各國駐北京的通訊社紛傳鄧小平復出的消息，雖然後來經中共正式否認，但北京出現支持鄧氏復出的大字報，以及中共再版「中國建設」上吳德的演講時刪去批鄧一段，表示了鄧氏復出執政之說，是空穴來風，未必無因的。

著名美國作家韓丁最近在七間大學的中國同學會主辦的中國週中，發表關於當前中國局勢的演說，提及「天安門事件」實是由「四人幫」一手煽動的「反革命」事件，這種說法出自如韓丁先生的著名親中共人士之口，不無其代表性，相信在中共官方未正式宣佈關於鄧小平問題的決議之前，這類說法將充斥各親中共雜誌、報章。我認爲在天安門事件中，「四人幫」有參預鎮壓，是肯定的，因爲天安門事件本身便是指向四人幫的一次動員；然而說整件事件是「四人幫」策劃、導演的一個陰謀，則顯然與事實不符。假若天安門事件確是如韓丁先生說的，是「四人幫」的陰謀，那麼事後被清算打倒的，便應該是「四人幫」，而不應該是鄧小平；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毛澤東還在世，眞除華國鋒總理撤除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是毛氏本人的意思；人們總不能說是「四人幫」弄鬼，總不能說中共中央四月七日「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決議」是「四人幫」一手泡製的罷？由此可見，現在親中共人士如韓丁先生者，欲在天安門事件上替鄧小平洗脫關係，只是在替鄧小平復出製造輿論，趁羅列「四人幫」罪名時，轉移目標的一舉兩得之計，最終目的還是鄧小平復出時，可自圓其說。對於欲了解鄧小平果若復出，其眞正原因與其政治上的意義的人們，全無幫助。

鄧小平從復出到垮台

鄧小平從在文革中被指爲「資產階級司令部第二號頭子」到重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是中國經歷了七年的動盪中共黨內鬥爭，發展到某一階段的結果；由於「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組政（陳伯達）、軍（林彪）兩支柱倒台，軍人、國務院元老兩派與文革派經過數年鬥爭，優劣之勢明朗化，鄧小平便在元老派、軍人的支持之下上台，而付出的也不過是「不翻案」的口頭諾言，可見那時鄧小平支持者之多，實力之雄厚，黨、政、軍三方面都需要鄧小平那樣的人物來平衡局面，這是鄧小平那時復出的情形。現在再談鄧小平能否再次復出，亦需從中國的實際政治局勢來了解，如此方可探求鄧氏復出之可能性與及其政治上的意義。

導致鄧小平垮台的直接原因是「天安門事件」，據中共官方在事件爆發後指出，是鄧小平策劃的，有著其反動綱領爲基礎的一場「反革命」事件。令人覺得奇怪的，是假若只以四月五日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情形看，其嚴重程度不應是「反革命」的性質；雖然中共官方沒有宣佈，但是鄧小平衆多支持者，放棄支持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中担當的，一定有着其他原因；據我看來，主要原因不外以下兩個：一是「天安門事件」只是鄧小平企圖打倒文革派的整個部署裏的開路先鋒，接着下來將是一連串的打擊文革派的行動，這些行動由於「天安門事件」弄得太大而不得不放棄，支持鄧氏的幹部亦被迫放棄對他的支持；二是由於毛澤東的堅持，以毛氏在黨內的地位，在風平浪靜時要一下子打倒擁有衆多支持者的鄧小平，或許是一件難事（其難處就像毛氏爲了要打倒在黨內佔有絕對優勢的劉少奇、鄧小平、而不惜發動黨外羣衆進行奪權一樣），但有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爲口實，却能迫使擁鄧者讓步。所以在天安門事件前，江青等雖發動「反右傾翻案」，「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直接指向鄧小平的運動，眞正要打倒鄧小平時仍需要在鄧小平犯了實際上的錯誤（天安門事件）後才可能。

鄧小平復出的障碍

我們只要比較一下天安門事件與「四人幫」的垮台，可以發覺到兩者之間有一個大的分別；這個分別在於「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的性質，然而打倒的只是一個鄧小平，「四人幫」垮台後的肅清行動，却到今天爲止仍未停止。這樣比較，可知擁鄧勢力的龐大；毛澤東親自手批什麼「三項指示爲綱，階級鬥爭是綱，其餘的都是目」，率先發出鄧小平的問題已變化爲敵我矛盾的指示，仍只倒了一個鄧小平，並且鄧氏犯了「反革命」罪行，仍得以保留黨籍，則抗力之大可見。現在毛氏已去世，「四人幫」又倒了台，鄧氏復出的條件已具備了一半，剩下的障礙，是如何自圓其說，如何令一般人民，令一般深信鄧氏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幹部信服「天安門事件」是四人幫栽的賊，而其他一切對鄧小平的指責，皆出自四人幫操縱下的宣傳媒介，都是四人幫「鋼鐵工廠」、「帽子工廠」的產品。以現在中共批鬥四人幫的手法看，要做到以上幾點是不難的，最難處理的，是毛澤東本人對鄧小平問題的批示，與及忠於毛氏對鄧小平的批示的幹部。以上兩點，才是鄧小平復出的最大障礙。

蘇共二十次大會

有一種意見，認爲現時中國的情形和史大林死後的蘇聯相似，即倘若鄧小平復出執政，中國將會出現一九六七年蘇共二十次大會的局面，鄧小平將是赫魯曉夫，毛澤東將處於史大林的同樣地位，一些一向擁中共、反蘇共的西方共產黨，甚至認爲華國鋒本人已經是打倒毛氏嫡系的修正主義者，西德馬列共黨且分裂成兩派，一派擁華反江，一派擁江反華，所持論據即爲「保衞毛主席路線」，他們深信四人幫是中國的馬倫可夫、莫洛托夫，確認華氏爲中國的赫魯曉夫，鄧小平就更不用說了，他差不多是不曾被肉體上消滅的布哈林。這一類意見倘從四人幫與毛澤東在過去十多年的關係，過去是否忠實地執行毛氏路線的角度來看，倒不是全無根據的構想。四人幫縱使如何鬥爭鄧小平一系的策畧上與毛氏有所不同（事實上也可能如此），政治路線上則確是代表了毛氏自大躍進以來的思想；不過我認爲在評定華國鋒是否完全代表了鄧小平一系的路線，以致鄧小平一旦復出，是否即表示中國將會出現一「擺脫毛澤東思想時期」（de-Maoization period），則單以蘇聯的例子爲前車是抽象的，與中國的實際情形不一定符合。

毛澤東與史大林

毛澤東本人根本說來，是一個史大林主義者。史大林以爲落後國家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之後，在一國的範圍內可以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揭起三面紅旗時，在那「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裏說過一句非常出名的話：「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遙遠的事情了」，毛氏在這方面不但是史大林「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忠實追隨者，而且青出於藍，竟然認爲一國之內也可以建立共產主義的了。列寧的意見，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裏說得很清楚，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立，是在世界範圍內「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第一步，他一方面肯定了在一個國家內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但另方面認定當資本

主義發展成爲帝國主義，即超越了一國範圍之後，社會主義絕對不能單獨在一國中建設**完成**的。在這裏，毛澤東和史大林的一國共產主義或一國社會主義，都是站在與列寧的世界革命觀對立的地位。在黨與國之間的關係，人民的民主權利、文藝政策等問題上，毛氏與史大林亦非常接近，兩者只有程度的不同，無本質上的分別。然而毛澤東縱使師承史氏，在許多現實的政治問題的處理上却許多與史大林不同，這些不同點的形成，與其說是由於毛澤東個人的性格，不如說基於中國革命的發展和蘇聯十月革命後的種種國內環境的不同（雖然毛氏本人的性格亦相當地影响了這些不同點，但這不在本文範圍內，只好留待其他對這方面更有研究之士評述了），中蘇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是這些不同點的具體表現。毛澤東在對史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語一文中寫道：「林大林這本書從頭到尾沒有講到上層建築，沒有考慮到人，見物不見人。價值法則我們要講計劃，並講政治掛帥，他們只講生產關係，不講上層建築，沒有講政治，沒有講人民的作用。」這段說話倘若用在文化大革命時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差不多一個字不用改。自三面紅旗後，劉少奇雖說掌權，推行物質刺激，但口頭上亦不會根本反對過「人民的作用」；頑固如陳毅者，也不過說「不能只要紅，也不是不要紅，但要紅又要專，不講專不行」。赫魯曉夫及他的繼承人不管這一套的，他們是史大林主義的右派；毛澤東思想裏既有史大林右的一面，亦兼有左的一面。政治術語謂之中派，可以向右轉，也可以向左轉的，主要視乎與「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原則是否相符，至於是否損及其他國家革命的利益，是無暇顧及的。蘇聯自赫魯曉夫推出「擺脫史大林主義化」（Destalinization）之後，即踏入右傾穩定時期，什麼三和政策（即與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和平共存，在經濟上和平競賽，從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便是史大林主義右翼的赤裸面目。中共拒絕追隨克姆林宮的全面右傾，反而急遽向左轉，搞出了令國家經濟元氣大傷的三面紅旗，然而却在

政治上保留了史大林主義「左」的一面。中共官方把毛澤東說成是中國革命傳統的保衛者，把劉少奇說成是破壞者，在是否走蘇共二十次大會後的道路這意義上，倒是相當貼切的。

中共與蘇共

明白了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們在實踐史大林主義上的不同，則對中蘇共兩黨的黨內鬥爭的性質便能夠把握到其中脈膊。簡單說來，中共自三面紅旗以來的黨內鬥爭，是以毛澤東爲首的史大林主義的中派和以劉少奇、鄧少平爲首的史大林主義的右派之間的鬥爭。毛澤東在蘇聯走「擺脫史大林主義化」的過程中吸取了經驗，加入了「走羣衆路線」、「防修反修」的意見，在處理國內政治上便是加重强調「政治第一」、「牢牢掌握上層建築領域」，這是劉少奇、鄧小平忽視的。然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裏的權威與史大林在俄國十月革命中的地位畢竟不同。劉、鄧不用說難望列寧項背，就是和那時的托洛次基比較，也相差了一大截；於是只能「打着紅旗反紅旗」，這是中共黨爭中非常值得留意的一個因素。毛氏與其在黨內的敵對者進行鬥爭時，往往站在「左」的一方（其實質是不是「左」，有待研討，但起碼口頭上是左的）；蘇共的黨爭，却往往是從更右方面來的，此亦是中蘇共兩黨的不同之處。

蘇共二十次大會的翻版？

我認爲鄧小平果眞復出，不一定表示中共會出現「擺脫毛澤東思想化」，不一定表示中共會走蘇共二十次大會後的道路。主要原因在於①毛澤東思想以至其本人在中國革命裏担當的角色，與史大林在去世前二十多年在蘇共黨內扮演的角色不同；二人對其本國革命發展的影响亦屬迥異。②在國內外政治局勢變化的影响下，中國與蘇聯基於其本國利益，作出不同政策的回應；這些政策措施，反過來又影响了兩國在上層建築領域及下層建築的發展；這兩方面的發展，構成兩國整體而言，在許多問題上極端不同的看法。關於第一點，由於中國革命發展過程的崎嶇，毛氏領導下的中共自抗戰勝利後的戰畧，基本上違反史大林當時的戰畧部署，中共不管史大林的反對，把革命推向勝利，爆發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成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領導者，毛澤東思想得到了不容挑戰的絕對地位。與此比較，史大林在蘇共黨內的唯我獨尊的地位，顯得微不足道。如果說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權威建立在對十月革命勝利的基礎上，則史大林在蘇共黨內的權威，便是建立在對十月革命的叛賣上；自布哈林等最後一批十月革命的領導幹部被清洗後，十月革命可以說是停頓了，日後蘇聯經濟的發展，已經是十月革命成果裏的國有化財產制最起碼的表現，自此後，史大林即斷送了十月革命的傳統，蘇聯也走上完全右傾的道路。毛澤東與史大林在對其本國革命發展中所担當的不同角色，斷定了兩者之間在其國內羣衆中的不同地位，赫魯曉夫可以一下子打倒史大林嫡系，主要的武器是蘇聯人民對史大林的鄙棄，與及要求民主化的心理。鄧小平一系若要挑戰毛氏在中共黨內的地位，要同時考慮到國內人民，對以毛氏爲代表的中國革命傳統的擁戴。第二是直至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前，中共一直以來的反帝國主義、反蘇聯修正主義的鬥爭，在黨內、國內所造成的左傾意識，對鄧小平一系欲走蘇共二十次大會道路是一個大威脅。只要看看在毛澤東同意下的和帝國主義建立關係的外交政策，仍不得不冠以「革命」外交政策兩字便知，紅旗仍是要高舉，不管實質上是否「反紅旗」。當前中國各省的動亂，顯然出自某些幹部對現時中央的不滿，以爲中國已經在走史大林死後的蘇聯的老路了，可見這左傾意識影响的深遠。文化大革命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它最大的成果是動員了千萬以上的羣衆參預國內政治，而文革又以反修正主義，反資本主義復辟，反特權等非常左的口號爲基礎，「七分成績，三分敗績」也好，要根本否定它還是一回困難的事，要根本否定它，便只有否定毛澤東，正式肯定文革前劉少奇的路線，照中共黨爭的一貫手法來看，即使鄧小平一系掌權，亦只會實際上走文革前的道路，而不用全面翻案。這裏「不用」全面翻案的意思，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再次運用，由於毛澤東已去世，其指示如何闡釋，在於當權者的實際需要；毛氏在生時鄧小平亦復如此，何況反對派已在肅清之中，毛氏又死無對證？眞正要面對毛氏生前發出的指示之時，最多把罪名推在四人幫身上，說成是四人幫篡改後的指示好了。這樣的手法史大林在列寧死後就曾用過。

那末，中共形式上不走「擺脫毛澤東思想化」的道路，形式上不走蘇共二十次大會後的「右傾穩定時期」，是不是便表示當前中共的當權者仍將是史大林主義的中派，換句話說，保持在毛氏在生時的路線？，鄧小平假若復出，會否在某一程度上修正毛氏的路線，把這中派逐漸推向右翼？

首先，當前中共中央的大多數，是不是毛氏路線的反對者，目前仍不能妄下斷語。華國鋒本人的政治路線是不很明顯的。但四人幫的被打倒，我們可以肯定文化大革命衍生在中共黨內的極左路線正在被逐漸清洗中，但這極左路線却只是毛澤東反史大林主義右翼的其中一種路線，而四人幫的激進做法亦與毛澤東顧全大局的策畧不同。現時中國各省的內亂，和四人幫的直接關係很少，反對鄧小平一系，特別是反對鄧小平本人重掌權力的居多。中共中央裏鄧小平的支持者自是處於多數，但中下級幹部就不一樣。中共是否會在**實質上**走向全面右傾，然後走蘇共的路線，仍需要一段時間才知。鄧小平假若復出，將會催快這右傾的過程，起碼他的復出表示了中共黨內毛氏路線的支持者的失敗；在目前的情形下，這些毛氏路線的支持者誓將反對。我認爲如鄧小平一系要壓下這批反對者，只能採取公然鎮壓的形式，或許當前各省的內亂一平，就是鄧小平一系的全面勝利。鎮壓的形式愈是激烈，鄧氏一系修正毛澤東的路線便愈是露骨，不過倘不是壁壘分明般的全面內戰局面，如上文所說，否定毛澤東思想這一步還是不會走。果眞如此，中共以後仍將是毛氏路線與史大林主義右翼的混合物，不同的是右翼顯然佔了優勢，國內政策將以發展經濟爲主。毛澤東的政治第一口號，在落實政策下將實際上處於附屬性的地位。

蘇共二十次大會後的「擺脫史大林主義化」運動並不曾給蘇聯人民帶來社會主義的民主，克姆林宮的官僚統治依然故我；三和政策是對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更赤裸的叛賣。毛澤東過去二十年致力於遏止中共走赫魯曉夫——布列茲尼夫的路線，他的努力會否因他去世而人亡政息，未來數年將獲得證驗。

海外述林發行全加拿大，美國，英國和香港，廣告效力最大

白欖劇：

女工亞蘭

編者按：

去年十二月，加拿大多倫多市的華人製衣聯誼會在嘉蘭中心舉行了一個會員聯誼會，演出多項節目。其中最成功並且最受歡迎的項目要算白欖劇：女工亞蘭。該劇以前曾經在紐約一份華人報紙上刊登過，由華人製衣聯誼會工友及李家和君集體改編。本刊徵得李君同意轉載於此，特此致謝。

出場序：李亞蘭　三姑
阿王　工友甲、乙

亞　蘭：
我個名叫做李亞蘭
最近嚟咗多倫多
諗起當初响香港
聽阿三姑將呢度讚：

三　姑：
李亞蘭啊李亞蘭
香港搵食確艱難
不如聽我講
嫁去金山有世界嘆囉！
電影妳就睇得多
加國嘅生活唔知幾棧
出入有缽缽車
花園洋房唔憂米飯

亞　蘭：
當時覺得三姑講得幾啱
加拿大式生活係幾嘆
不過單身一個人
離鄉別井怕唔慣
於是三姑佢做大媒
介紹王仔呢個冒充大老板
三姑佢又靜靜同我講：

三　姑：
亞蘭妳唔駛諗咁多
嫁咗個金山客
遲D可以申請弟妹們移民去把銀賺！

亞　蘭：
本來個心重十五十六唔知點樣
阿王佢就甜言蜜語將我嚟呃

阿　王：
亞蘭妳未出過遠門
唔知多倫多嘅燦爛
工作好疏扶
銀紙好易賺
牛奶當水飲
食牛扒當食飯
大廈摩天高
重有CN Tower
簡直有得讚冇得彈係喇！
重有嗰：
High Way D汽車飛飛聲
八十咪車當等閒
簡直睇到妳眼眨眨
放假去釣魚搞萍果
重可以去Centre Island玩
生活幾咁悠閒
點似香港成日開夜工咁慘！

亞　蘭：
聽到我好開心
當時就宜得立即過嚟玩
行咗唔夠三禮拜
就嫁咗阿王跟佢嚟金山
飛到多倫多
坐車到Chinatown
哎喲！七D街道咁污糟
屋房又咁殘
仲個間柏文更破爛
卩由乡到妳怕
只因爲屋裏面多「窿LR」
D老鼠好猖狂
晚晚嚟偷飯
廚房冇氣喉
俾D油烟焗得好慘！
冬天更冷得交關
躲埋响屋裏面
邊度有得去玩？
至多約埋隔鄰二嬸
搓番八圈麻雀
好把時間來發辦！

一日都係呢個亞王
認眞冇良心
冒充大老板
又話响唐人街
餐館有十幾間
過嚟就唔對辦
其實就一間都冇佢份

阿　王：
亞蘭妳唔好嬲
我唔係存心將濶佬充扮
好多唐人响呢度
英文唔識講
簡直俾人當「牛」佬辦
好多老華僑
住咗幾十年
都係跨响呢個唐人街
地方叮咁細
居民上幾萬
人多屋又少
搵食係艱難
行業好狹窄
功夫由朝做到晚
搵工受到歧視
邊有機會把婚事辦！
今次返唐山
已經洗晒儲埋個一兩萬

亞　蘭：
都係自己貪虛榮
煲成呢鑊冇米飯
好喇
從此疊埋心水
學識耳衣把錢賺啦！

一年後

亞　蘭：
做咗一年多
D錢眞係唔易賺
車衣呢一行
要手急眼快冇得偷懶
旺月做到手都跛
半夜三更係咁撐
如果唔搏命
淡月個時就冇得開飯
好多工友嘅健康都唔多「棧」

阿　王：
近來經濟嘅危機
勞苦大衆受害最慘
處處話裁員
人工減完又減
醫療教育同養老
樣樣都話斬！
特別係D新移民
生活甚唔慣
人生路不熟
搵食極艱難
最近又多Lay Off
人心惶惶把命嘆
近來工廠冇工開
老板重靜靜走佬把廠關
工友做工冇薪資

女工亞蘭

正是：
啞子吃黃蓮
講理實在難
不平嘅事時常有
點解梗係落响我地身上咁啱！

工友甲：
亞蘭、亞王你地米嗟嘆
我地班工友來把你地探！

亞　蘭：
多謝你地咁關心
唯有你地知道我嘅艱難
唔知係咪八字唔得正
抑或條命生得硬
點解我地有力冇掟駛
成日爲錢來操煩

工友甲：
我地工人冇話命唔正
而係社會嘅腐爛
D大老板
括龍嘆世界
工人就做到眼坦坦
經濟危機已做成
通貨膨脹工業又減產
物價又猛升
你話慘唔慘？

工友乙：
阿大叔就講得啱
窮人一樣要食飯
財團大公司
賺到見牙唔見眼
T.T.C. 車費一年加幾次
重猛話赤字利潤減
勞苦大衆要搭車
一日幾蚊認眞唔棧

亞　蘭：
你地雖然講得啱
我地嘅血汗不能亂洒
不過我地係工人
大事邊度輪到我地辦！

工友甲：
亞蘭Ｖ妳咁講就唔啱
所謂團結一起就係力量
參加製衣聯誼會
大事就可一起辦
做工蝕底因爲唔識講
聯會就設有英文班
聯會嘅同事經驗多
爲工人謀福利值得讚
面對着老板全然不懼
只因有工人在後面支撐
講清楚條件工人有利
唔駛成日俾人亂蝦
聯會人多力量大
財團見到確唔知點辦

工友乙：
大叔就講得啱
力量越大我地越棧
老板重點敢亂留難
老板力量在錢勢
工人力量要寸土必爭
老板賺錢靠買勞力
冇咗勞力佢地冇錢賺
勞動就係工人嘅本錢
冇咗勞動大衆社會多艱難！
總知要團結
工人才有力
參加製衣聯誼會
大事一起辦喇！

亞蘭、王：
我地愈聽愈開心
好似食咗開胃散
從此大家要團結
社會大事就可大衆一起辦！

大　衆：
工人團結便是力量
取爭權利將前途來挽救！
團結！團結！要團結！
爭取權利將前途來救挽！

華人製衣聯誼會集體改編

多倫多攝影器材

在多倫多攝影器材，我們使用閣下的語言……不論是攝影界裡的國際語言還是中文！多倫多攝影器材被認爲是過去三十年來加拿大最先進的攝影器材公司。價錢相宜、售貨員的豐碩知識替本公司贏得如此美譽。滿足閣下攝影需要，請光臨多倫多攝影器材

TORONTO CAMERA
... because you've got to be good to make it on Yonge Street
340 YONGE
Mon.-Wed. & Sat. 9-6, Thurs. & Fri. 9-9 • 597-1891
We accept Chargex • Master Charge • Trade-Ins • Mail Orders

我們說閣下的語言

加拿大安省多倫多市央街三四〇號

編者的話

●經濟不景的當兒，少數民族（尤其是那些工人成員）往往成爲社會弊端的代罪羔羊，他們的血汗勞動却替當地社會造就了許多有利的發展條件。華工在十九世紀末期建築的兩條橫跨北美洲的鐵路（美國和加拿大）的最艱險部份是很好的明證。北美洲的歷史教科書却從來不寫上華工這一段辛酸史。今期本刊收輯了有關北美洲華工情況的文章四篇，以紀念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曾經付出巨大的代價。

●「華工在加州建築鐵路的一些史實」是一位同情華工在加州被排擠的美國人寫的。文章徵引了大量與該工程有關的人士的證供，頗能反映華工在當時的際遇與及鐵路對發展美西的重要。

●「無支祈」君替我們把美國西岸華工運動作了一個縱橫兼顧的介紹。內容雖非詳盡，但亦能給美西華工運動勾劃出一幅概括的圖畫。

●目前加拿大的華工組織又怎樣呢？華人人口經六十年代中期不斷地急遽增長，我們相信華工運動近年來一定是更加蓬勃。可是，實際情形是否如此？在「多倫多目前唯一的工人組織——華人製衣業聯誼會」給大家新的展示。

●一月中，加拿大東部七間大學的中國同學會聯合舉辦了一個爲期七天的中國週，目的是「以大家能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對中國認識得更深更廣，爲加深國際了解，促進文化交流」。一月十七日晚，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的江紹倫教授主持了一個名爲「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道路」的座談會。方資求君整理了是晚座談會的發言，並以「目前中國大陸的教育」爲標題給本刊發表。本文整理後經江教授過目。

●一九七六年北美洲經濟的進展相當差勁，大多數的物價均上升了，失業人數亦增加。今年的情況是否好轉呢？大家不妨讀一讀「加拿大經濟巡禮」。「多倫多華埠治安問題」是綜合了目前多倫多華埠的連串有關破壞治安事件與及紐約警方鎮壓唐人街幫會兩地的情況而寫的。

●本期的電影版刊登了兩篇文章，談及兩套近日首輪西片電影，文章內容畧與一般影評不同。北美洲各地的唐人社區均放映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中文電影，本刊希望電影版在不久的將來亦有討論國、粵語片的文章，歡迎讀者來稿介紹。

●上月初，本刊訪問了居住在多倫多市的一位加籍華裔藝術工作者陳啓雄君。本刊希望以後還能給大家介紹多些有關北美洲華人藝術工作者的動態。

●研究美國華僑史的人很多，資料也比較完整。加拿大華僑史，尤其是加東部份，有份量的書還沒有那一部，本刊由今期起開始輯錄「安省華僑史彙編」。由於我們手上的資料不多，歡迎各地讀者給我們來稿或提供資料，俾華人在安省的生活經驗得以傳諸後世。

更正啓示上期
第三、四、五頁的小數民族
應爲少數民族
三十二頁左四十九行接三十三頁左十二行
三十三頁左十二行接三十三頁右二十行止
三十三頁右二十行接三十二頁右一行
三十二頁右一行至三十三頁左十一行止
三十三頁左十一行接三十三頁右十三行

海外述林 VOL. 1 No. 3
March 1977
The Crossroads 定價：加幣 75¢
第一卷第二期（總第二期） 1977年2月號
編　　輯：海外述林編輯委員會
編輯部地址：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二〇五號二樓C座
電話：1—416—598—0296

海外述林總發行處：
思雅書舍
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
二〇五號二樓C座
電話：1—416—598—0296

EDITORIAL

On the cover the the February 12th issue of the Canadian Magazine (a nationally distributed weekend periodical), was the picture of a Chinese man in traditional black dress, complete with pigtail and abacus in hand. Inside the magazine was an article entitled 'A Chinaman's Chance', which bore no relation to the cover picture but turned out to be, rather, a consumers guide to Canada's lotteries.

A random survey taken by Crossroads among young Chinese revealed two types of responses to this image of the Chinese. On the one hand, there were those who felt the picture, although an inaccurate portrayal of the Chinese, was harmless. After all, who goes around in such attire these day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those who felt deeply insulted at such caricaturing of the Chinese. The Crossroads is among this latter group who feel that the stereotyped image of the Chinese-Canadian is in bad taste and exhibits complete ignorance of the historical roots the Chinese-Canadians have set down in this country.

Despite the vast social and economic gains of the Chinese, the collective North American perception of us has progressed little beyond chop suey and Suzy Wong. The movies, television, print media, films and comics continually fail to reflect the achievements of Asians in education, law, politics, business, etc., preferring instead to portray Asians as inscrutable, exotic or evil. Images of Asians as Dragon Lady, Hop Sing and Fu Manchu run rampant in the media. Probably the best known Oriental stereotype is Charlie Chan, the Chinese detective with an inscrutable knack for solving crimes. But unlike his clumsy number one sons who were played by Asian actors, Charlie Chan and all major Asian roles in films was invariably played by white actors.

While these stereotypes appear to be innocuous caricatures of Asians, the continuous portrayal of Asians as inhuman (i.e. lacking normal human qualities like kindness, compassion, love), does much to influence how North Americans perceive us.

Our assertion of an Asian North American identity no doubt clashes with the scores of myths and stereotypes of Asians. In this regard, Asians must confront and reveal the distortions that appear in the media for what they are.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that the medi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areful of the portrayal of Blacks and Indians because of agitation and organized protest from these groups.

Asians must also fight the distortions and racist images that appear in the media, but the need to humanize the Asian image must be met with the heightened awareness and support of the Asian community. These false portraits of Asians must be arrested and changed into stereotypes. It must be made clear to those who control the media that we will no longers tolerate their ignorance, arrogance or contempt. one of Asians as human beings if we are to make any claim to being an equal member of society. We can fight racism in the media by writing letters to editors, publishers, our local politician objecting to specific

Together with four other organizations, The Crossroads has sent letters of protest to the editors of the Canadian Magazine and The Toronto Star. An edited version of the letter appeared in the February 25th edition of The Toronto Star, but with the names of our organizations deleted, making it seem as though the letter was written by five individuals. Another letter was sent to The Toronto Star demanding an apology and explanation. In view of the above, we include these letters at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along with a letter of apology from the editor of the Canadian Magazine.

The following letter was sent to the editors of the Canadian Magazine and The Toronto Star:

Dear Editor:

We feel that the picture on the front cover of the February 12, 1977 issue of the Canadian Magazine is most insulting to the dignity of Chinese-Canadians in this country. It was an exercise in poor taste and vulgarity that is quite incompatible to the social standards a magazine with national exposure should aspire to reach.* The portrayal of the Chinese-Canadian in such a stereotyped fashion demonstrates blatantly your crude disregard for the Chinese-Canadian sensibility as well as your complete ignorance of their history in Canada.

It was an exercise in poor taste and vulgarity that is quite incompatible to the social standards a magazine with national exposure should aspire to reach.

The term 'A Chinaman's Chance' is a derogatory term and a racial slur. The origin of this phrase is a sad reminder of a long hisotry of harsh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Chinese immigrants and dates back to the days of the Gold Rush. In those days, in addition to the complete lack of citizenship rights and social mobility,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were barred from all gold mining and prospecting opportunities. Consequently, the Chinese were forced into the most menial and low paying domestic occupations. Some secretly reworked the exhausted mines and riverbeds after their white counterpart had abandoned them. This pitiful effort of 'scavenging' for survival gained them the derisive term 'A Chinaman's Chance'. To the outsider, the term seemed inncuous enough, but to the Chinese it was a bitter experience of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in a land that was basically hostile to their very existence. 'A Chinaman's Chance' was a slim chance indeed!

Therefore, we object strongly to the term in the context it was used, we do not appreciate the senseless humor intended, nor do we see any validity in the cover picture, as it bears no relation whatsoever to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a consumers' guide to Canada's lotteries.

Furthermore, we feel the cover picture is a deliberate caricature of the Chinese-Canadian, which degrades and injures the dignity and respect the Chinese-Canadians deserve in this country. Where on earth is one going to find a Chinese man dressed in black traditional costume, who fingers an abacus and sports a pigtail? Such an image of the Chinese can only exist in the grotesque imagination of the ill-informed, which bears no resemblance to reality. Such crass contrivance of racial stereotypes is both dangerous and destruct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acial harmony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At a time when racial tens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increasing concern in Toronto and across major cities of North America, such irresponsible caricaturing of the Chinese-Canadian can only spread ignorance and contribute to the racial myths that already exist in Canada. Must the Chinese-Canadians always be regarded as exotic, inscrutable, sly and underhanded, plus a host of other equally pernicious stereotypes and myths?

* We are extremely disappointed that the Canadian Magazine has reached such a low point in its standard of aesthetic and moral values which is most incompatible for a magazine of national stature.

Sincerely,
Chinese Canadians for Mutual Advancement
The Crossroads
York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
Chinese Interpreters Service
Chinese Parents Association (Orde and Ogden Street Public Schools)

EDITOR'S NOTE:

* These sentences were deleted in the February 25th issue of The Toronto Star.

The following was sent to the editor of The Toronto Star:

Dear Sir:

On February 25, your paper published our letter of protest dated February 19, and gave it the title "Magazine 'insulting to Chinese Canadians,' they argue". To our disappointment and amazement, you omitted the names of our respective organizations.

We had written the letter on behalf of the five organizations and the opinions were those of the members of these organizations. This was evident because (a) only the names of our respective organizations appeared of the front page of the letter; (b) at the end of the letter, the name and phone number of an executive officer appeared after the name of his organization, so as to allow the Star time to check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organizations involved.

We can think of only one reason for the Star to omit the names of our organizations, which would be a concern for authenticity. In this case, the Star had ample time either to call us directly or check our organization from other sources, since we delivered the letter on February 19 and it did not appear in print until February 25. Instead, the Star chose to arbitrarily delete the names of our organizations and then put the title "Magazine 'insulting to Chinese-Canadians', they argue", which had the effect of making they appear to be the opinion of only the five officers concerned, rather than the collective opin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five organizations.

In view of the above mentioned points, we demand the following action be taken promptly by the Star:

(1) to reprint the original letter with the names of our organizations in full, along with this letter in the Star
(2) to publish a letter of apology
(3) to state the position or editorial opinion of the Star on this matter and not just by putting 'they argue' or 'he contends' on letters to the editor
(4) to state clearly what criterion was used in which the names of our organizations were deleted so as to avoid any similar occurrence in the future.

In our opinion, the Star owes the above to our members and to the readers, not to menti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its own journalistic integrity.

Sincerely,
Chinese Canadians for Mutual Advancement
The Crossroads
York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
Chinese Interpreters Service
Chinese Parents Association (Orde and Ogden Street Public Schools)

The following was received from the Canadian Magazine:

Dear Mr. Yao et al:

We have been very embarassed by your letter criticising the presentation of our recent article on lotteries. It is not the only such letter we have received. A number of readers have been kind enough to point out that it is not Alan Edmonds' article that has disturbed them but the illustration and cover line. Mr. Edmond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rests strictly with us, the editors, and we can only plead ignorance of the historical roots which have caused our cover phrase to become anathema among Chinese Canadians. The unfortunate phrase was chosen only as a colloquial expression to indicate the ridiculous odds offered by Canadian lotteries. Obviously, it was an extremely bad choice.

The Canadian has not once but twice received honourable mention in the Media Human Rights Awards from the B'nai B'rith society; we are very proud of our record in the field of civil rights. Therefore, the last thing we meant to do was to demean Canadian citizens of Chinese origin. We can only express our deepest apologies, and assure you that it will never happen again. In our first possible issue, we will print a sample of the letters of protest we've received, along with The Canadian's apology for our gross error in judgement.

TRAVELS IN

THE NEW WORLD

TRANSLATED BY LEE WAI-MAN AND FRANK MOY

INTRODUCTION

In 1903, Liang Chi-chao, a later Ching scholar and statesman, made a trip across North America. Upon his return to Japan, he wrote a book entitled Travels in the New World. According to his own words, Travel in the New World was not an ordinary record of sights and sounds of the countries he visited, but a book 'with social details of historical value of these societies'. Therefore, Travels in the New World can be considered a valuable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early part of this century. The Crossroads plans to translate this book into English by installment, so that our English readers might have a glimpse of the early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However, due to the length of the book,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translate the whole book, but only thoses chapters which pertai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

On the morning of the sixth day of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March 4th, 1903) our steamship entered the harbour of Vancouver Island, Canada. Green mountains on both sides of the shore looked like a welcoming or farewell delegation. The British on the left strait, the Americans on the right. Amidst the beautiful and elegant mountains, thickets,dense as forests, our ship motioned in the calm sea surrounded with the sunlight of the dawn. I t was a pleasurable journey.

At on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the ship arrived in Victoria. Comrade Li Fak Ki (李福基) and several others from the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welcomed me at the wharf. The ship stationed for fifeteen minutes or so and then left for the next destination. Mr. Yip-yuen (葉恩), Mr. Lau Cheung Hin (劉章軒) and Mr. Li Yau She (李佑穗) from Vancouver and New Westminister, also came to Victoria to welcome me. We arrived in Vancouver the same evening. Over a hundred people greeted me at the Vancouver harbour.

British Canada is composed of seven provinces--along the Pacific coast was British Columbia.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20,000 Chinese in Canada, about sixty to seventy per cent of whom lived in B. C. Victoria is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B. C. Around Victoria, there were large cities such as Vancouver (the Chinese nicknamed it 'Salt Water City') and New Westminister ('Second City', the Chinese called it). Gathered here were almost the entire Chinese business and labour community. A rough estimate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residing in the whole of Canada was as follows :

Victoria	5,000 plus
Vancouver	4,000 plus
New Westminister	1,000
UNION MINE	1,000
Nanaimo	500
Cariboo	1,000
COURTENAY	1,000
Montreal	2,000 plus
Ottawa	200 plus
Other cities and towns	3,000 plus

The bulk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came around some ten to fifeteen years ago, when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road began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Railroad. At its zenith, there was said to have been seventy to eighty thousand. Upon completion of the railroad, jobs were scarce. Subsequently, the number of Chinese remaining was approximately the above number.

About fifeteen years ago, the land where Vancouver city now stands, was entirely a wooded area of thick forest. The railroad cut across the continent to New York, connecting Europe to the East through ocean liners such as the Queen of China, Queen of Japan and Queen of India which ra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Vancouver was the harbour and the terminal for ocean liners and the railway, which experienced sudden prosperity. Although Victoria was designated as the capital of B. C. , Vancouver was the power centre. The value of land was rapidly inflated tens and hundred fold. There were prosperous Chinese here fifeteen years ago, but none were willing to invest in land. Despite the advice of their Western friends, they were still reluctant to take such a step. This indicated the Chinese had insufficient learning and knowledge, who as a result, were unable to compete with Westerners.

The Chinese in Canada had a difficult time in making a living, far behind in this regard, from their counterpart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average, out of ten Chinese workers, five or six were unemployed. Their livelihood was difficult beyond description. Businessmen depended on the consuming power of the workers; when industry declined commerce followed suit. The businessmen here were not big capitalists who operated big industries. They specialized in the importing of native food products from China. Their profits depended on sales to the Chinese workers. If the number of Chinese workers dwindled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ores decreased accordingly. The more difficult the livelihood of the Chinese workers, the less the profit of the Chinese businessmen. I observed the same phenomenon in Hawaii and Australia when I was there. But the situation in Canada was more severe.

The workers in B. C. mostly engaged in salmon fishing. During the salmon season, workers in the business could earn somewhere from thirty to sixty dollars a month. However, the season usually lasted only from April to July.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those in the fishing industry were out of work. The money these workers earned during the fishing season was insufficient to carry them through the rest of the year.

The Japanese here also engaged in the fishing industry. However, the Japanese did the catching, the Chinese the processing. The wages that could be made from fishing were several times higher than the wages for processing. But then, the indigenous Westerners prohibited those Chinese who did not hold English passports from catching fish. Lacking even this small right, the Chinese could not compete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Apart from the fishing industry, the other most common occupations were laundry and kitchen work. The best of the Chinese cooks earned as much as seventy or eighty U. S. dollars a month, the lowest no more than twenty. The wages in laundry work was the lowest, approximately ten to twenty U. S. dollars a month. Montreal had the largest number of Chinese laundry workers, as it was the biggest city in Canada. Others engaged in mining, lumber industries, though the number was small. Viewing the Chinese business in B. C. in totality, there were one hundred and forty stores in Victoria, over fifty in Vancouver, twenty to thirty in New Westminister. They were rather numerous. However,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or two who also dealt with Westerners, the rest of the stores relied exclusively on the support of Chinese labourers. Chinese grocery stores comprised about seventy to eighty per cent of all business. However, in Victoria, opium processing was one of the largest industries. Import duty was light on opium, thus profitable. But then the profit too came from the pockets of their fellow countrymen. Most of the opium traffic was aimed at the U. S. Recently, however, the U. S. had been extremely stringent on the import duties, which lowered the sales tremendously. There were also over ten tailor shops which competed a little for Western business.

Some businesses specialized in the business of gambling. Almost everyone gambled here. Just within the city of Vancouver alone, there were over twenty fan tan clubs, about sixteen or seventeen bingo houses. The same is true in other cities. I had often calculated the monthly spending in these clubs. Fan tan clubs each hired about five or six people, who were each paid about six U. S. dollars weekly. The rent for each club was about forty U. S. dollars a month. On the whole, fan tan clubs in Vancouver had a monthly expense of approximately $6,000 U. S. This was equivalent to $12,000 in Chinese currency. In other words, a yearly expense of $50,000. The expenses for bingo houses and others were roughly the same. Therefore, in Vancouver alone, the capital accrued to the gamblers was about $300,000 annually. Combined with the whole province of B. C., the amount might be as high as one million dollars. The profit which could be made could not compensate for the losses. This was also part of the reason why the problem of livelihood for the Chinese here became progressively more difficult.

The Japanese here also indulged in gambling. In between, they probably lost about $160,000 U. S. in the Chinese gambling houses annually. What a way to gain an external source of profit! In terms of business enterprising, the Japanese were even worse than the Chinese here.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four thousand Japanese here. Yet not one store selling Japanese groceries or goods. I had been to the island of New Guinea (on the north east of Australia) where there were about two thousand Japanese there, living in extreme poverty. But the less than one hundred Chinese there were rather prosperous. The reason for this was that the Chinese there prospered from their business with the Japanese. The two thousand Japanese there could not establish one store of their own. I suspected that the Chinese genius for business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Japanese. This belief was confirmed by my observation here.

But then the Chinese genius for business could only be practiced among their own countrymen or among the Orientals. Once pitted against th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the Chinese suffered defeat. This is because the Chinese had genius for business but not the knowledge to develop it fully. ■

(To be continued)

ROLE OF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n March 4th of this year, the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York University, held a symposium to discuss the topic 'The Role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Toronto Chinese Community'. Three panelists were invited to give a brief talk on the topic, which was followed by an open discussion. Although the symposium was a small one (about 35 people attended), it nevertheless signified the beginning of an emerging ethnic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which combined an awareness of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with the need for community action.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space, we are unable to publish all three speeches, but the two we include here do summarize the themes and concerns of the symposium. The Crossroads thinks it is important at this time to open up the question of the basic ontological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Canadian in this particular historical juncture, when the diverse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are working in the direction of both integrating and disinteg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Chinese-Canadian community. The Chinatowns of North America are all undergoing tremendous upheaval and change presently. We wish to pose the question 'Whither the Chinese-Canadian community? 'Who and what is the Chinese Canadian? The following two sketches were designed to provoke some response in this direction.

The panelists included Ronnie Yu, Albert Chan and Frank Moy with Tammy Yu moderating.

KWOK B. CHAN

One way to summarize my assessment of the present statu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in Toronto, is to highlight the ignorance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as a result of little or no interaction. Ignorance is the breeding ground of stereotypes, biases, prejudices and discrimination. We look at our fellow countrymen in Chinatown with tinted glasses, while people from Chinatown also look at us with suspicions and doubts. Isolation and separation thus characterize the present status of student-community relationships and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has always been the case historically.

Another way to look at the same 'role' issue, is to characterize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oronto in terms of marginality.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hinatown remains one of consumers of grocery, mass entertainment, restaurant cuisine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Marginality thus goes hand in hand with a complete lack of emotional and political concern with what is going on in Chinatown. The marginal man has thus ultimately become a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being of political apathy.

I see that one of the major objectives of this symposium is to reverse an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emerging 'vacuum' between students and community. I also see that one essential strategy is to encourage and mobiliz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ty. To me, this can be done in three ways: First, to identify and priorize existing problems prevailing in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Second,

to render services in the form of furnishing both long-term and short-term solutions to identified problems; Third, to provide leadership and skills, hard-ware and soft-ware technology, in operating various community based projects.

Let me say a few more words about these three directions. The mere attempt to identify and study community problems provides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xcellent and ample opportunities in engineering group projects and surveys, and in gaining valuable field work experience. Gradual accumulation of data stemming from these small group projects has several implications: It provides the first step for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our Chinese community; It shapes future directions of larger scale projects; Throug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tudents begin to develop insights into issues and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community. Just on the top of my mind, I have a list of problems which necessarily challenge the competence of workers in Chinatown. And this list includes unemployment, senior citizens' medical and mental problems, youth and family problems, hous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low-income workers in Chinatown. And this list is by no means complete.

The rendering of services in the form of launching community based projects is contingent upon adequate provision of manpower and technology. It is my belief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constitute an excellent source of voluntary services. Once problems are identified and priorized, some kind of steering committee should be struck and be composed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student body and the community. Then, we can proceed to work out proposals of projects which are geared to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However, all the above talk will remain purely academic unless people start now to 'walk the talk'. We need strong student leadership which serves three basic functions: First, unite all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s in Toronto in the form of a central operating committee; Second, orient this central operating committee to the important awareness that the business of Chinatown is eventually the business of students; Thir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mediate between the student population and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Now, let me digress for a brief moment into politics. I would like to stress something which we have long lost sight of, something which has never happened among Canadian Chinese historically, which is internal solidarity, ethnic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ntegration.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e fact that the issue of the future of Chinese in Toronto in specific, and in Canada in general, is in the final analysis, a political issue which necessitates some form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s a minority and the white society.

Before the Chinese in Canada can eventually derive any benefits from bargaining with the government on both feder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we need community solidarity guided by a profound sense of racial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The role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can then be best seen and understood as providing leadership and resources in starting to build and maintain this intra-community solidari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o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immediate social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in the second. I would also expect university students to a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a political leader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ty.

The kinds of community projects I have briefly mentioned in the above can hardly go beyond the proposal stage if they are not based on some scale of community power. By community power, I mean the integral assets and resources which will place Chinese in a bett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nce in demand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problems and nee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Canada.

After all, how much do we, as university students, know about our own Chinese community? I can only say, not much. What is more depressing, other than this embarassing lack of knowledge, is our unwillingness to know and to understand our community, to speak nothing of participating in it. At this juncture, the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s of the several campuses in Toronto come into the picture. The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s themselves need a strong and wise leadership, something we do not have. It is important for presidents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s to learn to strike a strategic balance between organizing dance and booze parties on the one hand, and cultivating social, ethnic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as minority members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on the other.

Before students can provide our community with leadership and manpower, we should start a painstaking task of re-examining the hows and whys of our own socio-political apathy and disinterestedness. It is about time to fight apathy and to work toward integration and solidarity.

I do not have any doubts at all about the potentials of students in providing leadership and initiative, although,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to come to grips with the hard, cold fact that it will be a difficult assignment for students, and we are not at the beginning of doing anything about the assignment yet! ■

history identity community

FRANK MOY

The cover of a recent issue of the Toronto Life magazine, has a sultry looking Chinese woman sitting enticingly in the back seat of a Mercedes which is parked in front of a Chinatown barbeque shop. Inside the magazine, is an article depicting a wealthy and successful Chinatown -- a businessman's dream come true.

While the article seems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as the number one minority is succeeding and finally reaching the mountain of gold, behind the mask of a prosperous and bourgeoning community, lies the real Chinatown, which basically still consists of inhabitants who labour long hours in its sweatshops, sewing and canning factories, earning below minimum wages in return for back-breaking labour. The fact that Chinatown is not only a place to eat and shop, but a daily struggle for survival escapes those who are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of it.

So at the outset, we have two versions, two different images of Chinatown. Generally, depending on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beholder and his own needs in relation to the community, his approach to the community is likely to take either perspective.

But then, what the mass media chooses to overlook and what the teeming working masses in Chinatown won't forget, is the long history of persecution and social segregation that has plague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nada. A quick glance at our historical presence in Canada shows that we have inherited a legacy of legal oppression, exclusion, discrimination and racism. That's quite a track record for a group that comprises less than one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Like other immigrant groups, when the Chinese first arrived in Canada, they were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o-economic pyramid. But unlike other groups, skin colour, language, custom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ll added to the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were unassimilable into western society. This attitude of the Chinese as 'alien and unassimilable' was to justify the oppressive treatment, both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of the Chinese in Canada from the gold mining days onward.

A lot of surprises, most of them unpleasant, awaited the newcomer to Canada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and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Separated from his family and friends, the newcomer ventured alone into a society that was hostile to his presence. Politically, the r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 made it clear that while it welcomed the cheap supply of labour the Chinese provided, it didn't want him to bring his wife and children to settle and share in the country's wealth and future.

In order to discourage the Chinese from making Canada their home, the government imposed head taxes, barred them from entering professional fields of employment or working in the government. To make it harder for the Chinese to enter society, they were isolated from white society and forced to congregate in largely self-sufficient areas, which we know now as Chinatown. By 1923, anti-Chinese feeling was so strong that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was passed which almost stopped the flow of Chinese immigration.

It has only been since the mid-sixties that all formal discriminatory actions have been lifted on the Chinese. Chinese are now able to vote and normalize their immigrant status. At the same time, racial and ethnic quotas have been abolished, enabling more Chinese to come to Canada and settle with their families.

Coming into North America, as most of us have, during a period when the expression of racism and oppression against the Asians in this country have largely taken on a much more subdued and covert form, at a time when soci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Asians have been relatively broadened, students like ourselves are too easily led to believe that with hard work, education and by quietly remaining in the background, we can easily merge into the comforts of a suburban lifestyle.

While certain basic changes in North American society have undoubtedly made it possible for many Asians to improve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 there is a reverse side of this success story that is often neglected. The sacrifices that had to be made, the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displacement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price we've had to pay for our social advancement as a showcase minority group.... the loss of our voice.

Perhaps, we have learned that the only way to keep the pressure and attention off ourselves is to keep quiet. The only way to succeed is to become as westernized as possible. This has often meant the adoption of western middle-class values. But at the same time, an unquestioning acceptance of white middle-class values and attitudes has led to a quiet conformity which has done irrepairable damage to our Asian sensibility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It has encouraged political complacency and conservatism. In other words, the price of acceptance is 'Silence'. But the trouble with keeping such a low profile is that we have largely become invisible.

This takes us to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How we, as a minority, view ourselves is also conditioned by the image the larger society imposes upon us. Our integrity as an equal member of society cannot be maintained if crass stereotyped images of Asians are constantly perpetrated by the mass media. In this regard, most of us are aware of the traditional roles that are relegated to Asians in western films and on television. Such figures as Charlie Chan, Suzy Wong, Chinese houseboys and waiters, are virtually the only roles Asians are allowed to play. While the Asians are portrayed as 'sly and exotic' or 'menial and brutal', they are never shown as normal. Somehow, the image of Asians as depicted in the mass media is somewhat of a sub-human, who do not possess the basic human emotions of love, compassion, anger or sadness.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is point, the cover picture of a recent issue of the Canadian Magazine shows a Chinese man dressed in black traditional costume, fingering an abacus and sporting a pig-tail. Where on earth is one going to find such a creature today? Such an image of the Chinese can only exist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ill-informed, which bears no resemblance to reality. What this illustrates is that Asian identity and integrity have always been mutilated by a vicious form of institutionalized racism which goes beyond individual ignorance and misunderstanding. The stereotyped images of Asians belonging to an exotic brand of creature helps to justify the low soci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in which most Asians still find themselv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mise of middle-class America helps to dissipate and re-channel the frustration and anger of an oppressed minority. The myth of success and the use of stereotypes, both serve the same end of containing and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grav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in Asian communities.

The function of stereotypes and the myth of the model minority both carry a destructiv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As members of a highly visible minority, the violence and distortion that have been done to our collective image is extremely damaging to the personal image we hold of ourselves. In extreme cases, this has led to a feeling of inferiority and self-hatred which makes it all the more difficult to accept one's own ethnic identity. The reverse side of this is the blind and unquestioning aspiration to adopt white middle-class social and physical ideals. In other words, to assimilate and disappear into the mainstream of life as soon as possible, thus escaping from one's true ethnic identity.

How we feel about ourselves, whether we regard ourselves as Chinese, Canadians or Chinese-Canadians, is not something we decide arbitrarily, but something that is influenced by the kind of treatment we receive in Canada. Whatever attitude we take towards the majority, as a minority, we are always defined by our relationship to it.

Certainly the need to seek our identity has to go through various forms. In much of the literature that has evolved by young Asian Americans, the problem is seen as one that involves neither total withdrawal nor total acceptance of white middle-class social and physical values, but one which involves a soul searching effort of getting at the historical roots and disentangling the myth from reality in order to arrive at a unique and meaningful sense of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Although there exist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 wide range of backgrounds, there can be found a common level of experience in the community which we can all identify with. Certainly, one way of defining the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lies at the grass roots level, with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We, as students have a vital role to pla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order to affect any strong sense of unity, we should make increased efforts to work with the people of Chinatown.

As a minority group in Canada, we cannot sit back thinking we have 'made it', when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kitchens, factories and laundries have not. There is a vital need for combining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action with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to one unifying force. If we are serious about the need to change society and our relationship to it, our efforts must begin within our own group, at the community level. ■

INTERVIEW WITH

PETER ROSENTHAL

PETER ROSENTHAL, MEMBER, COMMITTEE AGAINST RACISM.

CROSSROADS: The proposed Immigration Act has been strongly attacked and labelled as 'repressive and backward'. Your group represents one of its strongest critics. One of your contentions is that if its provisions are passed, it's going to prevent people from exercising basic human rights. But it seems you are not only fighting for people now in Canada, you are fighting for future Canadians.

ROSENTHAL: That's right. Under the new bill, people who are already here, can be very easily deported just on an immigration official's say so, without having done anything at all. Under the old law, one has to commit a crime to be deported. Under the new law, you can be deported for nothing. Also, the provisions that are more repressive for incoming people, for future immigrants, affect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now too. Part of the new bill is to make future immigrants 'slave labourers'. Under the new bill, they can be told where they have to work, who they have to work for and so on. If they disobey those provisions, they can be deported. Now, something like that affects people who are here now too. Suppose you are working in a factory and there are a lot of these 'slave labourers' there.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for you to organize any union activities in that factory. They're going to be very afraid of the boss. The moment they displease him, they can not only be fired from their job like everybody can, but they can be thrown out of the country. So they're going to be a group of people that weaken the whole labour movement in this country.

CROSSROADS: That may be the case for permanent residents, but not for citizens.

ROSENTHAL: This is for permanent citizens, right, who are not citizens. that is, before they become citizens. I should point out that not everyone who has the qualifications to become a citizen, becomes one. Citizenship is regarded as a privilege, not a right. Under the old law, there's a status of being 'domicile',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is a right, an automatic thing. If you're here five years, you're automatically domicile, and that gives you more protection against deportation. That's done away with under the new bill. Citizens are protected, but citizenship is a privilege and there are many cases of people who apply for citizenship and are not granted it.

CROSSROADS: Your organization is against fingerprinting and photographing. Can you give us the reasoning behind this position?

ROSENTHAL: To introduce the idea of fingerprinting and photographing immigrants is a further attempt to scare and control peopl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it is something that very much affects Canadian citizens too. Especially Canadian citizens who are what we call the 'visible minorities'. Once police try to enforce that kind of regulation, how are they going to enforce it? They're going to stop people on the street and say 'You, are you an immigrant?' Well, if you look like an immigrant, in the sense that you don't look Caucasian, then how are you going to prove you're a citizen? You say you're a citizen and they say, 'you're not a citizen'. After a while,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have identity cards for citizens too. That's the next step. I would say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program to really control people. In difficult economic times like we have now, such programs increase a lot, and this bill is paving the way for repression of citizens as well as immigrants.

CROSSROADS: There was an article in The Globe and Mail recently about you and the Prime Minister during a citizenship gathering here in Toronto at the Sheraton Hotel. The press gave the impression that you were attacking the Prime Minister. What really happened?

ROSENTHAL: On February 17th of this year, Prime Minister Trudeau held a big citizenship party to celebrate the new Citizenship Act. The Citizenship Act is sort of a cover for the Immigration Act. It basically says the waiting period is reduced from five to three years, and everybody says 'oh, isn't that nice, we're welcoming people'. But w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telling people about is the Immigration Act, which is very tough on immigrants and makes it very easy to deport people and so on.

The Committee Against Racism went to this party. Over 50,000 people were invited and they only had room for 8,000. We were deomonstrating outside, but some of us who had tickets managed to get inside, including two well known lawyers who are members of CAR, Charles Roach and Mike Smith. They had concealed a banner and when Trudeau got up to speak after the opening ceremonies, they were standing side stage and unfurled this banner which said 'Stop Racism. Kill Immigration Bill. Committee Against Racism' in very big letters. But it was on side stage so people didn't see it very well because they were looking frontwards at Trudeau. After a little while, I decided to shout out something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banner. Trudeau was giving a warm speech about being for immigrants and what a wonderful multicultural society we have. After he said that, I shouted out, as loud as I could 'Then why are you increasing deportations?' I was very surprised when he turned towards me and said, 'If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why don't you get up here and say it?' A lot of people have told me that he's done this many times before. Apparently he hates heckling and does this as a way to stop people from heckling. Usually when he says that, people aren't ready to give a speech so they just shut up. But I've given lots of speeches about racism and I'm always ready to talk about racism, so I said, 'Alright, I'll come up there'. As I made my way toward the stage, I was stopped by plainclothes policemen. They argued among themselves as to whether or not I should be allowed to pass. Finally, it was decided I was allowed and started to walk towards the stage. As I got on stage, one of the policemen said to me, 'We're watching you Peter'. (laughs) I got up on stage and Trudeau was speaking. Then the master of ceremonies made a gesture as to where I should stand. Mr. Trudeau was five or six feet to my left. I was looking out into this giant crowd and I could see everybody in the place wondering who I was and what was going on. I had a leaflet in my pocket and I thought of taking it out in case I wanted to refer to some part of the immigration bill and wanted to quote it exactly. But then I realized, 'here I am, standing six feet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this nut who came out of the crowd and hundreds of cops around me might figure I had a gun'. So I reached in very, very slowly and pulled it

out very, very slowly. For some reason, perhaps because it was so different from my ordinary experience, I wasn't nervous at all and didn't even think about what I was going to say. Trudeau gave a long speech, partially because he thought it would make me nervous by keeping me waiting. Then after ten or fifeteen minutes, he says, 'oh yes, we have this fellow who has a problem with the government. I don't know what his problem is. Maybe he has financial problems? Well, if so, we have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here on the stage to help him out. Or maybe he has....' and he goes through different problems. Then he ends by saying, 'Maybe he has a legal problem. We don't have the solicitor general here, but we do have the RCMP'. Then he sat down and I walked up. You know, some people booed and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whole crowd was booing me all the time. This is a lie. What is true is that a sub-group of the people there, I would say about a hundred people were booing, and they were enough to be heard. But most of the crowd was just curious. In fact, afterwards, some people said to me, 'Gee, it is just like on television. I never expected to see something like that'.

Then I said, ' My name is Peter Rosenthal. I'm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a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Racism. You see that sign over there?' I still had in my mind the idea of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sign. I didn't realize I had a whole new situation. I said, 'I want to tell you why we're carrying that sign. ' Then I told them some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immigration bill. Throughout my speech, some people were booing, but most people were quite interested. After about three minutes, I said, 'Trudeau speaks with a forked tongue', and then my microphone was cut off. Then the people that had been booing, booed and the master of ceremonies said, 'your time is up'. I said, 'I want to finish my sentence', so he came over with a hand mike and I said, 'Trudeau speaks with a forked tongue, if he comes before you and says he's against racism . During his tenure as leader of the government, racism has been built in Canada as never before'. I walked off

the stage to boos from the same group of people, but also to a smattering of applause, which the press didn't report. As I was walking off, Trudeau began to speak again. He said, 'See, that shows what wonderful freedom we have in this country when we allow this person to speak like that. You might have thought that it was planned, but I swear it was unplanned'. To me it shows rather dramatically how little freedom there is in this country. A left point of view such as I represented is almost never given such a podium. I did manage to get back into the crowd and hundreds of people came up to me to express support for what I had been saying. Some people in fact, came to our subsequent meetings. It helped us to build a new movement against this immigration bill. I really think this immigration bill is so repressive that a number of new people will join us. I hope that people will decide to join us before it becomes law. It's not law yet, and we're planning a demonstration in Ottawa on April 2nd, on Parliament Hill to stop this bill. We're going to meet here in Toronto at 7 a.m. on Saturday, April 2nd, at Bathurst Street United Church, which is on Bathurst, one block south of Bloor Street.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strong enough demonstration against this bill to change it before it becomes law.

CROSSROADS: Apart from the immigration bill, what other issues are you fighting?

ROSENTHAL: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ere's been a tremendous amount of discrimination in recent years. Take the Henry Fong case for example. There were a lot of vicious rumours circulated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bout Henry Fong.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Henry Fong was expelled because of racism. I studied that case for a year, and I know every little detail about it. It's really disgusting that he didn't get more support from the so-called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t U of T, beginning four or five years ago, there's been a campaign against immigrants, especially Chinese students, because they are the most numerous of the so-called 'visible minority'. The Chinese students at U of T have been made the scapegoats, just as the larger society, immigrants in general have been made the scapegoat for economic problems. There are the administrators who say we have this tremendous problem with Chinese students who 'can't speak English'. Really, what makes teaching a problem is that we have fewer and fewer faculty and worse facilities. Things are really bad. So what they do is pick on Chinese students and says that's where the problem lies. That's what happened in the medical school 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in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 What they've done is pass a regulation where students whose first language isn't English, who apply on the basis of Ontario Grade Thirteen, have to take one of the standard tests and score very highly in order to gain admittance. Our view is that anyone whose English is good enough to get the grades you need in order to get into U of T, can do academic work in Enlgish. Maybe he won't specialize in an area that requires very high proficiency in English, maybe he'll specialize in mathematics or science. So what? If his grades are sufficient, he should be admitted.

CAR has been opposing this discriminatory move, just as we've been opposing the immigration bill, but we need more support from other people if we're going to have an effective movement. Again, I hope that readers of this magazine will join us in fighting this regulation. Anyone interested can telephone CAR at 922-5151 for more information. ■

REFLECTIONS

J. CANNON

Culture and language are the two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a particular racial group i. e. French, Japanese, Chinese, etc.,. A person identifies himself with a particular people because he speaks the same language and shares the sam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cial patterns. Everyone of us is proud of our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y are a part of us. If you cut the roots of a plant, death ensues. Likewise, if our mother language and cultural heritage are either suppressed or repressed, a part of ourselves dies, leaving an empty sterile vacuum.

While the question of raci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is minimized in a homogeneous society composed of a predominantly single racial-cultural stock, in pluralistic or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the question of one's identity is exacerbated to a crisis point. Canada is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but the Anglo-Saxon is the dominant political,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segment in the country. Multiculturalism is openly professed and practiced by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but the main aim of government policies is to turn all immigrants into models of Anglophone Canadians., i. e. , as English-Canadian as possible. Ethno-culturalism is practised on an academic basis, but any attempt at a determined and prideful identification with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roots by immigrants, is often met with strong opposition and resentment from Canadians.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o assimilate totally or remain distinct and cut-off from the dominant Canadian cultural pattern. Either reaction is extreme and has led, and continues to lead to frustration, resentment and misunderstanding. Too often, the question has been looked at in simplified terms: "I will either be a Canadian; or I will assert myself as a particular national". (What really is a Canadian? Can one remain a 'pure' representative of a mother culture when cut-off from the source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Recent immigrants have little difficulty in maintaining an acute awareness of their cultural or linguistic uniqueness -- speaking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practicing cultural habits (eating, music, behaviour patterns, etc.). What of the children? Second or third generations? How will they preserve their uniqueness, know and appreciate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How can we prevent a negative assimilation from taking place?

What is a Chinese-Canadian? Is he a Chinese? Is he a Canadian? Recent immigrants from Hong Kong are shocked by the ignorance or unwillingness of Chinese-Canadians to speak , to admit they are Chinese and the practice of behavioural patterns more Western than Chinese. Unaware of the strong social forces latent and present in Canadian society, but under which Chinese-Canadians suffer, immigrants treat Chinese-Canadians at the least with mild disdain or, at the most, with contemptuous condescension. This attitude only reinforces the unwillingness and isolation of Chinese-Canadians from the older generation and recent immigrants.

A dual-cultural tradition and dual-linguistic basis for social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same family quickly appears. (Witness school-age children speaking English to each other and Chinese to their parents, until at a later stage English is the only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Children suffer the most from social pressure. At school, the language medium is English; when they speak Chinese to each other, they are met with discouragement from their teachers or ridiculed by their classmates for speaking what seems to them senseless noises. (This causes isolation from classm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racial-linguistic barrier, a distincitve wall between 'they' and 'us'.

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English, the discouragement and hostility the children receive

from their teachers when speaking Chinese is harmful. Inadvertently, the Children feel self-conscious and unnatural when speaking Chinese, coming in time to consider it shameful to speak anything but English. It is a sad fact that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actical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s. Too mu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reading a foreign language, not speaking it.

Teachers at school tell the children they are Canadians; their fellow schoolmates, conscious of racial and linguistic differences, call them funny names denying any identification as Canadians; while, at home, parents usually repeat ad infinitum they are Chinese. What sense can a child make of all this contradiction and confusion? Pressure builds up until the child is forced to declare himself either way.

Usually, his Chinese heritag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is denied; he adopts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pattern of his peer group. Ultimately, his type of assimilation into Canadian society will depend upon the group under whose influence he receives instruction. The strong reaction against his racial heritage causes him to adopt Canadianism indiscriminately. (Thus, what they copy are usually the negative examples of Western culture, not the positive).

In order to insur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children, we must decrease as much pressure as possible. Present Canadian social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forces must be known,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If we want them to learn and appreciate aspects of their heritag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we must provide Chinese-Canadians with a model they can emulate and be proud of. We must understand and respect them on their own terms; we must always be on the lookout for their hopes and frustrations.

We must show Chinese-Canadians an alternative route to either extreme, Sino ethno-centrism or anti-Chineseness. They are Chinese and Canadian; they will always b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cultures. What must stop is the internecine war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there is no necessity that one should predominate over the other. Our children, if given the chance, will be the model exemplars of both cultures; using the good from both and extracting the bad.

This task will not be an easy one. The plan is a long-term on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learn in the process; learn about Chinese-Canadians, Canadian conditions, and learn about ourselves. We will have to fight on the educational level -- at school and at home. We will also have to re-educate the rest of Canada, putting her on a truly multicultural path in which everyone will take pride in speaking their mother tongue, participate in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ing equally proud of Canada.

We must join together in this endeavour, otherwise the isolation of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will continue to exacerbate until we face the prospect of eventual non-ent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Canada. We will only have Westerners in Chinese skin with only half a soul, half a life. ■

奇華餅家

券餅華奇按指儘特
用通華哥溫多倫多

社團茶會　生日蛋糕　龍鳳禮餅　各式西餅
特別優待　新鮮麵飽　中秋月餅　結婚蛋糕

地　址

多倫多　正店　261 Spadina Ave., Toronto　Tel: 368-2960/2969
　　分店　56-58 Centre Ave., Toronto　Tel: 598-0238/0239
溫哥華　271 Keefer Street, Vancouver　Tel: 685-2117

SAI-WOO Restaurant

製作精良　FAMOUS DISHES　裝置華麗

SEA FOODS　CHOP SUEY

SWEET AND SOUR

10% Off For Take-Out Orders
Special Businessmen's Luncheon

SAI WOO
Restaurant

加拿大安省多倫多市登打西街一二四至一三〇號

124-130 Dundas Street West, Toronto, Canada　M5G 1C3 Phones: 366-4988-9

中國藝術印務公司承印
PRINTED BY CHINESE ART PRINTING CO.(86 Dalhousie St., Tor., Ont. Tel. 368-8219)